

社研社語

SOCIOLOGY ECHO

2023年第1期 总第3期

2024年1月印刷 (半年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ETHNOLOGY, UCASS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苗计划”资助刊物

社研社语



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社会学社

立项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苗计划”学术团体项目

编辑委员会

主任：杨典

成员：

杨典 赵一红 向静林 赵梦瑶 姜瀚 钟瑞雪 林欣然

指导教师：赵亮员 温莹莹

主编：姜瀚

副主编：钟瑞雪 林欣然

美术编辑：王鑫河

编辑（以姓氏首字母为序）：

陈鞠之翼 黄蕊 刘娜 孟韵妍 秦美平 孙妍堃 王鑫河 王钰
翟誉秦 张亮 张星原 张振国

责任编辑（以姓氏首字母为序）：

蒋韵媛 凌欣然 王乐怡 许俊羽 赵仕翰

编辑出版：《社研社语》编辑部

订阅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社会学社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拱辰街道长于大街11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邮政编码：102488

电子邮件：ucasssociety@163.com

目 次

第一部分：琼林溢彩

草场承包制的地方适应.....	
——确权不确地的共管机制.....	鲍晓勇 - 1 -
回流儿童的返乡适应策略研究.....	黄妍喆- 15 -
理性神话：高校“半军事化组织”的形式和运作逻辑.....	胡晓昀- 25 -
戏谑的虔诚：电子木鱼的信众吸引与维系.....	柯思羽- 36 -
耦合与重构：非正式制度视角下的婚俗变迁研究.....	张 亮- 46 -
社会分层视域下的中国老年教育.....	
——基于 CLASS2018 数据的实证研究.....	赵家艺- 59 -
社会公平感与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	
——基于 CSS2021 数据的实证分析.....	吴翠珍- 71 -

第二部分：他山玉错

“饭圈化社会”：“饭圈”失范与治理文献述评.....	彭付雪子- 80 -
----------------------------	------------

第三部分：田野映像

重庆市奉节县旅游业生态调查报告.....	
——以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期为例.....	谈芯羽- 86 -
名为信仰的女性活动空间：江村宗教活动概况.....	柯思羽- 97 -

第四部分：要闻荟萃

党建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研讨会”成功举办.....	- 107 -
我院本科生参加“乡村振兴与行行重行行”纪念费孝通先生 《小城镇大问题》发表 40 周年研讨会分论坛.....	- 108 -
田野课堂总结 社会与民族学院成功举办.....	
社会学专业实践暨田野课堂建设经验交流会.....	- 108 -
研创计划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术论坛.....	
“首届民族地区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研究生论坛”成功举办.....	- 111 -
迎新 开学季社会与民族学院喜迎新生.....	- 112 -
我院学子在高校社会学专业赛事中初试锋芒.....	- 113 -
景天魁老师 论群学品格.....	- 114 -
王思斌老师 中国式现代化新进程中社会工作的新本土化.....	
——一个基于现实的理性思考.....	- 115 -
刘亚秋老师 口述史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法.....	- 116 -

草场承包制的地方适应

——确权不确地的共管机制

鲍晓勇*

提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为了激发畜牧业生产积极性，同时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我国在草原牧区实施畜草双承包责任制，使得草原牧区原有的生产组织方式发生巨大改变。但在牧民生产积极性提高的同时，也逐渐出现牧民支出增加，抵御风险能力减弱等问题。本文选择内蒙古赤峰市的一个村庄为案例研究地，基于对气象、畜牧业、草原和相关政策资料的收集，对当地干部以及牧户的访谈，以及参与式观察，探讨其在牧民层面“确权不确地”的草原共管机制，即在名义上将草场划分到户，实际上仍然是集体使用，保持并努力增加牲畜的季节性移动的机制。本文试图从三个层面来论证“确权不确地”这种制度调整产生的原因和内在逻辑：从技术层面的地方性知识所发挥的基础作用，价值层面的社区社会资本所发挥的核心作用以及政府层面的正式制度规范。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草场共用模式是一种符合社会现实的能够有效利用草场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模式。

关键词：草原共管 地方性知识 社会资本

一、研究背景

草原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之一，不仅对于地球生态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国草原面积达 3.928 亿公顷，占国土总面积的 40.9%(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政府网,2021)。从全球草原分布格局来看，中国北方草原是欧亚大陆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典型的干旱、半干旱草原景观和植被成分。草原对于维护国家生态安全、边疆安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

内蒙古自治区作为我国横跨经度最大的省份，其草原面积占全国草地面积的 20.06%(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政府网,2021)，长期以来为广大牧民提供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与生存环境，草-畜-人在这片土地上达成了相互依赖的平衡。正如费老在讨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时所述，“在游牧区，牧民是把土地主要当作牧场使用的，牧民在牧场上放牧马、牛、驴、驼、羊等，使之不断生长繁殖，从牲畜身上取得肉、乳、皮、毛，用以满足衣、食、住、行的需要”(费孝通等,1999,269)。可以看到，在牧区，草原贯穿于牧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牧区草原之于牧民的意义就如同农业区农田之于农民，离开了草原，畜牧业也就无从谈起。但是草原牧区仍然面临着“三牧”(周立,董小瑜,2013,30,94-107)问题，也就是牧民生活困难、牧业发展减缓以及牧区生态恶化。

在牧民收入方面，以内蒙古为例，在 1986—2005 年的 20 年当中，有 6 年时间里，牧民人均总收入与人均总支出的差额为负值，出现了收不抵支的状况，如在 1996—1998 年分别为-803 元、-207 元和-47 元，在 2002—2004 年分别为-47 元、-192 元和-359 元。在其余年份中，虽然内蒙古牧民人均总收入超过了人均总支出，但平均每年仅超过 134 元，也就只是基

* 鲍晓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社会学硕士。

本维持收支平衡(于立,于左,徐斌,2009,30,78-88+112)。在牧业发展方面,2003年农业生产总值为14870亿元,2006年为21549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3.2%。同期,牧业总产值分别为9539亿元和13640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2.7%,牧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慢于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在牧区生态方面,据相关研究统计,二十一世纪初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相比,内蒙古草原面积减少了约389万公顷;可利用草原面积减少了71万公顷。更需要关注的是,内蒙古全区草原“三化”(退化、沙化、盐渍化)面积已经占草地总面积的62%,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32%增加了约30个百分点;区域内可利用草原中已有74%的面积出现“三化”,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39%增加了35个百分点,并且草原“三化”面积仍待在以年均1.45%的速率扩大(王云霞,曹建民,2007,2)。

“三牧”问题的逻辑在于牧民生活需要改善,似乎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增加牲畜数量,畜牧业的发展也没有走出数量依赖的阶段。但是,草原上原有的草-畜-人的平衡系统是有限度的,牲畜数量增长过快对于草原生态具有破坏作用,从而导致牧业经营风险增大,再加上市场波动,牧民实际增收也面临很多的不确定性。可以看到“三牧”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草畜如何达成平衡,在增加畜产品附加值的同时,保护草原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其中就牵涉到基于自然条件变化的制度设计问题。自然条件的变化是草原研究不可避免的客观条件,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影响因素是草原如何利用,在管理层面努力实现畜牧业生产与草原生态和谐统一,也就是制度设计上如何达成草畜相对平衡。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草原治理基于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安排且如何执行,对于草原的生态保护、牧区的经济发展以及牧民的生活状况具有显著影响。学者范远江认为,“有效的草原产权制度是草原牧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屏障,草原产权制度的变革与创新,必须立足于牧区生产力发展实际,才是可行、有效的”(范远江,2009,74)。内蒙古自治区的草原产权制度也随着国家土地制度的变革而变化,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草场承包制实施,已经过近四十年,草场如何划分、使用和管理,一直都是学界和基层实践者重点关注的问题。

近年来,全国草原生态环境仍呈现“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态势。面对这样的情形,学者们开始反思草场承包制度对草原管理带来的变化(敖仁其,达林太,2005,26-29;杨理,2007,62-67;李文军,2011,006),同时分析草原共管的意义以及探索草场“再集体化”的实践与困难(王晓毅,2009,36-46+95;周立,董小瑜,2013,30,94-107;敖仁其,2014,35,188-191)。但是,不论是对承包制实施效果的分析还是对共用草原重要性的论述,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片面性,因为在现实中,我们总可以发现两者并存的现象。笔者在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的田野调查中也观察到了此类现象,这或许不是草原承包到户制度执行下的不彻底,反而可能是产权制度与地方实际结合的草原治理模式。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形成相互支持模式进行观察和解释,草原共管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在地方能够共用草场的治理模式是怎样的?这样的治理模式与当地的社会文化是如何嵌合在一起的?又是如何得以维持的?是否对牧民的生产、生态的保护以及草原的治理产生了积极影响?这是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以及分析方向。

二、案例地与研究方法

(一) 案例地介绍

本研究的主要案例地G嘎查^①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来诺日镇,北与巴彦彦干苏木相接壤,东与经棚镇相连,南与浩来呼热苏木相毗邻,西与达日罕乌拉苏木交界,位于东经116°45′-117°01′,北纬43°01′-43°36′。从地形来看,G嘎查地处贡格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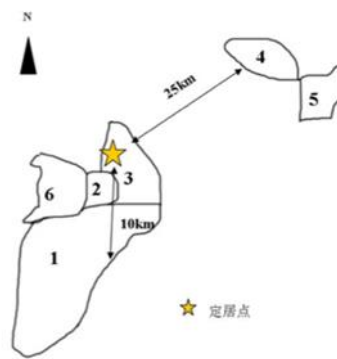
^① 嘎查:内蒙古的行政村。

草原上，东北部为黄岗梁余脉的山地森林，西南为浑善达克沙地东缘，多沙丘，中部为开阔的草原，贡格尔河纵贯全境，地势东高西低，属北温带大陆性气候区，日照充足，日照最长时间为 16 小时，昼夜温差大。年平均降水量在 350 毫米，无霜期 90 天左右，年平均大风天数 40 天左右(克什克腾旗人民政府,2018)。

G 嘎查共有 8 个村民小组，总人数 900 人，其中常住户数 312 户，外出打工户数 40 户，民族组成方面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 24 人，满族 2 人。嘎查草场总面积为 45 万亩，其中放牧场总面积 33 万亩，打草场总面积 12 万亩，饲料地面积 18000 亩，耕地面积 3100 亩，现有牲畜包括牛约 10500 头，羊约 13500 头。

G 嘎查多样的地形和自然资源决定了草原管理需要针对不同的地块采取不同的利用方式，基于调研访谈，目前全嘎查的草场大致可以分为 5 块，如图 2-1 所示。

图 2-1 草场基本格局



- 1: 冬季放牧场（沙窝子）；承包到户，共同使用；
- 2: 春秋放牧场；承包到户，共同使用；
- 3: 春秋放牧场；承包到户，共同使用；
- 4: 夏季放牧场（东山）；承包到户，共同使用；
- 5: 打草场（东山）；承包到户，单独使用；
- 6: 湖泊

G 嘎查的草场分为两大类：放牧场和打草场。放牧场又分为三种季节草场：冬季、夏季和春秋季放牧场。冬季放牧场是沙地，待每年 11 月地冻后再进入，牲畜踩踏也不会破坏土壤植被；春秋放牧场是在湖泊周边和居住地附近的草场，湖边的草场再生性强，返青较早，枯黄又较晚，因此适宜春秋使用；夏季放牧场则在海拔相对较高的东山，通风凉爽，原来有小河流穿过，方便放牧，后来小河干涸后，嘎查通过项目打了两个井，解决了饮水问题。从产权安排来看，除了打草场是承包到户，且各户用各户的之外，其它的四季放牧场都采取了承包到户但保持共同使用的制度安排，也就是本文所说的“确权不确地”的使用方式。

根据与牧民访谈的结果，每年大约有 50% 的牧民没有参加东山的出场，也就是说，他们夏季依然停留在春秋放牧场上，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牲畜较少，而且缺乏劳动力进行搬迁。因此，轮场放牧的时间安排对于出场与不出场的牧民来说，稍有区别。

A、出场牧民时间安排：11 月至次年 4 月，定居点 —— 4 月至 6 月，沙窝子 —— 6.15 至 10 月下旬，东山 —— 11 月回到定居点

B、不出场牧民时间安排：9 月至 11 月，沙窝子 —— 11 月至次年 6 月，定居点 —— 6 月至 8 月底，湖边

表 2-1 不同历史阶段牲畜移动性

阶段	牲畜	时间	草场
1958--1981 年集体经济时代	牛、马、羊	6-8 月	夏草场
	牛、马、羊	4-5 月, 9-10 月	春秋草场
	羊	10 月-次年 3 月	冬草场
	牛、马	10 月-次年 3 月	远端冬草场
1982--2000 年 草场承包到户	马、羊、20%牛	6-8 月	夏草场
	80%牛	6-8 月	春秋和冬草场
	牛、马、羊	4-5 月, 9-10 月	春秋草场
	牛、马、羊	10 月-次年 3 月	冬草场
2001--2010 年 移动性恢复	马、羊、50%牛	6-8 月	夏草场
	50%牛	6-8 月	春秋草场
	牛、马、羊	4-5 月, 9-10 月	春秋草场
	牛、马、羊	10 月-次年 3 月	冬草场

(二)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基于案例研究, 收集资料的方法包括参与观察, 半结构式访谈和问卷法。

基于案例研究对草原共管机制进行分析, 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 草原的生态社会系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 其中的趋动因素和反馈机制也有十分复杂的关系, 只有通过案例分析, 才有可能展现其复杂性。其次, 只有通过分析案例地具体的草原共管模式, 才有可能深入理解草原共管模式的运作机制及其存在的合理性。最后, 只有基于案例研究, 从地方性知识和社会资本的视角进行内在机制分析, 才能与已有的公共池塘资源研究形成有效的对话。

在进行田野调查之前, 笔者对内蒙古牧区的生计模式和生态政策进行了相关的文献阅读。因为本身并非蒙古族, 不了解相关习俗以及生活习惯, 调研是依靠当地的牧民朋友带领, 与他们共同生活, 从而进行访谈工作。在当地的田野调查一共分为两次, 第一次是 2021 年 9 月 16 日--9 月 23 日, 在这期间跟随导师在当地牧民朋友的带领下, 了解 G 嘎查的基本情况, 并且随机与嘎查内的牧民进行访谈, 了解到当地人对气候变化的部分感知以及草场使用的现实情况, 共访谈牧民 8 户; 第二次是 2022 年 7 月 24 日--8 月 7 日, 共访谈牧民 14 户。

在此期间, 笔者还跟随牧民朋友一起出场到夏牧场, 观察当地牧民的放牧行为。此外, 笔者还与现任嘎查领导、老书记及相关干部进行访谈, 了解草场划分的实际情况以及组织情况。通过这两次的田野调查, 笔者对 G 嘎查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 并且获得了当地草场划分时的集体考量和相关规范设定, 就牧民所面临的多重压力也获取了较为详实的资料。

牧民抽样主要考虑不同牧户的经济水平, 按照贫困户 (0-200 个羊单位^①)、中等户 (200-500 羊单位) 和富裕户 (500 以上羊单位) 的分类, 尽量覆盖不同类型的牧户。最后访谈的 22 户牧民中, 有 5 户贫困户, 12 户中等户, 5 户富裕户 (表 2-2)。牧户访谈主要采取半结构式访谈以及问卷, 访谈内容主要包括家庭基本信息、牲畜数量和家庭资产、2021 年畜牧业经营收入与成本、牧户生活成本、牲畜移动性和草场利用方式和牧户负债情况。开放式问题则包括草场健康状况的评价、牧民对于气候变化的感知、气候变化对畜牧业的影响、灾害应对的策略选择、社会关系的变化、草场利用纠纷解决机制、水资源利用以及市场波动影响

^① 羊单位核算方法: 1 只羊=1 个羊单位; 1 头牛=5 个羊单位; 1 匹马=6 个羊单位

等方面。受访牧民基本信息如表 2-2 所示。

表 2-2 牧民访谈基本信息

编号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牲畜数量（羊单位）
FT011091701	女	46	高中	353
FT021091702	男	68	高中	180
FT031091703	男	42	小学	275
FT041091801	男	53	初中	345
FT051091802	男	64	初中	90
FT061091803	男	45	小学	385
FT071091804	女	32	小学	165
FT081092201	男	65	大专	553
FT092072601	男	37	大专	604
FT102072602	男	52	初中	475
FT112072603	男	54	大专	668
FT122072604	女	37	中专	410
FT132072701	男	48	高中	540
FT142072801	男	37	本科	286
FT152073101	男	57	小学	80
FT162073102	男	59	高中	320
FT172073103	女	49	高中	310
FT182073104	男	60	大专	470
FT192080401	男	37	初中	131
FT202080402	男	42	初中	545
FT212080701	男	37	小学	245
FT222080702	女	43	初中	390

三、草场共用模式的开展

为了解决承包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案例地的牧民自发采取“确权不确地”的草场共用模式，在协调牧业生产、维持社区关系以及生态保护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且没有衍生出公地悲剧。

在 1980 年之前，G嘎查的草场仍然实行的是集体统一管理，统一使用，牲畜也不属于个人，由嘎查进行管理，大体上保留的是公社化时期的管理方式。那个时期在草场利用方式上，放牧仍然严格遵循着四季轮场的传统，每年春季的 4 月到 5 月，牛、羊、马都在春季草场上放牧。6 月开始则迁至东山的夏季草场，一直放牧到 8 月底。到了 9 月和 10 月，所有牲畜则动身回到秋季草场上。等待 11 月沙地完全上冻之后，牲畜便进入到沙窝子过冬，羊主要在沙窝子北面，牛和马因为需要更大面积的草场，则走得更远到沙窝子的南部过冬。主要的放牧人员诸如牛倌、羊倌，都是由生产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关安排。直到 1983 年，内蒙古自治区实行“草场公有，承包经营”、“牲畜作价，户有户养”的畜草双承包责任制，G嘎查也开始将牲畜划分到户，但是草场仍然是属于嘎查，并没有承包到户，所以采取的依

然是草场共用的方式，也就是牲畜家庭经营与草场集体使用的方式。根据访谈的牧民回忆，在这段时间，当地也没有发生很严重的草场退化问题。

那个时候人少，养的牲畜也少，一家有 20 个牛就算很多了，感觉草场就没啥变化。
(FT102072602)

直到 1998 年，G 嘎查开始落实 1997 年出台的“双权一制”产权制度，也就是草场所有权归嘎查，使用权属于牧民，草场承包到户。开始划分草场承包到户，首先是按照牲畜头数与人口数量确定草场的划分数量，比例是人口占 70%，牲畜占 30%。在具体划分草场时，由于嘎查的四片草场中有涉及到河流以及湖泊的部分，考虑到牲畜的饮水需求，倘若将草场划分为块状，一定会有部分牧民家的牲畜饮水困难，并且会因为草场质量的差别而产生更多的矛盾，要想达到公平，就需要将草场划分成更加小的地块，即在草场质量相差不多的区域内进行精细划分，平均一家几十亩。但是显然这样的划分方式是不适合放牧的，范围太小，更容易导致草场质量下降。同时这样划分每家每户要建更多的围栏，成本将会大大提高，当时的牧民都不同意这样划分。而另外一种划分方式就是按照条状进行划分，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均衡每家每户分到的草场质量，并且也能够兼顾水源的运用，减少无法饮水而需要增加其他成本的可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草场划分的公平性。但是这样的划分方式也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嘎查的草场是较为狭长的，南北长度可以达到 5、6 千米，这样一来，每家每户所能够分到的宽度是非常有限的，1000 亩的草场所划分的宽度也就大概几十米，如此狭窄的草场，极大限制了牛羊的活动范围，单一牧民根本无法对这样的草场进行有效管理，所以对这个方案也纷纷表示不满意。正如牧民所述：

我们大队是从北边一直到南边，将近 5 公里的一条，从来也就这么宽，这有 1000 亩（草场），你咋拉（网子）？你说我拉了没法经营，宽就几十米了。横着分就更乱套了，麻烦，边疆那头（最靠边那块）谁去，没人去，你如果真的要分的公平的话，每个人在两边都要有一小块，中间要有一小块，没法放了，然后一旦有争议的事，长条的，家家都还可以参与。假如你要横着分的话，咱们说南边的两三家不管了，对我无关不去就不去了是吧？咋分就都有问题。（FT132072701）

根据牧民回忆，当时村委的主要干部就和大家提议，在定居点附近的草场按照村民小组进行划分，不用具体划分到每家每户，按照人口的数量和牲畜的头数把每家每户名义上承包的草场面积计算出来，但是同一个组的草场内部就不划分，大家还是按照之前一样都可以在其他牧民名义上承包的草场上进行放牧，拉上一个大围栏，这样减少围栏建设的费用，大家的牲畜也都能够自由活动。对东山附近的夏季草场和沙窝子附近的冬草场就各建设一个围栏，和其他嘎查的草场区分开来，满足季节转场的需要。对于打草场，建设一个大围栏，平时大家都不进去放牧，在内部也不建设围栏，各家各户做好统一的标记就行。最后大家就这个方案达成了一致，就是在执行国家相关政策的基础上，将草场名义上划分到户，但实际上保留草场的共同使用，以减少围栏建设的投资和对牛羊自由流动造成的限制。

草场还是不分好，这样咱们放牧都方便多了，还省了拉网子的钱，夏天还能换个地方，对牲畜也好，把那头的草场啥的也能养一养。牲畜还是得分，要是不分牲畜的话，就和以前大队一样，有些人就不干活了。（FT102072602）

图 3-1 冬季牧场划分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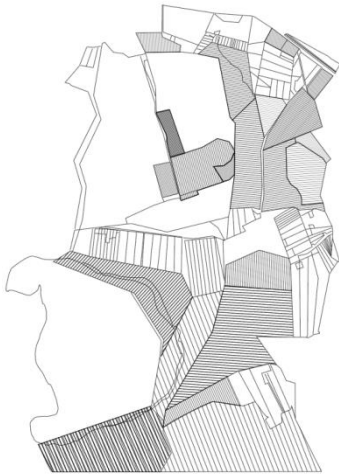


图 3-2 夏季牧场和打草场划分示意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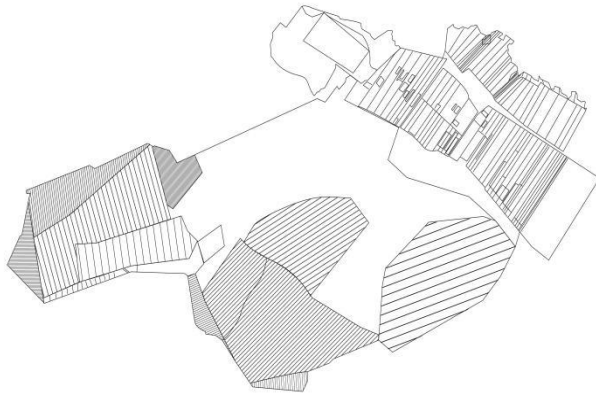


图 3-3 夏季牧场和打草场划分示意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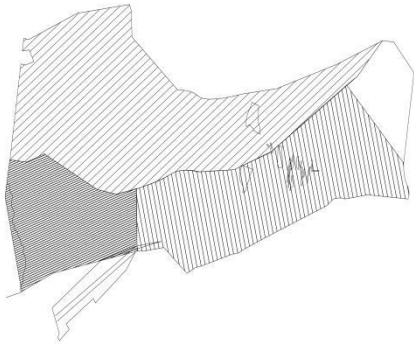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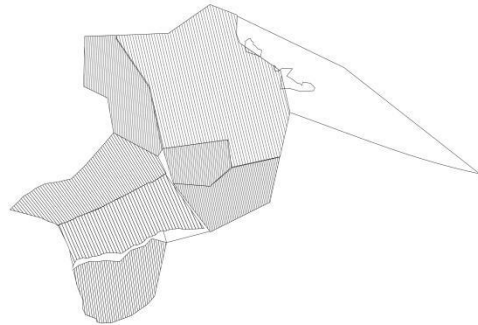


图 3-4 冬季牧场划分示意图



以上图为该嘎查延续至今的草场划分示意图，包括冬夏季放牧场以及打草场，在图上呈现了每家每户承包到户的形态，也就是条状划分，而在实际中仍然是共同使用的状态，也就是“确权不确地”的私地共用方式。

四、草场共用模式的特点与内在机制分析

（一）特点

G嘎查“确权不确地”的草场共用模式主要有两方面的特征：

首先是牧民广泛参与，基层自治组织引导充分协商。草场在名义上分到每家每户，实际上共同管理集体使用的草场管理方案就是在社区牧民的积极参与下，基层干部发挥引导作用诞生的产物。此外，保留两季牧场进行转场放牧，对向嘎查外进行出租草场的行为进行监督并设定相关规范的过程，都充分发挥了牧民的集体智慧，并且得到了有效执行。基层自治组织也就是村委在组织协商以及提供符合现实条件的方案上都起到了领导作用，使得确权不确地的草场共用模式在时间的检验中得到了牧民的广泛认可。

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对外建立排他性，加强内部凝聚力。当地采用草场共用模式的时候就已经天然形成了对社区之外牧民放牧的排斥，因为这是所有牧民在场的决策，并且草原产权只有在外部是明晰的，在内部实际是一种合作关系，而不是独立的产权所有者，因此不会出

现多个产权主体掠夺式使用草场，或者相互妨碍使用草场的状态。但是这样作为关系存在的草原产权只能够在内部发挥作用，协调内部关系，当有外来者进入到共用的草场，就必然是掠夺式的草场使用，草原产权的规定便很难对此做出反应，原先形成的“反公地悲剧”的良好发展模式就会被打破。所以在当地的草场共用模式需要建立其对外来者的壁垒，这样才能够保持内部草-畜-人三者的良好平衡不被打破。

（二）内在规范

G 嘎查通过集体协商的方式确定的草原共用模式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公地悲剧并没有出现，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有效利用，这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力量：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作用和社区社会资本的核心作用。

1. 地方性知识作为基础

地方性知识深深扎根于地方文化当中，只能够在其产生和存续的社会文化共同体中存在，其管理方法于当地而言是适应的，一旦剥离，失去其所依附的共同体也就失去了其自身主体性与能动性。于草原而言，地方性知识主要是牧民在与自然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适应中形成的经验与技术，主要是草场的利用方式和以流动性为核心的放牧方式。

在草场的利用方式上，草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资源系统，而是包含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条件的不同。在不断变化的生存环境中，生长于其上的植物也因时因势而变，因此对于草场的利用方式选择就绝不是简单的产草量的计算，而是植物-动物-环境的综合考量。在案例地，牧民对于当地打草场的使用就充分体现了这种考量。

今年打草要晚几天了，今年东山那边去看过，那边的草籽还没落，现在不能打，打完明年草就不好了。(FT132072701)

现在是春天长草的时候，不能放牧，你说90%草可以保护，但是有的草长起来以后，有的草就不长了，对，比如说扎人的狼针草，一开始最快的长出来，牛马就吃那个草，羊就不吃，扎，长的矮一点或者是少一点，别的草就长，那个草长了，别的草就不长了。(FT142072801)

牛羊马一起放更好，就像马，吃完了，第二年草更好，马粪在的那块土，就发酵似的，底下松松的，草好像抽上来，再一个马蹄子，就和现在那种松土的机器一样，秋天那个草籽，马蹄子都给它踩下去了，这样第二年才会有草啊。为什么有牛，有山羊，有骆驼，有马啊，进化出来，草原上合适的。骆驼呢，要看地方养，这边没有，好像阿拉善还是哪，禁牧以后，老鼠都成精了，骆驼放出来以后老鼠就没有了。(FT081092201)

在当地牧民看来，草场上最好的状态是多种牲畜同时存在，也就是蒙古族人传统的“五畜并举”的观念，这样对牲畜以及草原都是良好的保护行为。同时，在不同的季节，也要充分利用草场的不同地理位置，春季的营盘要选在背风雪的地方，免受风雪的危害，使牲畜早日吃上青草，适于保胎和接羔；夏季是牲畜成长和抓膘的主要时期，因为夏季气候炎热，蚊蝇较多，在选择营盘上就要求高地通风的地方，使牲畜能很好地进食；秋季是牲畜抓膘的最后时机，要选有草再生的草场，草质细嫩。冬季就把沙窝子作为冬营盘，这样的地方风小，温暖一些，且不易积雪。结合牲畜不同的生长周期选择最适宜的资源空间，保证了在特定时间内能够得到最好的资源，这充分反映了牧民对时空变化的适应，也就是基于代际传递的放牧经验采取合适的草场利用方式。

以移动性为核心的放牧方式则是地方性知识的集中体现,季节性轮牧是根据不同季节选择不同地形以及不同植被条件的草场进行放牧的方式。在拉铁摩尔看来,技术的适用性和重要性取决于社会对它的需求弹性。因此,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是社会与技术相互影响,而不是技术造成了社会(拉铁摩尔,2010:45-47,54)。本质而言这是对草原环境高度不确定性的应激性调整,这样的移动可能是为了季节性气候带来的优势资源,可能是为了规避季节性灾害。

7月到这边得待到10月,11月左右下旬开始,天冷了就回沙窝子,草一年就长起来了。一般就是秋天冬天沙窝子里头待着了。四季春夏秋冬四个场,冬天在沙窝子,春天就在河套边。(FT142072801)

在调研地,大多数牧民在劳动力满足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季节性轮牧,夏天仍然到东山进行出场,冬天到沙窝子放牧,在他们的眼中这样的放牧方式能够“养草”,同时能让牲畜“上膘”,比起定居放牧的方式更加符合传统。以移动性为核心的放牧方式并非简单的逐水草而居,而是与自然相适应的弹性设计,是维持草-畜-人平衡的关键方式。“移动性”是蒙古族传统畜牧业最为基本和精致的生存智慧,它不仅体现了对生态条件多样性的适时应对,还体现了社会组织在“不确定”中保持秩序与整合力的能力(荀丽丽,2012,44,81)。

正是拥有共同的地方性知识,牧民在选择草场的管理方式上才会更加凝聚于草场共用,代际传递的放牧技术与经验为牧民指引了方向,也为共用模式奠定了基础。

2.社区社会资本作为核心

维持草场共用模式的核心是嘎查内部丰富的社会资本,它凝聚了当地牧民的共识,提高了牧民在集体行动中的能力,保持共用模式的稳定。具体而言,社会资本对于当地草原共用模式的形成以及维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为草原共用模式提供强大的认同基础。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曾提出“集体意识”的理论,认为将个体连接在一起的是相同的文化习俗、价值标准以及道德规范。在涂尔干看来,是社会把人提升起来,使其超越了自身,甚言之,是社会造就了人。因为造就了人的乃是由智力财产的总体所构成的文明,而文明则是社会的产品(爱弥尔·涂尔干,2006,408-409)。在调研地,作为主体民族的蒙古族,他们拥有着相同的文化习俗与道德意识,因此他们能够在这样的集体意识之下采取相似的行动,他们坚持万物有灵的自然观,认为草原上的一草一木,飞禽走兽,所有的动植物都是有灵性的,乃至湖泊河流等自然景观,也都被看作是有生命的,对于这些存在必须要给予足够的尊重,倘若轻易破坏,一定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就我们在一起祭敖包的时候,都是一早天没亮就起来,要么就是半夜,小组或者嘎查的人都去,说是祭天神,也是祭山神,像这边上的山啊都有自己的山神,都有蒙语的名字,大家都信这个。(FT142072801)

这样神圣自然的观念在当地集体祭祀敖包的过程中能够得到相应体现,敖包标识了牧民的放牧空间,同时存在的各种神灵保护着这一片草原,为了得到相应的庇护,敖包所标识的空间成为了牧民共同的信仰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天地人是一体的,万物有灵使得草原成为了神圣,这一神圣空间与牧民放牧的社会空间是一体的,天然塑造了牧民将对集体的认同和对自然的尊崇合为一体的观念。

此外天人合一的生态观以及敬畏自然的伦理观都是他们所坚持的集体意识,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深刻嵌入在草原牧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中的,这种共同的道德意识也就指导着

草原牧民选择草原友好型的发展方式，从古至今始终如此，季节性迁移就是最好的例证。同时也正是因为如此强烈的集体意识，使得草原牧民产生超脱于个人的集体认同，这种认同既是集体意识在行动中的产物，同时也推动集体意识的不断增强。在相同的精神内核的指引下，草原牧民更加倾向于集体行动，正是在这样的共同体意识的支撑下，牧民愿意按照符合传统文化的管理模式进行放牧活动，他们行动策略的根基在于深厚的文化和共同体意识。

其次，社区制度与社区规范共同作用为草场共用模式提供制度支持。长期生活于草原、依赖草原的牧民，早就在与草原的交往中积累了丰富的管理和使用知识，这些知识是牧民进行生产生活的主要支撑，指导牧民如何与草原和谐共生，选择适合的管理模式，有效地在保障草原生态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发展。与草原不断调试积累的知识无疑是牧民在对草原进行管理时的有效社会资本，为草场共用模式的产生奠定了制度基础。同时在组织生产的实践中产生的社区规范，也即村规民约，以非强制、非正式的形式为草场共用模式提供另一重制度保障。如此所形成的管理制度，首先在制度成本上就取得了优势，完全基于牧业实践，不需要额外的制度设计，而且正是由于完全基于牧业实践，在实施时牧民接受与理解的难度被大大降低，从而制度的规范力量能够得以最大程度地发挥。

咱们家牛多，他们家羊多，但是他们家有没有牲畜啥的是吧？但是他们这肯定草场有是吧？也出打工。这期间人家用草场，这块有矛盾，矛盾的解决方面，咱们呢有这么个方案，你说咱们村里就是草畜平衡的这块，村里可以平衡，而且我就租你草场是吧，然后我给你掏点钱，这都对你出去打工了，我给你点钱。比如说还有说外出打工的，他把自己的草场让外面的人来放啊，那个情况也有，有这个情况下，咱们就在自己村里调节，外场就是嘎查或者是咱们苏木以外，这些个人来要是走草场的话，咱们就不允许，要不然那个事就多了。(FT112072603)

原先有一家分了150亩地，他们有4个小子，他的大小子说是不来了，租给别人，那就3个小子，一来的话那不是150亩分，加上他们爹，40亩地一个人，拿个600个羊来，太过分了，有的人就知道了，一个知道那不是一传都知道了吗？大队也来说，大家伙也都不满意，本来多个几十个没事多吃几口的事，最后就没让他来。(FT031091703)

在当地形成的社区规范，以非正式的制度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约束了共用草场上出现的过度放牧问题，同时更重要的是，在面对牧业实践问题的时候，在牧民以及嘎查的共同努力之下，对牧民之间的矛盾进行了有效化解，充分发挥了牧民作为草原主要使用者和管理者的主体作用。

最后，互惠关系与社会信任保障草原共用模式的运行。生活于同一片区域的牧民，在生产活动的组织下，进行着高频次的互动，尤其是从古至今保持的集体行动逻辑，使得牧民始终保持着一种高度互惠的关系，并且有着稳定的互惠预期，正是如此，声誉在共同体中显得格外重要，违背相应社会规范的成员，虽然不会得到直接的惩罚，但是可能遭受到其他成员的报复，并且被共同体所排斥，从而失去互惠关系，所以这也激励着每一位成员以有利于共同体的方式采取行动，而不是相反。

干活要干不动，招呼招呼就来了，不是亲戚也来，一招呼就来了，他不来的话，下次他干活也不给他忙去了，然后这点挺好的。小活的话花钱的话省事，拿点钱就完事了，要小活你找几个人来请客吃饭，喝点估计比那还贵。以前那是没办法，只能说大家互相帮，没有地方去雇人干。现在主要成本问题也是，你叫唤人干上，吃喝你成本也比他高了，人家干活你还得去给他帮忙，这成本又高了，那样的小活就花点钱了。打草的时候大家都忙，那个时候雇人也贵，就自个儿拉，亲戚邻居啥的有空的话就一起帮帮忙，

比如家里车子多的就匀一匀，就这样。(FT031091703)

在案例地，牧民之间仍然保持着互惠期待，即便在受到市场导向的生产思维影响下，依旧会选择进行互相帮助，履行自己在这个集体中的社会责任，保持自己的声誉，从而为草原共管提供了强烈的社会联系基础。

与互惠关系紧密相连的就是社会信任，能够形成互惠关系，就是基于长时间的互动并且互相足够熟悉，能够进行积极的行为预测，从而在交往中积极付出，因为信任能够得到其他成员同样的回报。就如同上文所提及的在共用草场上超过约定的牲畜数量，牧民之间相互信任不会大规模超出，形成对共同规范的内在信任与行为默契。

你要是牛少的话，牛多的家你给你点钱也行，这样也可以，我们组那几家的话，基本上牛差不多一两家能多点，但是这些家都不吱声的话就没有那些事了，反正没有多大的矛盾，一般都没什么啥事没有。他也知道自己那么多，但现在那些家反正差不多就行了，反正抬头不见低头见是吧？太多了也不好意思，都是熟的，就算有一两个那种人，但是时间长了不怎么搭理他了。(FT222080702)

正是以社会资本为内核，调动牧民的集体认同，通过地方性知识与社区规范形成的制度安排，在互惠关系与社会信任的保障下，草场共用模式才得以形成并且维持。

(三) 外在保障——政府提供正式制度规范

上文讨论了在技术层面提供基础的地方性知识和在价值层面作为核心的社会资本的内在机制作用，还有一个方面需要注意，政府相关政策所提供的制度性规范，为当地的草原共管模式提供了外在保障。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防止与周围嘎查的边界争端，所以嘎查鼓励牧民到沙窝子进行定居，当时有大概有 21 户牧民同意长期居住在沙窝子中，主要由于他们大多在定居点没有房子。但正是这样的安排导致了后续的矛盾发生，居住在沙窝子的牧民长期使用原本只在冬季利用的沙地，导致沙地植被没有恢复时间，同时在定居点的牧民由于草原质量下降也无法在冬季搬到沙窝子利用他们的草场，提高了他们的放牧成本，引起了很多不满。在嘎查领导不断地劝说之下，在 1996 年左右，有 15 户牧民从沙窝子搬出，但是仍然有几户牧民不愿意离开。直到 2004 年，沙窝子所在的浑善达克沙地被划入国家公益林，嘎查与林业部门达成协议，将沙地作为国家公益林进行围封处理，并且聘请护林员进行巡逻，监督围封状况，在每年围封期内进入会受到相应处罚。在这样的措施之下，围封期内便没有牧民在沙地进行放牧，并且后续在 2009 年村集体申请了生态移民项目，为迁出牧民在定居点提供住房和棚圈，较好化解了牧民之间的矛盾，保护了沙地生态，同时为当地草原共用模式提供了间接助力。

此外，嘎查内执行的相关草畜平衡政策，也限制了共用草场上牛羊数量的增长。在禁牧区域或草畜平衡区休牧期间放牧的，由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按每个违法放牧羊单位收取 120 元的罚款（山羊全年禁止放牧）。在草畜平衡区超过核定适宜载畜量放牧的（以 7 亩草原饲养 1 个羊单位标准核定各户的适宜载畜量），由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每人超载羊单位 100 元的罚款（《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2021）。正是严格的制度限制，为草原的合理使用提供了秩序，也成为非正式制度保障之外的规范性秩序，推动了当地相对稳定的草场管理与利用模式的维持。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文通过对案例地“确权不确地”的草场共用模式的描述与内在机制分析，从技术层面的地方性知识所发挥的基础作用，价值层面的社区社会资本所发挥的核心作用以及政府层面的正式制度规范三位一体的视角阐释了草场共用模式的内在逻辑，认为草场共用模式是一种符合社会现实的能够有效利用草场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模式。草场共用模式是在满足“双权一制”确权到户要求下，结合地方实际进行的对草场管理模式的探索，在这一模式当中，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提供了认同基础，非正式的社区规范提供了制度支持，互惠关系与社会信任提供了运行保障，同时政府为共用模式的维持提供了间接的制度支持，形成外在保障。

根据本文的分析，草场共用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继承传统游牧体制内的管理方式所进行的模式创新，实际上牧业发展的每个地区都有草场共用的集体模式经验，以及充足的地方性知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草场共用模式适合所有的区域，在草场共用模式之下，牧民仍然面临着自然、市场以及社会的多重压力，所以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草原管理模式。但是对草场共用模式的分析仍然能够为其他地区探索适宜自身的草原管理模式提供一定启示，实际上就是在草原管理模式的过程中需要把握的几个原则，首先是多元并存的原则，地方性知识才是真正切合地方实际的存在，在方向不变的前提下应该更多地尊重和利用地方性知识；其次重视牧民在草原管理模式中的角色，牧民是所有管理模式中最直接的执行者，如何推动牧民在模式创新中发挥更积极作用需要进一步思考。再者，政治制度所提供的规范性秩序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的外在保障为草原治理迈向未来，迈向现代化提供了基础。对于自主治理模式，地方性知识和社会资本所共同构成的内在规范可能就已足够，但是实际上，由内在规范作为治理的基础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在自主治理过程中，基于社会资本的作用，可能推动地方精英的形成，那么此时在社区内部的公平问题恐怕就难以忽视。同时在人员流动性不断加强的当下，非正式制度的规范很可能无法解决矛盾，正如案例地所出现的沙地移居事件，需要正式制度的保障才能更好补充其不足，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不是简单的政府退出，政府是内生于经济转型与发展过程中的。

综合而言，草原管理模式的发展需要探索多元力量结合，多方共同参与，以自主的管理模式为内核，重视地方，基于现实条件，运用文化内核，重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创新管理模式，同时融入政府的正式制度设计，为之提供有效的规范性秩序，使得内在规范与外在保障相统一，或许才能够更好实现草原的有效治理。

（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在草原治理的过程中，存在多个行为主体，价值取向大体一致，但是在行为目标的设置上存在差异，有着并不一致的行动逻辑。草原治理中的国家层面的战略目标是最重要的，也就是在制度的顶层设计中所关注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民生改善，这是国家逻辑；在地方政府而言，执行国家逻辑当然是必要的，但地方政府同时是地方事务的主要负责对象，所以会受到如“锦标赛”体制带来的政绩观影响，在各个目标中进行收益与成本的权衡；就市场而言，既需要对短期利益的追求，同时迫于国家督查，也需要长期绿色发展的战略。因此草场的管理模式是一个涉及多方关系的复杂系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牧民以及市场，各方的诉求实际上并不完全一致，并且存在各自不同的行动逻辑。本文更多关注的是从一个小范围内牧民如何采取最适合自身发展需求的视角来分析草原的管理模式，而相对忽视了政府以及市场在其中的考量，地方的非正式制度设计其实是政府自上而下政策推行的一个补充与在地化，市场又会如何发挥调节作用，这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进行平衡，对于未来草场的管理模式发展可能会有深刻影响，需要进一步讨论。

此外,对未来影响草原共管模式发展的因素未加以综合考量,草原共管模式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草原治理模式,所以需要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分析。当现代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发生冲突,并且年轻一代逐渐丧失传统价值观的状况下,共管模式所建立的基础又该如何讨论;其次在雇佣关系不断发展的当下,市场化进程不断加速,那么传统的合作以及互惠关系不可避免将受到冲击,也即是当雇佣关系所带来的利益超越传统互惠带来的合作收益时,甚至会发生雇佣关系取代互惠合作关系的情况,传统合作互惠的关系是否会成为发展的阻碍,是否会产生更多的矛盾。在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当下,投入-产出的经济理性思维逐渐成为主流,传统互惠以及文化逐渐式微,社会资本在市场经济、现代技术以及当代社会关系的冲击中不断散失,那么自主治理模式的基础可能也会不断削弱,在这一过程中,是否会形成新的社会资本推动新型自治模式的出现,以及各级政府和市场如何参与其中,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 阿如娜,2020,内蒙古牧区草场产权与基层治理结构研究,吉林大学.
- 阿岩,乌恩,1999,蒙古族经济发展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著,余逊达、陈旭东译,2000,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
- 奥尔森,1995,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 敖仁其,2003,草原产权制度变迁与创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 敖仁其,2014,对合作放牧制度的实证与理论思考,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 敖仁其,达林太,2005,草原牧区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
- 茶娜,周锦,2014,内蒙古草原牧区产权制度的调查与建议,中国畜牧杂志.
- 丛培义,孙志岩,周聪,2008,草原产权制度改革的研究,吉林畜牧兽医.
- 达林太,娜仁高娃,阿拉腾巴格那,2008,制度与政策的历史演变对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的影响,科技创新导报.
- 达林太,郑易生,2010,牧区与市场——牧民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范远江,2009,西藏草场产权制度变迁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
- 范如,茶娜,2011,草原产权和移民政策对内蒙古牧区的影响,内蒙古农业科技.
- 费孝通等,1999,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谷苞 原载《民族学研究》第8辑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符拉基米尔佐夫,1980,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俊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盖志毅,2006,明晰草原产权——牧区建立节约型社会的制度基础,生态经济.
- 国际草原大会,2008,草原牧区管理——核心概念注释,北京:科学出版社.
- 黄玉玺,李军,2017,中国草原产权制度演变及其效果评价,古今农业.
- 金山,陈大庆,2006,人与自然和谐的法则——探析蒙古族古代草原生态保护法,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 金彤,刘永功,朱映安,2011,共管机制下草地资源管理的行为主体分析,安徽农业科学.
- 科斯,1994,社会成本问题.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出版社.
- 柯武刚,史漫飞,2000,制度经济学: 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李惠斌、杨雪冬,2000,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李文军,2011,牧区需要灵活多样的产权制度安排,中国民族报.
- 李新,2007,内蒙古牧区草原土地产权制度变迁实证研究,内蒙古农业大学.
- 刘博,励汀郁,谭淑豪,赵青,2018,现行草地产权制度下牧民的技术效率分析,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 刘艳,齐升,方天堃,2005,明晰草原产权关系 促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农业经济.
- 梁琳,胡小玲,2009,论完善草原产权制度,阴山学刊.
- 诺斯,1994,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 折晓叶,陈婴婴,2005,产权怎样界定——一份集体产权私化的社会文本,社会学研究.
- 孙志岩,周聪,2008,草原产权制度改革的研究,吉林畜牧兽医.

- 王娜娜,2012,围栏困境—对于贡格尔嘎查围栏项目实施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 王晓毅,张倩,荀丽丽,2010,非平衡、共有和地方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王晓毅,2009,从承包到“再集中”——中国北方草原环境保护政策分析,中国农村观察.
- 王晓毅,2009,环境压力下的草原社区——内蒙古六个嘎查村调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乌云嘎,2016,草原家庭承包制实施的经济绩效研究,南京大学.
- 荀丽丽,2012,失序的自然——一个草原社区的生态、权力与道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杨理,2007,草原治理:如何进一步完善草原家庭承包制,中国农村经济.
- 杨理,侯向阳,2007,完善北方草原家庭承包制与天然草地可持续管理,科技导报.
- 伊丽娜,2013,草原产权制度与“公地悲剧”、“反公地悲剧”,中央民族大学.
- 于立,于左,徐斌,2009,“三牧”问题的成因与出路——兼论中国草场的资源整合,农业经济问题.
- 赵红羽,2015,“文革”结束后内蒙古自治区草原产权制度的演变(1977—2005),内蒙古师范大学.
- 赵澍,2015,草原产权制度变迁与效应研究,中国农业科学院.
- 周立,董小瑜,2013,“三牧”问题的制度逻辑——中国草场管理与产权制度变迁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回流儿童的回乡适应策略研究

黄妍喆*

提要: 返乡后的环境挑战和回流儿童的自我效能共同影响回乡适应策略的选择,面对不同类型的系统环境挑战,根据对环境挑战和自我能力的认知,回流儿童返乡适应策略包括:“重塑”的策略、“融入”的策略、“顺应”的策略和“区隔”的策略。基于以上的研究发现,本研究提出一些建议:1.重要他人要具备儿童视角,提高回流儿童应对挑战的自我效能;2.多方合力,为返乡儿童创设良好生活环境和学习环境;3.重视学校社会工作岗位的建设,引入专业社会工作者提供服务。

关键词: 回流儿童 返乡读书 适应策略 扎根理论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对于社会大众而言可能并不陌生,他们看似是两类不同境况的人群,但实际上是身份可以互换的同一人群。在大城市里面,并非所有的流动儿童都可以和父母一起在城市里生活、学习直至成年,在成长过程中,这些孩子可能会因为大城市的升学限制、学校关停等情况,不得不独自返回老家继续读书,他们的身份随之转变为留守儿童。这部分经历特殊的群体叫做回流儿童。对于他们而言,返乡却意味着离家。

因为升学原因返乡的孩子大部分处于青春期,或者正要进入青春期,青春期是个体的认知塑造期,在这个阶段,儿童的逆反心理和对抗性行为时有发生,更加需要家人的关怀和引导,如果在这个阶段脱离家庭,独自返回陌生的家乡,对他们的生活会造成什么影响?

现有文献关于回流儿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为什么回流”的研究,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分析了个人和家庭、社会关系网络、宏观政策制度如何影响流动家庭的回流决策(梁宏,任焰,2010,57-65;李巧,梁在,2019,65-77;唐杰,2011,97-103;Zhou S, Cheung M,1327-1342)。已有的研究多采用“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等全国性的数据库,或者自发问卷对回流儿童返乡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这些研究具有以下优点:研究样本量大,省市的覆盖面广,从客观的量化角度分析各类影响因素与回流儿童返乡之间的关系,对于笔者探索回流儿童返乡原因贡献了值得参考的数据。其二是关于“回流之后怎么样”的研究,从在校学业、社会适应、心理发展等方面切入,发现问题,具体包括:学业表现不容乐观,认知能力较为低下,留级和辍学现象严重(黎煦,朱志胜,2018,26-38;马丛红,刘琴,2011,87-88;张宝歌,2012,74-78);社会适应状况较差,主要体现在文化适应、人际关系适应和心理适应方面(杨磊,2016;谭千保,肖倩怡,2016,1-4;Liu Z, Zhu F,2011, 445-461)。不同年龄回流的儿童适应情况有所差异,但总体来看需要加强引导。身心健康状况较差,存在一定的心理压力、抑郁、焦虑和逆反行为(靳雅楠,2017;黎煦,朱志胜,2018,26-38;Hu S,2019, 145,641-661)。已有研究还认为目前回流儿童的社会支持网络存在工具性支持不足、情感性支持不够、社会支持主体单一等问题。就回流儿童的社会支持建议,已有研究主张提高家庭、学校和社区三大系统的联动,在政策安排上强调对这类群体的福利保障意义(盛玉昌,贾冰,2016,349-350;陈春强,2017;胡帅星,2018)。很显然,国内外学界已经关注到了回流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并且从人口学、社会学、社会工作、社会保障、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视角出发,采用量化方法和质性方法进行不断的研究,揭示了这一群体尤其是其身心健康发展面临的挑战,成果丰富。

但是,笔者从自身关注的问题出发,认为已有研究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一是现有

* 黄妍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社会学硕士。

的研究中回流儿童多数是以一个负面特点居多的一个群体形象出现的,研究多从“局外人”的视角将回流儿童视作回流决策的被动承受者。二是从主题上看,对回流儿童的研究多集中在“为什么返乡”及“返乡之后怎么样”这两个主题的探讨上,但对于该群体自身应该如何返乡后的适应性问题极少涉及。

基于以上的文献梳理,本研究将主题落在了回流儿童日常生活的场域之中,关注他们的生命体验和行动过程,从儿童的主体性出发深入挖掘并分析:回流儿童对于返乡经历的体验是怎样的;研究者认为的问题与回流儿童对困难的认知是否相符;回流儿童采取什么策略来应对他们所认为的问题。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运用了质性研究中的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采取目的抽样和理论抽样,遵循以下标准寻找访谈对象:1、有独自从深圳市返乡就读的经历;2、对自身所处的境遇以及返乡经历有一定程度上的认知与理解;3、具备一定的言语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最终有11名回流儿童参与了完整的访谈。

表 1 受访回流儿童样本信息

编号	性别	年龄	就读年级	返乡时长(年)	返乡地点	返乡后照料者	父母职业
01	男	13	初一	2年	跨省 市级公立	舅舅	个体经营
02	女	15	初二	2年	省内 市级私立	奶奶	父:工厂工人 母:无业
03	男	14	初二	1年	省内 县级公立	爷爷奶奶	工厂工人
04	男	16	初三	2年	跨省 县级公立	爷爷奶奶	父:工厂工人 母:打零工
05	男	15	初二	半年	省内 县级私立	爷爷奶奶 大伯	个体经营
06	女	17	初二 (复读)	1年	跨省 县级公立	前期:老师 后期:母亲好友	父:个体经营 母:工厂工人
07	女	14	初一	1年	跨省 县级公立	奶奶	父:个体经营 母:工厂工人
08	女	16	初三	2年	跨省 县级公立	姑姑	父:物流工人 母:无业
09	男	14	初二	1年	省内 县级公立	母亲义兄	个体经营
10	女	13	初一	1年	省内 县级私立	外公外婆	个体经营
11	男	14	初一	1年	跨省 市级公立	姨妈	个体经营

三、编码策略与资料分析

(一)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一个将资料打散，赋予概念，然后再以新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操作化过程。(陈向明,2009,332)”

第一阶段，是从访谈原始资料逐步形成概念的过程，这个阶段需要将原始资料打散、重组，详细地登录原始资料中的关键信息，做到越细越好，不断丰富概念直至饱和。笔者将在表 2 和表 3 展示部分原始资料的打散、重组和形成概念的过程。

表 2 将原始资料打散过程示例

访谈原始资料	打散
<p>在深圳和爸妈相处的时间特别多，每天一睁开眼睛，走出房间就看到爸妈，觉得那段时间非常地幸福。现在学校不能带手机，只能每周回家视频，有时候就会很想他们。</p> <p>平时要帮忙干农活，然后帮爷爷奶奶做顿饭吃，家里的饭是我负责。之前没做过，刚回来那段时间跟着堂哥学着做的，不会也得学着做，要帮爷爷奶奶减轻负担嘛。</p>	<p>A1-1 返乡前与父母生活，天天见面</p> <p>B1-1 感觉返乡前的生活很幸福</p> <p>A1-2 返乡后与父母通过视频联系</p> <p>B1-2 想念父母</p> <p>A1-3 返乡后分担农活和家务</p> <p>A1-4 返乡前没做过农活和家务</p> <p>A1-5 返乡后学习家务</p> <p>B1-3 不得不学，承担责任</p>

表 3 形成概念的过程示例

重组	主题提炼	形成概念
<p>A1-1 返乡前与父母生活，天天见面</p> <p>A1-4 返乡前没做过农活和家务</p> <p>A2-1 返乡前被父母照顾</p> <p>A2-4 返乡前父母包揽家务</p>	返乡前被父母照顾	独立的付出
<p>A1-2 返乡后与父母通过视频联系</p> <p>A1-3 返乡后分担农活和家务</p> <p>A1-5 返乡后学习家务</p> <p>A2-2 返乡后一个人生活</p> <p>A2-5 返乡后自己照顾自己</p> <p>A4-1 自己独自承担</p>	返乡后被迫独立	
<p>B1-1 感觉返乡前的生活很幸福</p> <p>B1-2 想念父母</p> <p>B1-3 不得不学，承担责任</p> <p>B2-1 返乡后感到迷茫</p> <p>B2-2 返乡后感到不安</p> <p>B4-1 受委屈时想念父母</p> <p>B4-2 深圳的生活比家乡好</p>	独立过程中的感受	

第二阶段，则是将概念进一步范畴化，即将第一步骤中形成的概念进行分类整合，确定范畴的属性和特征，并为其命名。具体的范畴化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从概念到范畴化的开放式编码示例

概念	范畴化
独立的付出	面对新家的挑战
与陌生的家人相处	
遭遇疏离的照顾	
不一样的教材	面对学业日常的挑战
学习任务加重	
教学节奏加快	
教学方式变化	
设施简陋的校舍	面对寄宿生活的挑战
三餐四季的体验	
不愿靠近的同伴群	面对同伴交往的挑战
不被接纳的同伴群	
“固化”的朋友圈	
老师的看中	面对师生交往的挑战
老师的距离	
老师的权威	
应对新家生活具有积极自我能力评价	积极的自我能力评价
应对学习日常具有积极自我能力评价	
应对寄宿生活具有积极自我能力评价	
应对交友具有积极自我能力评价	
应对师生交往具有积极自我能力评价	消极的自我能力评价
应对新家生活具有消极自我能力评价	
应对学业日常具有消极自我能力评价	
应对寄宿生活具有消极自我能力评价	
应对交友具有消极自我能力评价	
应对师生交往具有消极自我能力评价	
建立新的生活模式	全面更新——重塑
“活在当下”	
抓住“关乎命运”的考试	
更新“学习的模式”	
“改造一下”	
“结识新的势力”	打入内部——融入
“像朋友一样”相处	
“帮忙分担”	
“我经常举手”	
探索“规矩”	谨慎链接——顺应
寻找“共同话题”	
“找老师聊聊”	
“不制造麻烦”	
“跟着走就可以了”	
“跟着大伙”	被动自保——区隔
等待被发现	
等待关注	
“一个人扛下所有”	被动自保——区隔
“听不懂就放着”	

“应付老师”	
“回家里去”	
“维持一下表面关系”	
“不理他们”	
“不想去找老师”	

通过对所有访谈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最终形成 49 个概念，11 个范畴。这 11 个范畴是组成回流儿童返乡适应应对过程的 11 个因素。

（二）轴心式编码

在轴心式编码中，研究者需要将开放式编码中形成的概念和类属进行关联，以形成更高级别的范畴，并呈现资料各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

笔者带着开放式编码阶段形成的 11 个因素返回原始资料中进行不断对比，着重于发现这些因素在回流儿童返乡适应经历中的联系。轴心式编码过程可以用表 5 表示：

表 5 轴心式编码

各项因素	范畴化
面对新家的挑战	离家返乡生活体验中的挑战
面对学业日常的挑战	
面对寄宿生活的挑战	
面对同伴交往的挑战	
面对师生交往的挑战	
积极的自我能力评价	应对挑战的自我能力认知
消极的自我能力评价	
全面更新——重塑	应对挑战的方式
打入内部——融入	
谨慎链接——顺应	
被动自保——区隔	

（三）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是通过对所有已知的概念类别进行系统分析，从中选择一个“核心类属”，然后将其他类属整合到这个核心类属中的过程。核心类属必须具有统领性，能将其他的类属组合成一个整体(陈向明,2009,334)。

在选择式编码中，笔者将“返乡适应策略”作为本研究的核心类属。在核心类属的统领下，笔者按照这个新的编码重新整理了研究材料，把核心类属和其他类属联系起来并提炼和形成“回流儿童返乡适应策略”的扎根理论。

四、研究发现

（一）充满挑战的返乡生活

回流儿童返乡后普遍会面临家庭生活、学习日常和社交关系方面所带来的种种挑战。首先，由于这些孩子是独自返乡，他们将会面临着监护人的变更，返乡之后他们要进入一个新的家庭，和陌生的家人一起生活，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会遭遇疏离的照顾，也要克服对远方父母的想念。

在家里面的话感觉就是有一些尴尬,因为我跟我舅妈不是那种超级超级超级亲的嘛,感觉就是有一点尴尬。(受访者1)

我感觉住在舅爹家里的话很自由,反正我舅爹,平时也不怎么管我,对我不怎么严。和舅爹没有太多交流的,就是除非我玩手机玩太久了,然后他说我两句,然后就没怎么说了。(受访者9)

在深圳和爸妈相处的时间特别多,每天一睁开眼睛,走出房间就看到爸妈,觉得那段时间非常的幸福。现在学校也不能带手机,只能每周回家视频,有时候就会很想他们。(受访者3)

其次,回流儿童返乡后的学习日常也发生着变化。因为跨区域流动,他们会面临来自教材、学习任务、学习节奏和学习方式等各方面程度不一样的挑战。

教材也不一样,这边都是人教版,跟深圳那边差别还是很大的,就比如英语,变了好多,有好多题目,还有一些课外的文章。有时候会看不懂,因为很多英文,中文很少。(受访者2)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背诵的东西变多了很多吧,以前在深圳不需要背诵的课文和单词这些,在老家这边都要会背,这一下子就增加了很多要记的。(受访者5)

刚来的时候障碍很大,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因为有一部分老师是讲老家话上课的,我听不懂,就比如说物理嘛,物理的课到现在我没有完整地听明白过一堂课,一堂课都没有听完整的。(受访者9)

此外,11名回流儿童在返乡之前没有寄宿学校的经历,但是返乡之后他们都要寄宿在学校,寄宿生活成为一个他们需要适应的新主题。

其实最开始肯定是不适应的嘛,宿舍环境不是很好,洗澡的地方是公共的,还能从上面给你漏水,只能照样洗。(受访者7)

二十个男生住一间你想想看环境怎样,就是上下铺,晚上蚊子很多,然后我又是特别招蚊子的那种,就是睡一觉能被咬得一手包,刚去的那几晚上是睡不着的。(受访者3)

学校的饭真的都很不好吃,他就是一荤一素,还有一个丸子之类的吧,每天都吃鸡腿,每天都是那几样。那些东西吃久了真的会吃腻。(受访者4)

回流儿童告别大城市的社交圈,返乡后需要重新建立自己的社交关系网络,然而这个过程中也有不少挑战,他们作为“外来者”和“新人”,时不时会遭遇同学不友好的对待。

他们有的人会用老家话里面的粗话叫我,一开始我不知道那个词是很粗鲁的。(受访者4)

武力啊什么的，就是比如老师在分小组之后，说好每四个人一组，他们就故意不要我。就会跟老师提出换人。（受访者3）

去到那个班级，我就经常被告状，我们班学生不是特别团结，都挺喜欢互相举报的，然后这也令我特别崩溃。（受访者6）

（二）回流儿童返乡适应的应对策略

1. 重塑——全面更新的做法

在应对挑战时，有一些孩子总能积极调节自身，将环境中的不利因素剔除，创设一些有利条件帮助自己更好地适应新环境。

我妈在的时候就是她帮我洗衣服嘛，现在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妈就跟我讲，你回来之后就往洗衣机放衣服，然后你要穿的衣服就放在衣柜里，你想穿什么就自己去拿。然后现在已经住过一个学期了，已经住习惯了，然现在我自己的事情都能自己做好。（受访者1）

晚上蚊子很多，然后我又是特别招蚊子的那种，就是睡一觉能被咬得一手包，刚去的那几晚上是睡不着的。然后那个周六回家我就让奶奶帮我买个蚊帐，还有那种可以粘墙上的钩子，回学校改造一下，挂上之后就好多。（受访者3）

我一般不会去结识那些原本就在班里面的同学，我会结识新的势力，就是新来的同学。因为班里原来的人都有自己的朋友，我得先找到一个组织，然后再去靠近他们，这样即使失败了，我还有靠山。交朋友是要讲究策略的，只要是新来的我一般会去拉拢他。（受访者3）

在这些具体举措中，我们能发现，回流儿童凭借自身力量或者主动寻求外界帮助，根据返乡后的现实情况，对自己的行为模式重新塑造，并对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和系统环境重新调整，以此应对挑战，适应家乡的生活。因此笔者将这类全面更新的做法总结为“重塑”的策略。

2. 融入——打入内部的做法

一些孩子在返乡后能积极走进新环境，他们渴望成为集体的一份子，采用积极的措施“打入内部”。

现在回家我也会帮姑姑洗碗，因为总是要帮忙分担一些活的，她的女儿也会一起做家务，感觉我如果什么都不做很不好，一起干活感觉会比较好。（受访者8）

最开始的一个星期，我就只洗了一次澡，就抢不到位。后面我就知道了一些潜规则，我会去远一点的洗澡房，人会少那么一些，如果队太长就先把桶放那里先排，差不多时间了就回去看看。（受访者9）

当时刚入班的时候我做了一些自我介绍，然后他们（同学）也自我介绍，然后我就

跟他们一起聊天，然后聊久了之后就熟悉了。我们班很流行聊八卦，平时和我同学就会聊一些八卦。（受访者1）

这些具体举措有一个共同点，即回流儿童认同新的生活环境和人际关系网络，并寻求机会积极主动地融入其中。因此笔者将上述举措总结为“融入”的策略。

3. 融入——打入内部的做法

有一小部分的受访者对新环境抱着谨慎被动的态度，采取了相对“无为”的方式适应新环境。

我每周末回小姨家一趟，吃的用的的小姨都会给我安排好的，我没有帮忙做家务，尽量不给他们制造麻烦就好啦。（受访者11）

没有制定计划，我觉得就不应该制定计划什么的，跟着老师走就可以了，老师让我们学什么就学什么就好。（受访者11）

其实也没有做什么吧，就是大家都好热情啊，就感觉你坐在那里，就会有人过来自我介绍啊，交朋友。一直都是他们比较主动吧，我交朋友都是属于被动的，是别人来主动跟我交朋友。（受访者10）

运用这些举措的回流儿童没有采用主动改变环境或自身的做法，而是顺应环境的优势，借势而为。因此笔者将上述举措总结为“顺应”的策略。

4. 区隔——被动自保的做法

有一些回流儿童则选择回避问题的做法应对挑战。

平时和玉姨在一起就说说，然后开个玩笑，然后也不会聊些什么。在学校碰到的一些事情，什么难题不会找玉姨说的，因为玉姨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我去苦恼那么多，就是我自己没做好。（受访者6）

在学校遇到什么也不会跟他们（照料者）说，不想麻烦他们，因为我住在他们家也不好意思麻烦他们，我一般都是自己解决。（受访者9）

没有私下问老师问题，问了感觉也听不懂，听不懂然后就放着，然后过几天重新再去一看可能就会了，不会的话就继续放着。（受访者5）

不懂的题就上课听老师讲，还不明白就算了。（受访者7）

现在就感觉能不参与就不参与，自己也管不了啊，尽量避着他们（欺凌者）吧，能不惹事就不惹事吧。（受访者5）

我能怎么处理呢？干又干不过他们（欺凌者），说又说不过他们……就不理他们，就下课就坐那发呆，然后他们也不理我，就这样子。（受访者9）

我惹不起，但是我躲得起。（受访者7）

运用这些举措的回流儿童并不认同新的学习生活环境 and 人际关系网络，他们采取回避和游离的做法，对环境中的挑战视而不见，将自己与某些个体、集体，抑或是制度区隔开来。因此笔者将这类举措总结为“区隔”的策略。

（三）环境挑战和自我效能共同影响适应策略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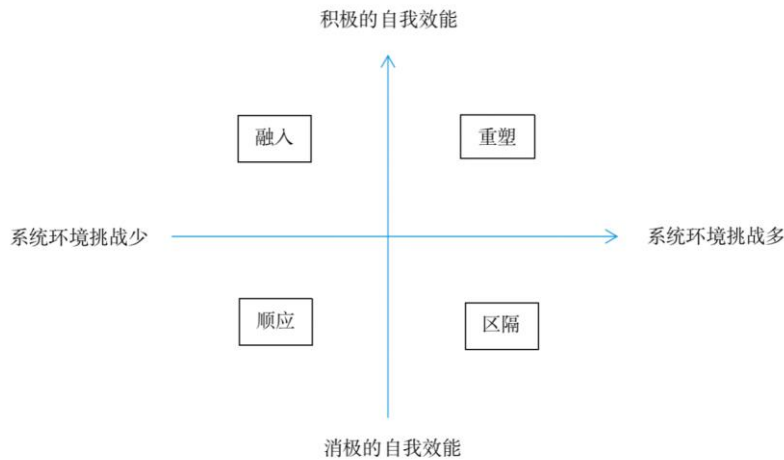
环境中的挑战对于回流儿童的适应策略有什么影响呢？这些挑战对于受访回流儿童来讲都是困难吗？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中的挑战对回流儿童来说意义不同。同样的挑战，对于一些儿童而言确实是困境，而对另一些儿童而言则谈不上困难。这就涉及到个体对困难的认知和对自我能力的评估。当个体认为自身有能力应对挑战时，他会以更为乐观的心态来看待此挑战，相应的也会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来应对；反之，如果个体在应对挑战的时候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那么他就容易把眼前的挑战视为困难，相应的也会比较消极地应对。

可见，环境只是有得有失的潜在条件，具体会对人的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要结合个体的主体因素来进行分析。因此，应该把系统环境和主体因素区分开来，探讨两者各自与应对策略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当环境中存在较多挑战，并且回流儿童处理该挑战的自我效能感高的时候，倾向于选择“重塑”的策略适应环境，当回流儿童处理该挑战的自我效能感偏低时，则倾向于选择“区隔”的策略；当环境中挑战较少时，并且回流儿童相应的具有积极自我效能感时，倾向于选择“融入”的策略，而当自我效能感偏低时，则倾向于采用“顺应”的策略。

由此可见，回流儿童的自我效能和他们所处的系统环境共同影响了他们适应环境的策略行为。

图 1 系统环境挑战和自我效能影响应对策略的模型图



五、结论与启示

笔者最终提炼并形成关于回流儿童返乡适应策略的规律性描述，即返乡后的系统环境和回流儿童的自我效能共同影响适应策略的选择，回流儿童的返乡适应策略包括：“重塑”的策略、“融入”的策略、“顺应”的策略和“区隔”的策略。

本研究发现，回流现象与超大城市的教育供给规划息息相关，如果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地供给，那么将会大大减少回流现象。尽管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脱钩”是一个趋势，但取得最终结果仍需假以时日，在这个过程中势必仍有许多孩子返乡读书。为了让返乡儿童更好地适应新环境，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重要他人要具备儿童视角。在儿童返乡的过程中要看到儿童对挑战的认知与成人视角的差异性,看到儿童自身应对挑战的能动性。要预设儿童返乡后会遇到的困难,重视提高回流儿童应对挑战的自我效能,培养孩子返乡适应的信心。

其次,要多方合力,为返乡儿童创设良好环境。父母需提前做好返乡规划,让孩子掌握相关的能力,做足准备。同时需要为孩子选择稳定可靠的照料者,在生活起居和情感心理方面对孩子用心照料。学校教育者应重视回流现象,帮助回流儿童尽快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同时,对于校园欺凌等问题应该提高警惕,加强校园欺凌的宣传教育,完善发现和处理机制。社区也要重视营造良好的环境,消除“混社会”的现象对返乡儿童造成身心影响。

此外,应逐步将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引入教育系统。有必要在学校建设社会工作岗位,引入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向学生提供除学习之外的心理健康、社会交往等服务,向学校提出解决学生问题的专业建议,努力建设和谐的校园环境。

参考文献

- 班杜拉,2001,《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上册)》,林颖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 陈春强,2017,农村回流儿童社会适应的个案介入,长春工业大学.
- 陈向明,2009,《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 韩嘉玲,余家庆,2020,离城不回乡与回流不返乡——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子女教育抉择,北京社会科学.
- 胡帅星,2018,社会工作介入返乡农民工子女学校适应问题研究,兰州大学.
- 靳雅楠,2017,流动经历对农村回流儿童抑郁程度的影响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 李巧,梁在,2019,二代流动儿童回流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人口研究.
- 黎煦,朱志胜,2018,回流对贫困地区农村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实证检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黎煦,朱志胜,陶政宇,左红,2019,回流对贫困地区农村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基于137所农村寄宿制小学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
- 梁宏,任焰,2010,流动,还是留守?——农民工子女流动与否的决定因素分析,人口研究.
- 马丛红,刘琴,2011,皖北地区返乡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研究,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 盛玉昌,贾冰,2016,农村回迁社区留守儿童社会工作介入研究——以“七色光”社区学堂为例,教育现代化.
- 谭千保,肖倩怡,2016,返乡农民工子女学校适应不良的影响及其应对,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 唐杰,2011,二代优先:当前城市户籍政策调整的一种思路,城市发展研究.
- 王家军,2011,埃里克森人格发展理论与儿童健康人格的培养,学前教育研究.
- 王敏,2019,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回流儿童社会适应研究,安徽大学.
- 杨磊,2016,返乡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研究,华东理工大学.
- 张宝歌,2012,回迁儿童: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面临的新问题——以生命关怀为基点改善回迁儿童学习适应状况,教育研究.
- 张红艳,2013,返乡农民工子女社会适应行为现状调查与分析,今日中国论坛.
- Hu S., 2019, “It’ s for our education: Perception of parental migration and resilience among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 Liu Z, Zhu F., 2011, “China’s returned migrant children: Experiences of separation and adaptation”, *Th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 Zhou S, Cheung M., 2017, “Hukou system effects on migrant children’s education in China: Learning from past disparities”,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理性神话：高校“半军事化组织”的形式和运作逻辑

胡晓昀*

提要：S校G组织有军事组织和学生组织混合的组织形态，在独立性与自主性之间，获得了某种依附式自主；实际运作层面，它虽然宣称理性但仍存在很多非理性行动的空间，同年级（同期）人员尽管具有不同的职位，但同僚关系取代了严格上下级的科层制关系。这塑造了该组织成员双重身份的特点，两年内的两次针对组织性质的改革，分别走向学生组织化和军事组织化，都试图去除这种双重性对组织发展带来的阻碍。然而，行动者对理性的神话，对科层制和军事化的混同理解，导致组织结构和制度变化的特定后果。在制度环境和组织内的非协调约束中，支配的正当性被赋予了。一系列过程说明，针对组织外形化的变革不可能从组织内部解决一切问题，组织目标和制度环境的稳定不变，使“理性”依然以某种客观的形式维持着它的神话形象。

关键词：科层制 半军事化 非协调约束 制度变革 自我民族志

一、问题的提出

军事社会学领域学者对职业者与非职业者的类型学划分如下：正规军官、预备役军官、准尉（介于军官和士兵之间）、职业士兵、^①非职业士兵、^②军事机构中的民间雇员（查尔斯·H·科茨、罗兰·J·佩里格林，1986：245-258）。然而，对中国现实还缺少一种讨论涉及军事组织形态的组织类型的讨论——没有军人身份却接受有关使命的正式组织。在高度实现“军事职业的社会化”（查尔斯·H·科茨等，1986：242）、培养集体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价值观教育中，我国院校培养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为国家贡献，而不仅是献身军事事业的年轻人，由此有了军训制度和国防生制度。随着军队相关部署的改革，国防生制度于2017年5月被取消，原本由国防生负责的高校升旗工作转由高校自主组建的学生G组织负责（万泉利等，2018）。新组建的高校G组织的组织体系不完善、训练模式同质化、训练内容单一化等问题是普遍现象（黄天，2019），针对这些问题，S校G组织中的改革是如何发生的？研究者试图达成更深层解释，当该组织所有成员都是长期进行军事训练的非预备役民间人员，他们如何通过一种既非军事职业形式化，又非学生组织结构化的方式实现了所谓半军事化的组织形式？在实际运作中，仪仗司礼任务带来的强组织性要求，如何影响了行动者看待组织和自身的方式——一方面，不愿意承认官僚制的组织特点（或者对此概念形成了一套新的解释）；另一方面，相较于同一高校中的其它正式组织，^③为什么只有G组织能达成强力支配的正当性？

二、分析视角和核心概念

（一）自我民族志

科学民族志追求“他者”对象化，自我民族志则摒弃主客对立的研究视角，不再以‘非我’为中心，或从‘他者’的视角来反观和批判自我。在自我民族志中，自己既是主体又是

* 胡晓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社会学专业本科生。

^① 在中国的军队制度中“职业士兵”应当属于“士官”一类。

^② 在中国“非职业士兵”即指征召入伍两年并退役的义务兵。

^③ 横向比较其它与G组织同级且性质类似的“校团委直属机构”，“零失误”也是校艺术团的重要追求，“效果好”问题也是校辩论队日常训练并打比赛的根本逻辑，而只有G组织能实现强力支配且还具有正当性。

客体,是自我中包含了他者,并对这样一个多元自我拉开距离观察。以此来处理社会文化整体和个体心灵之间、客观文化分析和主观反思之间、他者和自我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一范式更适用于“正在或曾在事件中(局内)”的人员,适用于研究者与行动者、反思者一体的研究,便于形成“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的知识发展模式(魏亚丽、孙杰远,2022)。项飙(2020)曾通过一部对话实录的作品《把自己作为方法》,让更多社会科学研究者看到了这种方法,作为研究者更是作为“自我”,如何创造性地建设身边的小世界,在思想受困的社会,以自我之姿回答宏大的命题。

面对两次组织的人事变化和制度改革,“我”从踌躇不前到踌躇满志、从台前到幕后、从事件发生的主角到观察视角更多的配角,也在组织结构的意义上从S校G组织的普通成员变为了管理层成员。在组织情境中,“我”带着亲身体验和完整的心路历程进入研究,即重整具身经验阶段;在研究过程中,“我”通过不断阅读原始资料,反思因误读理论造成的组织实践之不足,即经由具身经验寻找问题域阶段;进而通过参与组织的实践与理论的对话,在改进行为的同时完善自身理论建构。这种以自我为方法,有助于自上而下地运用组织社会学理论于组织运作情境,并衔接自下而上由情境生发出实践性知识,以期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充分互动。

(二) 科层制组织的非协调约束

S校G组织是一个典型的科层制组织,G组织拥有成文的制度规定《S校G组织章程》,将权力依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每一成员的权力和责任都有明确规定。在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中,下级接受上级指挥。经过统一培训,组织成员都具备一定的专业资格而被选中,其思想和动作都需要尽量接近一名真正的仪仗司礼人员。

在组织运作的角度,高效率是否是科层制的结果存在争议。在韦伯(Weber,1978:958;韦伯,2004:318-319)看来,高效率是经过经验丰富的专家推算的结果。而默顿(Robert K.Merton)则看到对组织中纪律的要求超过了实际需要,导致目标-手段替代,进而造成了负功能,让科层制组织抗拒新变化(默顿,2008:299-320)。布劳(Peter Blau)进一步指出科层制组织并不是韦伯眼中的严密刻板的,时常通过一些非正式手段实现随机应变,在科层结构中,人的个性等内在因素的变化可能造成功能失调,有些是预期中的,有些则是预料外的(布劳、梅耶,2001:51-58)。①由此,下文将以G组织为例展开讨论,一个科层制组织是为何、如何进行内部变革的。

在组织形态的角度,组织方式能否改变和如何改变也有理论基础。迪马吉奥与保罗威尔(Paul & Powell,1983)认为,合理化和官僚化的引擎已经从竞争性市场转移到国家和行业。一旦一个组织出现在某个领域,就会产生如下悖论:理性的行动者在试图改变他们的组织时,却使其变得越来越相似。他们在梅耶和罗恩(Meyer & Rowan,1977)的基础上从组织和领域层面探讨了导致这种结果的三个同构过程——强制、模仿和规范。由此,下文将以G组织为例展开讨论,内部改革之后对该组织形态产生的实际影响。

本研究中G组织案例的典型性在于,在理想类型的意义上,G组织不需要为组织成员提供经济利益等谋生必须的社会资源,同时也不涉及在其他科层组织中出现的贪腐等意外后果问题,可以呈现出较为“纯粹”的权威关系在特定群体中运行的种种特点和成效。它的成员还具有制度层面双重身份的特点,且这种双重性并非通过“组织外形化”的手段来获得,组织的形式与实际运作方式是高度匹配的,与环境的协调程度较高,组织面对的外部风险较低,但这种类型的组织却仍然存在“名实不符”的现象。G组织面对的这种环境协调,但组织成员身份不协调的经验现实,可以同田凯(2004)所强调的“非协调约束”概念进行对话,

① 《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第一版印于1956年,为布劳独立完成,1971年与梅耶(Meyer)合作出版了第二版。第一版共118页,已经涉及笔者引用的这部分内容,事实上布劳自1955年出版的《官僚制组织动力学》就是研究了一个政府机构中的非正式关系,并逐步发展为耳熟能详的社会交换理论,形成《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1964)。70年代提出更为宏观的宏观结构理论,《不平等和异质性:社会结构的原始理论》(1977)中更加严密和清晰的理论体系对西方学界产生影响。

进而再对新制度主义理论的有关讨论形成发展。

三、双重身份

(一) 案例描述

G组织的日常运作功能是组织队列动作训练，周一周三早训（6:20-7:20）、周日集训（每周的时间不固定，一般为周日的8:30-11:30和18:30-21:30），此为每周8小时固定训练时间，在每年工作总结的报告中是一项重要的量化指标，是上级资金来源单位对G组织进行了解的重要参考和双方达成的一种“契约”——本组织完成了这个指标，您方应给予我方相关支持。如果在任务前夕（如运动会出旗、开学典礼、文艺汇演和纪念一二九升旗仪式等），则队干部依照惯例通知队员在每周额外增加3小时集训。每次训练前由指导员以固定格式发布训练时间和要求，注明需要每个参训队员回复。在训练和任务时间内，队员的一切行动都需要听从组织者的安排，做到令行禁止。保证出勤率是该组织的基本要求，迟到或缺勤到一定次数按照有关章程规定会将队员劝退。理论上说，该组织的每一次训练和任务活动，每一名队员都必须参加，这是笔者前文所谓“强力支配的正当性”的描述对象，在制度的规定下，中队一级的组织者对队员具有“在某个时间，让其做这个而不做那个”的权力。在训练和出任务之外，G组织的实体并不存在，组织成员投入到各自的学习生活中，但组织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G组织通过类军衔官阶制来实现组织分工和功能运转，组织层级分为三层：队员、中队干部和队干部，分别主要由大一至大三，三个年级的成员组成，二中队队员为大一学生，一二中队干部和一中队队员为大二学生，队长、副队长和指导员是大三学生。仪仗队负责具体仪仗司礼任务，办公室负责宣发工作，接受队干部的领导。办公室主任为大三学生，副主任为大二学生，队员为大一学生。

G组织作为一个分层为三级、总人数约25人左右的小型任务性组织（队员一级占比达到65%以上），对最高级的管理人员而言，其对下进行信息收集和监督的成本已经比较小，理论上治理者可以把权力下放，而不必担心权力滥用的问题。由于组织日常训练是G组织运转过程中的主要工作，直接负责这项工作的中队干部在实际上掌握了对组织的主导权，而名义上更高一层的队干部，在换届任免之后，对队内事务干预很少，主要负责和校团委进行外部的对接。

在G组织中，行动者的任何行为和政府行为相比并不涉及贪赃枉法或腐败的问题，财权不是核心问题，部门设置也相对固定，对理解G组织运作最关键的一点是观察人事权的约束力。^①该组织身份的具体设置方式如下图所示：

^① 详见本文“四、(一)”部分。

图1 第一次换届后 G 组织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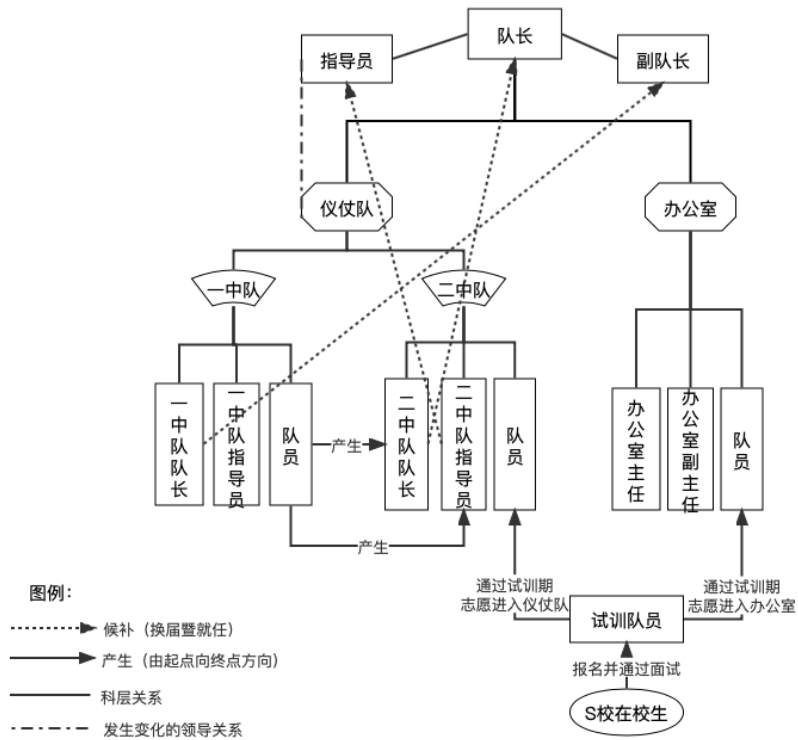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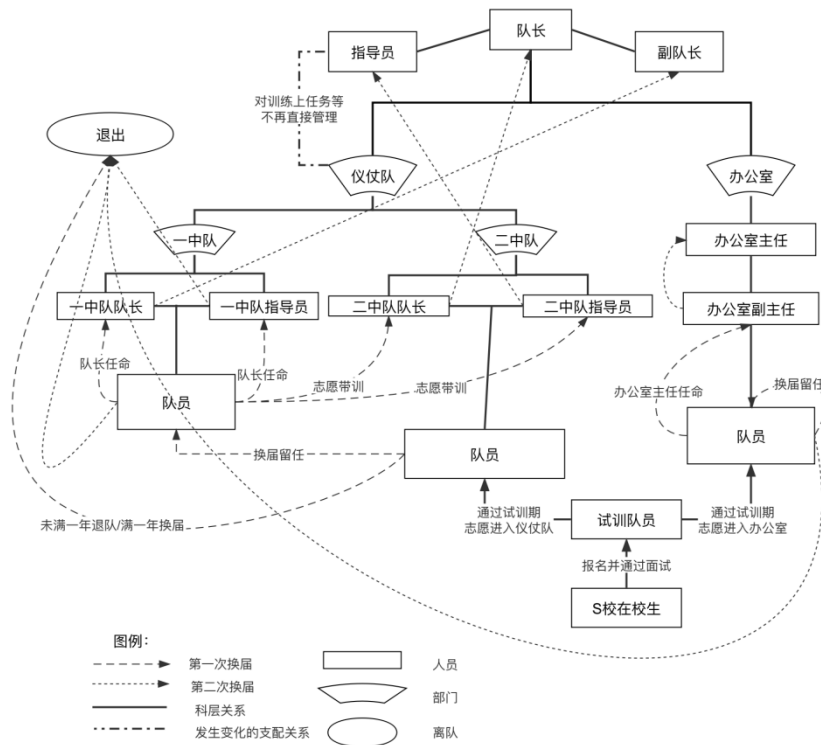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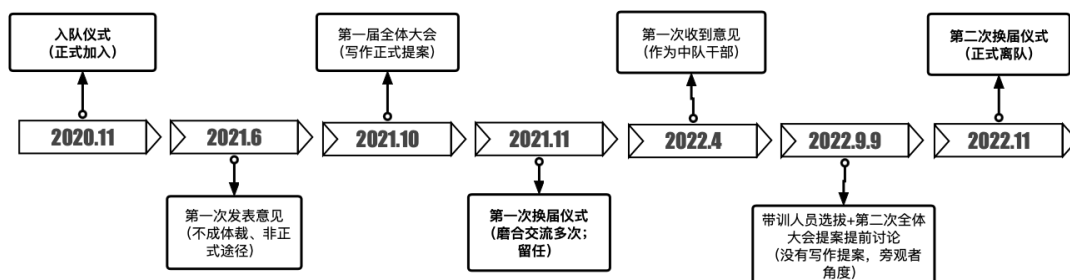


图2 第二次换届后 G 组织结构



G 组织使用了科层制的组织形式，但每一层的划分标准是所处年级，依照学生学制的计算规则，G 组织每学年都要进行换届工作。这是因为 G 组织是高校学生组成的，学生需要遵循毕业等固定的组织外部流程。在该组织中，层级流动的决定因素是资历而不是绩效。对于每一个队员，加入组织一年后将经历第一次换届，这时是差额竞争产生中队一级负责人；而第二年结束的第二次换届，则是几乎是等额候补，队干部由仪仗队中队干部直接产生，换届暨就任。

图 3 “我”经历的关键时间节点



换届亦是改革，改革即是换届。两次改革都发生在换届前，第一次改革的发起方式试图减少固定的训练时长，在实际运作角度，减轻半军事化管理对人的负担，同时提高训练效率；在第一次制度改革结束后，第二次换届前改革的发起方，认为缺少了军事化管理，导致成员思想倦怠，组织散漫，应当加强思想教育。

总而言之，G 组织成员身份的双重性一方面体现在学生和组织成员身份上，需要同时承担不同的角色义务，并内化双重的道德准则。另一方面还体现在组织内部的管理逻辑上，个体的科层身份（干部或队员）和所属年级（大一、大二或大三）的身份融合在一起，在实际运作中，是年级的相同塑造了真正的“同僚型管理”和利益集团。^①第二层的双重性，受第一层双重性影响而产生。

（二）半军事化管理的学生组织

继承了军事组织的组织特点，S 校 G 组织中有许多科层制结构的特征，如专门化分工、权力等级制、条例和规章制度和正式的非个人性氛围。此外，由于个人化的军衔制的独特性，G 组织在许多重要方面与正式军事组织的理想类型存在某种偏离。

第一次换届前的中队干部通过强调军事组织的特征来获得组织内部权威的合法性，但同时从管理学生社团的校团委获得相应资源，而非武装部或保卫处。因此第一次换届前的队员一级则通过强调组织成员都是学生的身份角色特征，来获得变革的合法性。

无论如何，哪怕 G 组织宣称是一个半军事化管理、严格执行规则的科层组织，在实际运行中，存在很多非理性的空间。

1. 为控制权留下的空间

根据《S 校 G 组织章程》规定，进入 G 组织必须通过考核，考核由队列动作和理论考试两部分组成。考核结束后，必须向试训队员公示选拔的成绩和排名信息，综合分数不及格

^① 笔者认同在奥卡姆剃刀的原则下，不无谓地增加重复的概念。笔者这里说的“同僚型管理”的具体表现是，同期进入组织的人商议出共同意见之后（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具有干部身份是被模糊化的），通过代理人实现不同年级之间的交涉（往往代理人就是/即将获得干部身份）。此概念和周雪光（2008）“共谋现象”概念有相似性，但是具体经验现实和指涉对象存在不同，“共谋”概念适用于政府组织的检查行为，发生在基层政府中的县级职能部门、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之间，是因同一件工作事项成为“被检查者”，共谋的对象是因事而变的。而本研究中，虽然也描述在组织层级中处在不同的位置的成员的合作和决策，但是共谋的参与者是固定的，完全基于同一年级的同期和同辈关系，不会因为工作事项的变化而产生变化，利益集团相对稳定。这是研究对象不同带来的观测现象的差异，产生这种差异的根源来自于本节标题——“双重身份”，这是学生性一面的重要展现。

的试训队员将不能成为正式队员。为此,原中队干部和队员在组织判卷和确定人选的过程中,不让试训队员得知往年评比中的分数占比信息,根据对试训队员的了解调整结果排名,特别是防止书面考试成绩较高但平时训练态度不够突出的队员获得过高的综合成绩,以便原中队干部和队员成为队干部和中队干部之后,对新队员进行管理。因此实际情况是,有时队干部打出的“印象分”能够占到综评成绩的50%以上,即让部分队员以勉强及格的态度通过考试,虽然G组织求贤若渴,但也要在这个时候给新人不断进步的动力。这类似于一种控制权理论,上级对下级的有策略的隐瞒,就是为了给自身干预留下空间(周雪光,2017:118)。

2. 专门化分工的实际影响

在上文提到的选拔正式队员之外,G组织的实际运作中有许多同级同学之间“共同商议”的决策过程。对于同一级队员或对干部之间,彼此不存在军衔制的严格的上下级区分,更多的是“同僚”关系(故图1中笔者把同年级的人作为确定科层的方式,并没有突出同一年级职级角色不同带来的纵向权力关系)。是否在换届之后成为中队干部或者职级更高的队干部,并代表其拥有更高决策权,甚至还会为共同利益合作,共同推进利制度改革。“半”军事化的特点在此得到展现,尽管组织决策的效率没有得到实际提高,但也为变革留下了充分的空间。

然而,干部身份不完全是“虚职”。一方面,在半军事组织的功能运作中,需要承担起日常训练的“主训”(主要负责带领新队员训练)责任。另一方面,在学生生涯的结构性上升中,可以获得校团委系统下学生工作的社会实践加分,在奖学金评定和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等涉及学生综合评价的环节收获一定利好。

总之,G组织中的专门化分工没有带来绝对的决策权,而且G组织所依附的外部制度环境和成员的双重身份本质,对形成专门化分工产生了影响。在这个过程中,行动者的意向性发挥了很大作用。在G组织简明有效的三层组织结构中,若将中间一级管理人员视为“承包方”,将最高一级的管理人员视为“发包方”,实际工作就可以类比“‘一对一’项目制”的情况,这是G组织作为一种更接近理想情况的一种组织类型能够提供的思考。换言之,它具有所谓“半军事化管理”的特点,但根本特点仍然是科层制的。这可以剥离一部分复杂的情景,还原到一种只涉及行政权、而不涉及金钱利益的情景,但同时也具备了一种复杂性,即组织成员的双重身份造成他们能够更轻松地退出,组织的约束是硬性的,但成员摆脱消极后果的能动作用较强,他们可以顾虑较少地退出该组织回归“全职”学生身份,或参与和发动针对组织的制度性变革,在“兼业”的状态下继续履行G组织队员的责任和义务。

四、去双重性的改革

(一) 发动改革:行动的合法性与相对的正当性

G组织既有军队组织的军事化特点也有学生社团的特征,这产生了诸多张力。军事化管理是第一次换届后产生的队干部领导班子,在换届时间点前后所不断强调,并于仪式发言中向新入队队员澄清:G组织不是学生社团,它很特殊。然而,对其组织成员而言,他们都是“兼业”的,日常学习生活与G组织的工作要求时而产生矛盾。但面对难以平衡两种身份而给人带来的“私人困扰”,G组织成员几乎都选择检讨自身,而不寻求组织结构和制度层面的改变,因此一些发生在其他组织中正当性不足的事情在G组织中会才成为常态。^①不同个体对同样的情景也往往会产生不同的自我解释,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的出现将极大的影响变革的激烈程度并主导核心矛盾的定位与讨论。当意见领袖的组织角色本身不具有影响决策合法性时,其被剥夺感将被放大。更进一步,如果其未争得组织其他成员的充分意见,

^① 例如身体不适时,仍不敢轻易请假,因为必须和指导员单线联系告知其原因,而且计入扣分。再如第一次改革之前,周末集训时间并没有固定下来,为按时参与G组织的训练,队员们需要尽量把周末时间变为灵活机动时间,等待上级通知有关安排。

不能代表组织中的大多数人时，将通过宣称个人的特殊性来取得影响力和话语权。^①因此将近一年的时间内并没有人产生发起改变制度的愿望。除了第一年换届之前已经失去了上升空间的意见领袖 A，^②和第二年换届前夕的意见领袖 B，B 的身份是 G 组织中唯一有过从军经历的退役军人。

在本文个案的层级严格的组织中，同一级（年级）的不同行动者之间即使利益不一致也很少出现不协调现象，但上下级之间出现了隔阂，将很容易引起整个组织的大动荡和变革，本质是沟通与信任不足的问题。当组织不存在个体和集体的制度化的勾连通道时，进入深层整饰状态的人将不再向外传递信号，是否要公开发表意见以及行为后果都表现出强烈的不可预测性。当个人化的问题解决途径不被自我认定为具有正当性的行为，一种思维惯性是寻找制度化的解决途径，比如设置例会和修改组织章程的专门会议，而这种方式究竟提高还是降低了制度面对变化的应对能力，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表面上看，G 组织在收到 A 的第一封意见稿之后（见图 3），承诺于几个月之后召开“全体大会”。意见稿就像“导火索”，成为了变革的引信，这是高度个人化的，如果 A 没有失去组织中的上升机会，如果时任队长和 A 不共享社会学的智识基础，^③那么实质性变革难以发生。此外，在两份发起改革的意见稿中都出现这样的表达——“对事不对人”，哪怕是正式人际沟通，人也很难将自己和组织角色抽离开，表达中仍会呈现出强烈的非个人性和正式性特征。因此，组织化和个人化的影响逻辑是相互纠缠的。

随着双重身份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后果，作为“职业”的学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这种困难很可能会通过双重身份结合的过程制度化，也可以通过共同探讨协商和相互理解来得到逐步解决。

（二）制度难题：组织结构或组织功能

1. 围绕“官僚制”的讨论

在社会学意义上，现代官僚制等同于科层制，但日常生活中相较于“理性”，“官僚”一词在常人眼中已经成为一种贬义词。在上述情况出现的情况下，G 组织在需要并渴望获得环境认可的情况下，把自己和环境主流认可的价值分离开来，^④并形成对官僚制的新的解释。

第一次换届前，A 作为队员向中队干部反映了意见，并传递到了队干部。A 对科层制的后果进行了评价，认为对组织结构对固守僵化有可能导致组织功能的实现出现偏差，具体表现为队员们的动作水平已经定型，不再随着训练时间的增长而增进，相反，压力转化为长期的压抑意识，影响着队员的心理。A 没有越级报告，而是将意见稿直接发送给中队一级，中队一级再传达给大队。比起队员联名信和管理层的书面回应形成的较长时间跨度，第二天 A 就收到了非正式的反馈：“说官僚气息有点过了”。A 随即给出学理意义上的官僚制的定义，中队一级的行动者 D 则认为：“这么理性的官僚制应该就是 G 组织的标配……类似军事化管理”。D 不是社会学专业学生，很难理解社会学家的定义，认为“官僚制”和“官僚气息”之间是一码事，使得 A 对“官僚制”组织形态的讨论变化为“官僚气息”；其次，D 并不是推崇官僚制，而是推崇“理性”本身，这在组织管理方式上具体表现为“军事化管理”的形式。

由此可见，在 S 校中，不同学科背景和生活经历的人，内心中对一些概念早就产生特定的面貌。在默顿一派看来科层制的反功能和不可预测的特点，是“理性”的意外后果。如果秉持价值中立的态度，“理性”本身并不带有好或坏的价值判断。但这些观点都是建构的，

^① B 相较 A，并没有广泛征求组织成员的意见，是以退伍并带过多次军训的身份，在网络社群平台公开表达个人意见，标志着本文描述的 G 组织的第二次变革的开端。

^② A 有过两次早训缺勤，在 G 组织章程的惩罚制度下扣分过多，已经丧失晋升空间。

^③ A 当时是大一社会学专业学生，G 组织队长 C 是大三社会学专业学生，后者对于 A 所说的科层制现象有认知，但选用了学术意义相同的“科层”代替看上去有负面意义的“官僚”一词。并鼓励 A 用学术的方式思考这个问题，希望 A 在即将召开的全体大会上“科学地”发表意见。

^④ “主流认可的价值”即社会对“官僚”的污名化理解，这种认识往往是负面的。

社会理论家对的“理性”的认识也足够庞杂，甚至“理性”本身就不是一个清晰的概念。在理论家的建构之外，行动者自有建构。

2. 制度化组织中的结构性矛盾

制度化组织中的结构性矛盾是，获得队内管理的合法性以及组织在环境中存在的合法性，并不指向同一个结果，而更像一种松散的耦合。前者指向的是“半军事化管理”，后者则指向“爱国主义教育”。一支经受军事化管理的组织带来的不是爱国主义教育，而是更高的组织效率。G组织把两者分离(decoupling)，不断充实新人并完成升降旗工作。让G组织成员产生不同意见的，是组织决策权归属同实际执行者相分离的问题，即对官僚制后果的讨论。

理论上，结构化程度越高，领导者发挥自身的影响力空间就越小，但在组织高度分工的情况下，维持组织的稳定发展和积极创新提高工作效率之间难以平衡。这类似于现实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关系，政府强干预还是弱干预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不同的影响，因此各个国家和地区都需要做出两难选择。在S校G组织的第一次换届之后，新队长对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原先分管仪仗队训练指挥权的指导员，不再与队干部进行直接对接，队长全权负责队内所有事务。^①大队一级的决策者选择了稳定局势为重，作为工作实际执行者的中队干部感到自身发挥的空间变小，由此引发了第一次变革的余波。

(三) 改革结果：并未变为一个松散的组织

按照新制度主义思路，组织必须去支持制度环境以获得合法性，但是又要通过技术活动获得绩效，最后只能保持一个松散耦合的状态。而G组织不是许多研究聚焦的经济组织，它长期介于科层扁平化的学生组织和专业军队组织之间，最终也没有变得松散，反而因为改革而增强了凝聚力。

1. 强组织性

虽然经历了换届调整并设计了新的制度，G组织的组织目标没有发生变化，仍然需要强组织性。首先，对组织行为的容错率仍然保持在低水平。原因如下：

首先，G组织存在的制度设计直接指向国旗法和国歌法。在爱国主义价值观的指引下，升旗仪式的每一步、每个人不能出现丝毫的偏差，这种价值观被内化为组织成员的责任感，从升旗台延续到了训练场。其次，组织成员获得的主要回报是精神层面的，“集体主义的温情”是一种非物质层面的激励。再次，对组织文化的制度化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在各种集会场合中，例如全体大会和换届仪式，新老队员之间的传承是被强调的，长期的训练和接触也让G组织比一般的学生社团有凝聚性。最后，和市场经济组织不同，在高校的组织框架中，G组织排他的工作内容和组织目标导致其没有竞争对手，不存在需要创新确立竞争优势的问题，只需要保证工作不出错。但是这也导致S校对G组织的态度是不主动推动其发展，具体而言，预算约束的效果强烈，G组织提交申请，在S校相关管理部门审批并获得经费，再开展有关活动。此外，负责对接工作的上级管理者对G组织的具体工作了解较少，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

可见，在外部环境不变的情况下，针对组织外形化的变革不可能从内部解决一切问题。

2. 管理迭代

在学术意义上，对组织的宏观理论研究很难关注到具体运行的细节，比如科层制和制度同构，是一种静态的组织“切面”，所研究的演变也是整个组织的演变，比如组织结构的变革。但一旦落到组织实际管理的环节，哪怕组织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不同松散程度的组织对管理层的人员流动的反应，可能是不同的。

此外，G组织在完成人员迭代度过改革期之后，非正式的人际关系对后续工作的影响很小，这是科层制的特点带来的。

^① 标志是在第一次换届仪式上，队旗和指挥刀本应分别授予新任队长和新任指导员，但改为由新队长一人接过队旗和指挥刀。

总之，改革导致身披“理性”光环的组织结构被不断发展——制度性架构愈加完善（第一次改革产生了全体大会制度，并投票通过了组织内部文件《〈S校G组织章程〉修正案》及有关技能训练、激励与处罚机制、勤务管理制度、队员的录用与辞退等方面的总共七条提案中的六条），人际关系和价值系统被强化而不是被改造（第二次改革的主要产物是部分成员合作完成的科研项目，以G组织思政育人角度入手，这一代中队和大队干部也开始定期组织非训练性质的团队建设和思政调研活动）。从“非改不可”到“如此便好”，科层制的技术性特点在实质上得到了加深，这就是“理性”光环之下、科层制组织之中的行动者互相博弈的结果。

五、结论

尽管S校G组织并不具备国家正式军事组织的保卫领土完整等军事功能，它也直接继承了正式军事组织的外形，包含成员着装、层级名称、组织纪律等。在军事角色中的军事功能部分是高度科层制的，非个人化的、组织的，但军事角色是高度漫射的，存在非科层制的军事特征和个人的行动领域，即包含功能等级的非军衔官阶的部分产生的权威性影响。在现实社会中，社会不同领域之间往往有一种隐性制衡的关系，通过罢工等方式可以实现。本研究的启示是，处在科层结构中的上下级也存在一种隐性制衡的关系，中间层级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因为他们既是管理者也是实际执行者，承担了G组织的主要组织功能。最高层级对最低层级的信息收集能力较弱，中间层有了更大的共谋的机会。这种情况下的支配是强力的，最低层级只能通过类似“罢工”的方式来获取辩论权利和争取利益的机会，这是G组织发生内部变革的根本原因。

在实际运行中，组织文化为集体中个人的存在创造了空间和参与感。成员们通过日常训练和仪式来进行互动，“集体主义的温情”就成为了G组织的宣传稿中常常出现的标语。社会主义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和人民军队的集体主义文化已然交融，所以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学生组织，共享情感、归属感和塑造团结的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ence)更容易在“半军事化管理”的G组织中被建立起来。

最后，组织规模对组织理论的影响不容忽视。当二十余人构成的G组织宣称自己为半军事化组织时，无论实际情况更偏向于军事化还是学生化，^①都可能带来意外后果，因为个人化的影响对该规模较小的组织影响较大。因此G组织在分工合作性强的高校环境中，名实不符（同时具有多种专用性，而未达到“通用性”程度）对其而言是一种必需的创造生存空间的手段。如将视角移到社会中，研究者用“组织外形化”概念来研究基层政府“一个部门两块牌子”的现象时，本研究的启示是：如果在微观层面观察，维持一套班子或许对实现组织目标有较大的作用，正如G组织融合“半军事化管理”的组织形式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组织功能一样，双重身份使组织成功地联系着内外部资源，维系着自身的存在，互相赋予着合法性。但本文的“双重身份”一词不仅修饰作为整体的组织，也可以形容G组织的成员。组织的“非协调约束”的来源不仅是制度环境，在高度科层制的情况下，组织面对的风险更来自于组织内部博弈产生的不确定性，组织成员对于组织获取资源的方式也可以施加约束，对他们的信念教育、奖励惩罚、要求规定等塑造了他们对组织的看法，会影响他们为组织带来的潜在资源情况，^②故非协调约束还来源于不同层级行动者由于信息和人事权的不均等分配。^③为此，理性的组织，换言之，理性的组织成员才会尽可能地采用各种符合理性的

^① 第二次全体大会的讨论的议题之一，是能否以G组织之名参与S校的学术竞赛和社会实践活动，军事化的特征被模糊了，但组织凝聚力有可能上升了，这或许是有效处理双重身份的制度化方式。

^② “为组织带来的潜在资源”指：组织成员联络其他组织成员做成某件事情以及对外联络其他组织的动力，成员对发动社会关系的动力不足则难以组织带来资源。

^③ 如前文所述，G组织和多数研究者关心的政府组织的基本差异是，前者较少涉及财权的问题。故本句话讨论的“信息和人事权的不均等分配”是针对本文个案的实际情况总结的，若需要扩展到社会其他领域，应当对事权、财权和部门设置等类型的决策权做更深入全面的分析。

方式为自身和组织发展创造更好的生存条件。这时“理性”就不可避免地和制度化、高度分工、弱个人性的特点挂钩，导致的结果是——对科层制组织的变革最难以撼动的就是科层制的制度本身，这是理性给现代人的礼物和枷锁。

六、讨论

（一）行动者界定与研究者偏差

在组织的实际运作中，关键行动者对概念的界定是至关重要的，关键行动者不仅指当下掌握组织的主要决策权的人，同时还包括潜在的能够为组织带来较多资源的人。在本文个案中，制度改革过程中，行动者的主要关注点为G组织是否是“学生社团”这一组织性质，而组织形式是被组织性质决定的次级事务。

此外，研究对象认为的“理性”和“官僚”，和社会学研究者接受的韦伯传统的“理性化”和“官僚制”概念往往并不对等，“理性”在社会语言学的意义上已经成为褒义词，因此一旦针对组织的改革指向科层制的后果，将更容易形成反对力量。如果直接将研究对象使用的概念直接转化为学术概念，会对研究信效度产生挑战。事实上，研究对象，即组织中的行动者，他们使用的语词和他们的界定也值得研究者挖掘，^①以此进入组织的微观运作层面，进行更贴近真相的观察和分析。

（二）方法与伦理

近年来，一些作者通过挖掘自身经历，创作出一批优秀的学生论文(晋军、闻翔、李丁、卢晖临,2023)。这一方面被认为践行了米尔斯(C. Wright Mills)提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能够把个人困扰和公共议题结合起来，另一方面诸如费孝通和阎云翔等具有深刻洞察和创新能力的学者前辈，都因为对田野点的熟悉程度和深刻关切得到了鞭辟入里的见解，所以参与式观察的方法容易受到社会学者的欢迎。但自我民族志会遇到挑战是，研究者是否带着目的性进入田野，如果为了研究而行动，得到的资料就未必是一种“自然情景”下的反应，而更倾向于行动研究。更危险的情况是，为了创新而创新，无法客观综合地评述材料，容易使研究丧失价值。因此，笔者认为既是研究者也是行动者的研究，并不天然地具备科学性。

本研究最终写作思路是在“我”正式退出S校G组织之后形成的，在“我”深度参与组织运作的过程中，主观上在第一年把自己的组织身份而不是研究者身份放在首位，这在整段经历的第二年发生了转变，在从事与该情景相适应的活动的同时，“我”获得了更多的局外人的观察视角，在内部和外部经验之间交替。也正是这个原因，笔者提出的所谓“组织内的非协调约束”等概念，是极度凸显行动者的能动性的概念。因为笔者认为组织是由个体成员构成的，通过理解不同层级中的每个个体的想法和动力，来看组织可以如何作为。该视角比较微观，也具有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方法论色彩。

本文的形成源自笔者对G组织发展的关心，法律规定的高校升降国旗的工作究竟应该由谁负责，如何实施？G组织的成员们如何在一种理想情景下获得身心的滋养与成长，这种理想的组织形态是什么样的？在学理上，其他类型的科层制组织受到的非协调约束的情况如何？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查尔斯·H·科茨、罗兰·J·佩里格林，1986，《军事社会学》，北京大学国防学会译，北京：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

^① “自我”是社会网络中的一员；纵向上，身体觉知到生命的流动性和事件的过程性，“自我”在动态的情境中。因此，自我民族志不仅呈现了“自我”的多样性，也认可了“我们”之间的异质性。这在深层次上，同现象学式的质性研究思路是契合的。

- 黄天, 2019, 《高校国旗护卫队发展的困境、探因与突围》, 《教育观察》第 20 期。
- 晋军、闻翔、李丁、卢晖临, 2023, 《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2022》,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 罗伯特·K·默顿, 2008,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 唐少杰、齐心 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彼得·布劳、马歇尔·梅耶, 2001, 《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 马戎、时宪明、邱泽奇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 田凯, 2004, 《组织外形化: 非协调约束下的组织运作——一个研究中国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的理论框架》, 《社会学研究》第 4 期。
- 万泉利、胡欢、赵亮 等, 2018, 《高校国旗护卫队组织建设及育人作用探析——以成都文理学院国旗护卫队为例》, 《新一代》第 7 期。
- 韦伯, 2004, 《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 康乐等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魏亚丽、孙杰远, 2022, 《自我民族志的原理及其对教育研究之观照》, 《民族教育研究》第 1 期。
- 项飙、吴琦, 2020, 《把自己作为方法》,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周雪光, 2003, 《组织社会学十讲》,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 2008, 《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 《社会学研究》第 6 期。
- , 2017,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 DiMaggio, Paul, & Walter Powell.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 Meyer, J.W., & Rowan, B. 1977.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2).
- Weber, Max.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edited by G. Rot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戏谑的虔诚：电子木鱼的信众吸引与维系

柯思羽*

提要：“电子木鱼”于2022年末获得广泛的关注和热度，它兴起的原因值得探究。本研究结合宗教人类学的信仰理论与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理论，采用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从个体与集体的角度对电子木鱼受众的行为成因进行分析。进一步讨论电子木鱼所代表的网络宗教亚文化为何吸引和维系信众，发现与游戏形式的激励机制和狂欢式的追求有关。网络宗教亚文化的吸引模式一方面可以作为传统宗教信仰传播的路径借鉴，一方面也揭示了当下网络和现实环境的恶化，蕴含着青年自救的诉求。

关键词：网络宗教 宗教亚文化 电子木鱼 身份认同 信仰维系

一、研究背景

进入21世纪，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深度嵌入了劳工经济与生产、政治权力与治理、社会关系与互动等人类行为和社会运行(赵一璋、王明玉,2023)。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 in 虚拟世界中重新建构，包括宗教生活。近年来，网络青年亚文化中的宗教色彩明显增多，如国创动漫《一人之下》、现象级网文《诡秘之主》、国产游戏《原神》等，它们或是切割组合某些宗教元素，或是以严肃的宗教世界观再创作，无论如何，“宗教”成为当下青年网络世界中凸显的存在。

2022年9月末，“电子木鱼”因一条新闻资讯获得了爆发式的关注率和的大量涌入的使用人群^①。电子木鱼是一款交互游戏，玩家点击平面风格的木鱼时，反馈出“功德+1”的字符和木鱼敲击声，简而言之，就是将佛教敲木鱼的行为移植到电子终端上。“木鱼-念经助手”一度冲上App Store免费版第二名，“电子烧香”“电子佛珠”“电子转经轮”等同类型app也陆续涌现。

图1 App Store 中同类型应用软件



* 柯思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社会学本科生。

^① 2022年9月，一女子下班疲惫敲电子木鱼缓解压力的新闻资讯得到广泛的阅读量，报道可见 <https://www.163.com/dy/article/HQ9KGKB00534A4SB.html>

图 2 电子木鱼的显示界面



电子木鱼为何如此吸引人？经过前期的潜水观察和试访谈，本文排除了“流行文化跟风效应”，大部分深度使用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从中获得精神慰藉等实在的感受，甚至表示将敲电子木鱼作为日常生活习惯，那么其作用机制将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电子木鱼同时具有宗教和亚文化的特点，它既是靠“信仰”，也是靠“认同”吸引信众。如此，引人入胜的背后是否存在对传统宗教发展的路径借鉴，或存在未被发现的隐患和不良因素？这是本文将展开的探讨。

二、文献综述

本文的研究对象“电子木鱼”同时具有宗教和亚文化的特点，所以需要网络宗教与宗教亚文化的已用研究进行回顾，确定电子木鱼是否是一种网络宗教，或者是一种宗教性亚文化，继而选择合适的理论框架对电子木鱼受众的行为成因进行分析。

（一）网络宗教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实体宗教再不是当代宗教的分布格局。互联网上的宗教网站的网页，到 2009 年就已经突破千万（中文网站）（郑筱筠,2018），2018 年 2 月 1 日开始正式实施的新《宗教事务条例》也增加了对互联网宗教管理的明确规定，可见国内网络宗教早已产生一定社会影响。而对网络宗教的研究，最早由西方学者开始，先驱性的研究有利里的《网络作为神圣空间：网上的宗教沟通》（O’Leary,1996）以及利里和布拉舍的《互联网中未知的上帝》（Brasher,1996），两者都论述了宗教在网络空间中的浮现和变革。至 21 世纪，对网络宗教的研究逐渐深入与细化，关注网络宗教的自我认同、社区、仪式等发展，比如哈登和考恩的《网上宗教：研究前景和展望》（Hadden & Cowan,2000）。此外，商业调查公司也注意到宗教在网络中的兴起，比如巴尔纳研究集团先后发布了《网络教堂的来临》、《网络教堂报告》（Heidi Campbell,2006）。

国内对网络宗教的研究稍滞后，可追溯到最早的研究是王建平在《世界宗教研究》上发表的《电子网络会改变宗教吗？》（王建平,1997）。可以发现，国内网络宗教研究多聚焦于宏

观整体,关注宏观议题,比如演变、社会影响、国家安全等,比如网络宗教事务管理的现实困境及路径优化(陈国成,2022),大数据下宗教信息的治理(李华伟,2022)。在此之中,网络宗教更多指代一种宗教现象,是实体宗教的网络化,比如数字人文宗教学视阈,关注道教借助网络的传播交流(张阳,2023),邪教的非法网络宗教活动(李元元,2016)等。虽然已有研究提出传统宗教在网络中的传播最终会产生新的宗教范式(唐名辉,2006),但缺少深入的实证研究。

有部分新闻关注到纯粹的网络宗教,比如孔德罡的“赛博佛学”亚文化观察^①,他认为“电子木鱼”反映出当下电子技术设备与传统宗教元素之间所构建的“冲突/共存”情境,隐含着神灵的存在与信仰“去实体化”的趋势,指向的是后人类时代人类思考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和对策的全新维度。作为时评,该文章缺少田野支撑,但足够表明存在某种类宗教,形式与内核都是全新的内容,而非实体宗教的网络化。

聚焦到信仰议题上,国内研究基本没有讨论网络宗教如何布教,或是信仰背后的深层原因,而是基本从宗教事务管理视角出发,认为以宗教信仰为主题的数字媒体容易出现不当言论的扩散、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等不良影响(艾曼·艾山江,2019)。或者谈论网络宗教传播对网民政治信仰的树立、道德人格的塑造及思想观念的养成产生的问题(陈国成,2022)。实体宗教对信仰产生的研究便较为丰富,且主要集中在人类学领域,比如信仰理论说信仰是观念的表达,是一种文化事实,因此在制度自我增加和文化屏蔽的合力下,信仰成为集体思维模式(吴乔,2020)。信仰的现代维系理论发展了该说法,科学认知水平已然提高,信仰通过强化性的互动(被当做真实的内容进行分享)与真实再现得到认可(王振威,2014)。

本文认为网络宗教采用数字媒介传播,不同于实体宗教,因此宗教信仰的产生与维系是值得重新讨论的,这是当前网络宗教研究的空缺。实体宗教里对信仰探讨的经验可以作为本文的理论参考,比如他们都对集体如何发挥强化影响做出解释,有助于本文分析团体行为的成因。

(二) 宗教亚文化

结合前文网络宗教的表现,电子木鱼目前的发展难以作为发生学意义上的新宗教,但因有着一定规模的虚拟社区和文化共识,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亚文化,本文最终选择以网络宗教亚文化定义本文的研究对象。

但学界上对于“宗教性亚文化”的讨论寥寥。日本聚焦二次元文化中的“圣地巡礼”现象有着较多研究,比如《オタク文化と宗教の臨界——情報・消費・場所をめぐる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宅文化和宗教的临界——围绕信息·消费·场所展开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今井信治,2019)^②,御宅族因为ACGN文化将某些现实地点神圣化,旅游是御宅族追求精神核心(二次元文化)和现实世界联系的连接点。可以看到这里的亚文化拥有了神圣属性,成为区别于世俗日常生活的内容。综合此点,本文这样定义宗教亚文化:当一种亚文化拥有宗教力,能自动引发或抑制成员的行为,并且它作用的领域异质于世俗,成员在该亚文化社群中集体欢腾,便可以说这是一种宗教亚文化^③。

中文学界仅有几篇相关文章是使用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学说进行宗教研究。比如采用身份认同的理论解释山东天主教村庄的宗教身份建构(杨丹,2018),以及采用符号消费解释台湾地区的宗教迎神活动(吕思慧,2010)。虽然不是针对宗教亚文化的分析,但给予本文如何采用亚文化理论分析宗教现象极大的启发。本文想探析电子木鱼及网络宗教亚文化为何拥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如何发挥效用,从宗教研究视角来说可以看作是探索网络宗教的信仰来源与机制,而从亚文化视角来说,可以看作是探索宗教亚文化的身份认同缔造方式与成员的行为动因。

^①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828885

^② 原文是今井信治2019年刊登在《宗教研究》93卷1期的论文,为了阅读方便,参考使用杜亚梅对该文的翻译报告作为参考。

^③ 因为今井信治及其他圣地巡礼文章基本采用涂尔干的学说作为理论依据,所以本文也以《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为参考给予定义

但是，身份认同等说法的探究对象是人而非文化，只能得到信众为何聚集与认可，无法得到电子木鱼如何作用于信众的机制。将宗教视角与亚文化结合，也就是以宗教亚文化的视角理解电子木鱼，就拥有了针对个体的宗教心理理论支持与针对群体的亚文化互动理论支持，并可以解释电子木鱼对待个人和对待群体吸引方式的差异。具体运用将在正文中体现。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网络民族志的方法，将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用以收集资料。2022年9月末电子木鱼成为网络流行文化的新秀后，本研究持续跟进相关话题的发展，主要锁定 bilibili、微博、小红书三个公开媒体的相关公共社区（话题、tag、评论区），在收集初步材料的同时也进行筛选进一步访谈对象的工作。于2022年12月末开始，陆续进行线上访谈，共进行三次试访谈与十次正式访谈，其中包括一名电子木鱼 app 的开发者、三名使用频率较少的用户与六名频繁使用的用户。平均访谈时长 41 分钟，平均每位受访者访谈文本字数在 10447 字，受访者的简要信息见下表：

表 1 受访人基本情况

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地区	使用程度
A	F**	女	18	河北	深度
B	H**	女	20	广东	深度
C	W**	男	20	黑龙江	偶尔
D	W**	男	19	江苏	深度
E	X**	女	19	吉林	偶尔
F	Y**	男	23	福建	深度
G	L**	女	22	河南	深度
H	C**	女	21	黑龙江	深度
I	W**	女	19	福建	偶尔
J	W**	男	30	广东	开发者

四、何以迷恋：电子木鱼的功用

（一）个人：丰富的自我体验

虽然电子木鱼的走红是因为一位职员借此缓解工作压力，但这并不是电子木鱼的唯一功能，根据访谈整理，主要有这三个原因吸引“信徒”下载软件：

一，缓解压力，压抑怒火。G 谈到，在她紧张准备考研时，一位已保研的朋友把电子木鱼推荐给了她。准备研究生升学的过程充满学业压力，机械重复的敲击让大脑完全放空，很好地缓解了心中的紧张。F 与她的感受一致，每天晚自习结束，他会花上固定的时间“摆烂”，即敲电子木鱼，忙里偷闲。

他们会选择用电子木鱼放松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都采用“无纸化学习”，即以平板电脑为纸，以电容笔为笔完成整个学习过程。学习结束后，可以直接打开电子木鱼 app，用电容笔替代键稚，实现敲击木鱼的模仿。其次是整套敲击的流程清晰简单，不需要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只要敲击就可以了：我觉得其他东西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单纯的，不用费脑子的。（E）

敲电子木鱼的效果在情感体验上尤其明显，除了消解焦虑与紧张，还能制止浮躁与愤怒。H 说，她感觉她所处的网络环境十分糟糕，经常看见令人恼火的言论，但谩骂回去不是好的

行为，于是，每当因网络上的信息生气时，她就打开电子木鱼敲击。她觉得木鱼是一种典型的佛教元素，而佛教文化能让她联想到“静”“平和”“佛系”等情绪，让她不再愤怒。

二、积累好运，祈福祝愿。有一部分人认为积攒功德可以带来好运，他们会将敲击的次数看成功德的数量，木鱼敲得越勤，功德的积累就越多，就越好运。比起以前的转发锦鲤的做法，电子木鱼的信众认为，“木鱼”“功德”这些佛教元素更有宗教色彩，“更加有来头”，就更加可信。反正都是图个心理安慰，功德还要我敲了才有，需要我付出点什么，我就觉得这样的好运更真实了，我更信它。(G)

三、积攒功德，消除愧疚。有用户向开发者反馈，一整套流程下来给他带来功德圆满的感受，似乎当场原地成佛。不过大部分人不是在纯粹积功德，而是把功德当做某种消耗品，抵消负面效果，“地狱笑话”是最经典的例子。“地狱笑话”是指一类将他人的不幸用来开玩笑的笑话。^①此时，有人提出可以敲电子木鱼来缓解“将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愧疚。实际上，这种愧疚并不真诚，而敲击一个虚拟木鱼形象似乎也不见得诚心，不诚的情绪刚好用不诚的行为抵消。

这种愧疚的情绪不是罪孽深重的坏事，不需要正经地告解，但它确实存在，电子木鱼形式由余，正式不足，是最合适的方法^②。

我是想做出一些事情，来缓解一下我的那种奇怪的愧疚感。我做错了事，但是我为它付出了代价，所以我可以把这件事情放过去，可以不用一直把它挂在心上了。(D)

此外，也有多名被访者提及自己言谈尖锐，有时说话伤人，敲电子木鱼积功德就等于积口德，对于这种笑一笑就能过去，但又膈应到自己的愧疚，用虚无的功德安慰自己正合适。

其余受访者还提到例如“木鱼声是良好的白噪音，可以催眠”“重复不断的木鱼声让她不怕黑”等原因。电子木鱼的开发者提到他制作这款 app 的初衷是为了方便民间佛教徒随时随地方便地敲木鱼，在家念经。因为民间佛教徒想要礼佛时，不像专业和尚那般，随手就能掏出一个实体木鱼。

总而言之，电子木鱼既有真实的木鱼“礼佛念经”“积功德消业力”的功用，也有更为世俗的“解压玩具”功用。但无论如何，木鱼的形象与其背后的佛教文化是吸引人使用的根本原因。当问及“如果敲的不是电子木鱼，而是电子香蕉，你觉得还会有相同的效果吗”时，所有人都矢口否定，E 这样形容：佛教元素就是这层包装纸和礼盒，是这层包装给了你心理暗示，觉得能受到保佑。

(二) 集体：寻求认同和慰藉

1. 基于熟人的线下互动

F 说，他了解到电子木鱼后，把这个 app 分享给他的同学们，他们经常会在一天学习结束后，共同敲起木鱼，甚至敲出分声部的节奏。这样共同合作的，有规律旋律的木鱼声让他们感到无比轻松。又或是预约一个自习室，将电子木鱼投屏到演示屏幕上，然后大家一起对着大屏幕敲木鱼。

如果没有人跟我一起敲的话，我可能就是下载下来，点开那么一两次，不会再打开。但和别人在一起敲，他们会给我一个非常正向的反馈，我会坚持去敲。(F)

^① 比如，说美国总统肯尼迪“脑洞大开”。“地狱笑话”的名字来源于英文互联网的一些黑色幽默笑话和梗图，大多带有类似“if you laugh, you go to Hell.”(如果你当听后笑出来，你就要下地狱)的标题。

^② 这样的动机和行为在 2021 年也有类似的实例。Twitch 直播平台上“修女直播间”一度火爆。主播穿上基督教修女的服饰，将直播间装扮成告解室，倾听连麦粉丝的忏悔。忏悔结束后，通过直播间公投的形式，决定告解人该下地狱或上天堂，将象征告解人灵魂的头像拖入相对应的地狱或天堂贴图特效中。

支持 F 继续敲电子木鱼已经不再是木鱼本身，而是敲木鱼的群体。电子木鱼基于熟人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发展出情感的共同体。大家会因为相同的需求（放松解压）聚在一起敲木鱼，形成一个以敲电子木鱼为共性的群体，开发出专属的玩法，这样互相需要才能实现的玩法进一步加强他们之间的联系，同时，被需要感激励了敲木鱼的行为，让木鱼缓解压力的功能更为持久与有效。

2. 基于地域的线上互助

寻求认同感与抱团是必然的，线下有天然的情感关系网使电子木鱼共同体更快形成，线上也有相同的现象，一个典型的实例便是“功德排行榜”的出现。它以省份为单位，统计各省份敲木鱼积累的功德值（每敲击一下功德加一），以功德值为指标给各省份排行。

图 5 功德排行榜



A 是河北人，她因为这个功德榜加入了河北电子木鱼群，为了争夺榜单第一互相鼓励敲木鱼。在更深入询问后，她说促使自己与其他人互动，去加入组织的原因并不是争夺榜一这个表面目的，而是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争夺榜一以一种滑稽诙谐的方式为她打开宣泄情感的途径。

我点进去一看，河北排在第一，大家就说这都是河北学子的怨气。我当时就觉得很有趣，但有趣过后就是同病相怜的感觉。因为你是心里很难受，所以去敲电子木鱼。这个地区敲的次数多了之后，就证明你这个地区是有很多人在受着折磨的。看着排名和功德值的攀升，我会觉得我跟同省的其他人都是处在一样的境界，数值越大，我们这个省里跟我处于同样苦难经历的人就越多。(A)

总而言之，基于地域、熟人或其他已有的共同点，电子木鱼在线上或线下发展出情感的共同体。他们会在操作上比较功德值，拓展合作玩法，创造出依靠群体才能达成的目标；在精神上寻找共同的苦难与需求，达成情感上的共识。这样，一个脆弱的共同体得到维持与凝聚，每位成员也能因共同体获得情感的慰藉。在这里，激励人们使用与得到的反馈不再是电子木鱼本身所带来的，而是在此之上形成的社群，或者说，电子木鱼进一步发展出社区感，当它发展出社区时，也证明作为风格的宗教亚文化正逐渐形成正式的组织。

（三）留还是流：信众的忠诚可能

经历一番爆发性流行后，电子木鱼虽不会消失，但总将归于平静。有人卸载了，将它抛之脑后，也有人把敲电子木鱼化为日常习惯，成为电子木鱼社区中坚实的成员。

1. 舍弃：流行文化的正常更迭

I：我会用电子木鱼来解压，是因为它是一个流行的事物，可以带来共同的话题，我在满足需求之外，也可以拿它作为聊天的凭据。但如果哪天小红书上又有一个新的tag火了，我可能就会去玩它而不是电子木鱼。

C：电子木鱼就像你生病的时候，吃了药，我隔离的时候很焦虑，它出现了，我觉得这个东西真好。现在病好了，不焦虑了，它就可有可无了。

在访谈中，有两名被访者表示现在没有继续敲电子木鱼，继续追问下，本研究发现，他们对电子木鱼的看法与其他被访者并不一样，他们把电子木鱼看成更精致的计数器，只是单纯享受敲击的过程。^①事实上，基本每一个受访者都会被重复简单的敲击行为感染，获得精神放松，但是他们会因为其他的要素，比如情感共同体或自身对佛教存在认同，寻找到比敲击行为更进一步的解决途径，这样，他们便不会因为新潮的过时或兴趣的消减卸载电子木鱼，而是将敲击电子木鱼当做日常的生活习惯。

2. 继续：成为日常生活的敲击

H：我已经习惯了有事敲木鱼的生活，其实我知道敲电子木鱼并不能实际上帮助到我，关键的时候肯定还是得靠自己呀。但就像我去雍和宫请一串手串，或者是去昌平那个庙求姻缘，能起到安慰剂的效果吧。

F：一开始是跟风，但敲了一段时间发现它比我想象中的还再好玩点，还有这么多人跟我一起敲木鱼，我再把木鱼安利给别人，别人也觉得好玩下载了，这就有种安利的快感，所以导致我现在还时不时敲一下吧。如果只是我自己敲自个的，可能一会就厌倦了。

有一部分人在化为习惯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行为简化与抽象化，比如打开连点器自动敲木鱼，他只要看着满屏增加的功德，听见持续发出的木鱼声，就能让他放下烦恼：就是不去点它，但是我有感觉我自己正在敲，又感觉我的功德正在增加，这个时候在佛祖眼里，我是在敲木鱼，但实际上我没有。比起手动敲，会觉得自己在作弊，就感觉自己赚到了，会更爽。

^① 但是，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结局，I表示，她的母亲的狂热的佛教徒，经常捐香火钱，购入许多佛教元素的东西，她因此对佛教有着相当强的抵触。但在经历敲电子木鱼的生活后，她对佛教有所改观，或许是体验到宗教于人的作用，她觉得佛教可能不完全是纯粹骗钱的坏东西。

(D) 又比如制作一张动表情包，有需求了直接看图，不用点开 app 去敲，更快更方便，也让电子木鱼更具有社交性：做成表情包后，我甚至可以随时随地给别人积功德。(G) 到这一步时，电子木鱼本是佛教文化抽象与简化的产物，用电子形象指代真实的木鱼，三个月后，它在抽象的基础上再抽象，一张动图，只要有木鱼与功德的图片和文字，就能指代敲击电子木鱼的行为，或者直接指代祈福与消灾。

这是电子木鱼发展到现在的状况，这会是结束吗，是否会出现另一番发展？本研究无法预测，只是将诞生至今的情况记录下来。

五、何以维系：网络宗教亚文化的模式

(一) 表层：游戏形式的激励机制

敲击电子木鱼本身就是一种十分有特点的仪式，不同于一般的宗教仪式，它将功德具象化，如此，宗教观念转变为可操作化可视化的行为，可以及时给予激励。一般的激励机制反射弧是长的，是延时满足，需要高度的自治力才能坚持下去，而电子木鱼就像电子游戏，有着短反射弧正向反馈机制，只要点击，就立刻能看见功德的积累。许多被访者都谈及存在这样的经历：敲木鱼与我写题刚好是两种相反的体验。我点了木鱼，它就一定会显示功德+1，但我写完题不知道能不能考 90 分。这种体验会让我更加有掌控的感觉，还有是自己付出一些行动后就一定有成果的成就感。(B)

这种及时正向的激励是电子木鱼能够抓住用户的关键，它不是首创，比如藏传佛教中的转经轮也是同样的道理。佛家认为念诵经文可以积累功德，但过去大部分信徒并不识字，无法念经，所以设计了这样一个转经轮，上面刻上经书，当它像拨浪鼓旋转起来，就代表一页一页翻过经书，从而积攒功德。但是，电子木鱼将这种的宗教仪式发扬光大。转经轮的制作并不容易，影响范围不大，而电子木鱼依托电子设备与互联网发展，轻而易举地将宗教中抽象深奥的概念变成可视可操作的提示，广泛传播开来。进一步来说，电子佛珠、电子转经轮也能达到相同的效果，也就是说，这是网络宗教亚文化的优势与特点。可以预见，在之后的发展中，电子木鱼的特性——短反射弧正向反馈机制将是网络宗教传播与发展的一项可参考路径，有助于信仰的简单快速传播。

(二) 里层：数字世界的解构狂欢

疫情与内卷的社会环境让人们在现实的生活中陷入恐慌或迷茫，这样的状态反映到网络这种匿名环境里，就容易带来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式的世界感受，插科打诨式的诙谐幽默与世俗化让人们对神圣的、权威的东西进行讽刺，保持一种通俗的不拘话语(孙梦琼,2019)，比如“马保国”“鸡你太美”和地狱笑话梗的流行。一位受访者反问道，既然已经能把罪恶娱乐化了，那为什么不能把功德抽象化娱乐化呢？(C) 他所能表达的不难理解，电子木鱼是对以往敲真正木鱼、礼佛、进香的一种颠覆。长久以来，宗教仪式一直是严肃性的活动，俗语言“心诚则灵”中的“诚”很大程度体现在对仪式的敬畏与付出的成本。而敲击电子木鱼，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消灾或祈福，不用遵循些繁琐的祈福礼仪，也不必担心被扣上封建迷信的帽子，它就在日常迷信和戏谑之间游走，消除了仪式和宗教信仰带来的严肃感，这符合了狂欢式下人们的追求。

同时，在压力状况下，人们思考奇异之事和迷信行为的频率会上升。压力减少了个体对自身的“控制感”，为了重新获得这种感觉，人们会参与到一些奇诡的意识活动和迷信之中，大数据信息解放又使宗教性的内容更容易被接触到，给予物质可能性。即使我们说现在是一个抽象和解构的时代，我们依然会去认可一些所谓传统的观念，包括所谓的功德吧，无论如何，这些东西能让人心理好受一些。(C)

总结大部分人敲电子木鱼的主要原因，焦虑、浮躁或者“缺德”，不难看出互联网环境

正在恶化,反过来,正是狂欢式促成电子木鱼的流行。在电子木鱼身上,传统与新潮,严肃与娱乐融合在一起,对于深陷焦虑与紧张的青年人而言,的确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同样,电子木鱼这样既神圣又世俗的特点实际上是网络宗教亚文化的特点,联系近三年的大环境,网络宗教亚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多的与传统相悖的特性,并吸引青年一代的关注,无疑源自与当下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亲合。

在电子传媒时代和文化数字化的语境下,后现代主义的一些重要概念可被视为思考电子传媒所引发的图像时代、阐释赛博空间的视觉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一种理论图式(麦永雄,2007)。Z世代青年是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群体,其原生环境的差异决定他们与成年人在文化创作和媒介使用方式上呈现异质性特点。网络宗教是这一代青年一手促就的,他们无神论的底色、对传统的反抗与对意义的空洞化会赋予他们的产物(曹钺,2019)。传统宗教总会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与一切的终极,这些神圣的存在不可亵渎、篡改。但网络宗教亚文化里,权威与终极缺位了,或者说人人都可以创造定义自己的权威与终极(梁坤,2018),如此,网络宗教可以被持续地赋意、再造、抽象。超自然的内核,神圣性的东西依然存在,但它已经被完全的世俗化,成为由数字符号堆砌的物化形态。

也就是说,恶化的网络环境与现实环境赋予电子木鱼被需要的可能,电子木鱼所代表的网络宗教亚文化的狂欢式和后现代底色契合了青年人的需要,因而获得极大的关注度和使用率。

六、结语

回顾网络宗教亚文化发展的二十年,从朴素的好运崇拜到赛博宗教^①,电子世界的宗教风潮从未消失。再向前追溯,上世纪武侠小说中的宗教元素,再到气功风潮,宗教自古以来都在朝世俗化的方向演变,乐于去与当时流行的元素结合传播。一个时间段有一个时间段的样式,宗教始终是人们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代表着人们对神秘的追求与渴望,对未知的好奇。早期提及宗教元素时,更多地去借用宗教的名,而不是宗教的实。而到近些年,电音大悲咒、电子木鱼,它们看上去依然是这个状态,只不过进一步加深,从宗教的名到一些宗教的法器、法咒的东西,是对宗教内容本身利用的深化。但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文提及,网络宗教亚文化的演变展现出一种解构的倾向,试图剥离传统宗教文化,将提取的宗教元素符号化,组合出某种悬空孤立的存在。而它的精神内核也更加反叛与具有攻击性,这并不是一个好方向,我们该对此警惕,而不是将“电子木鱼”“赛博宗教”看作亚文化模因,晃一眼就过去,任其在阴影处野蛮生长。

回到电子木鱼本身,选取它作为研究对象,展开本研究的田野,或许也有想借助电子木鱼的发展,体现当今时代不安的一面。无序狂欢或者愤世嫉俗并不是亚文化的后果,而是现代社会发展出现了问题,亚文化甚至成为现代人自救的途径。以本文的田野为例,某些宗教倡导的精神在现在这个社会是缺少且需要的,电子木鱼能够让一个人去体验到宗教上的东西,哪怕他没有去了解宗教,但通过电子木鱼能获得暂时上的精神放松与愉悦,让自己在浮躁的环境下好受些,那么电子木鱼在本质上,就是在行善,《法华经》言“以一灯传诸灯,终至万灯皆明”,就实现了它最好的意义。

参考文献

- 艾曼·艾山江,2019,《网络宗教与国家宗教事务管理》,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
曹钺,2019,《当代青年“锦鲤”文化症候解读——基于网络模因的发展谱系与意涵网络》,《当代青年研究》,第六期。
陈国成,2022,《网络宗教事务管理的现实困境及路径优化》,《世界宗教文化》,第二期。
杜亚梅,2020,《宅文化和宗教的临界围绕信息·消费·场所展开的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论文。

^① 指从2005年网络热门话题“春哥教”到“转发祈福”文案、锦鲤事件和现在的电子木鱼热潮

- 今井信治, 2019, 《オタク文化と宗教の臨界——情報・消費・場所をめぐる宗教社会学的研究》, 《宗教研究》, 第一期。
- 李华伟, 2022, 《大数据与互联网宗教信息的治理》, 《世界宗教文化》, 第四期。
- 李元元, 2016, 《网络宗教安全问题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 博士论文。
- 梁坤, 2018, 《“锦鲤祈愿”与“日常迷信”——当代青年网络俗信的传播社会学考察》, 《新闻研究导刊》, 第四期。
- 刘汉波, 2020, 《符号赋权、焦虑消费与文化塑造——作为青年亚文化的“日常迷信”》, 《中国青年研究》, 第一期。
- 吕思慧, 2010, 《布希亚的文化消费理论：以宗教迎神活动为例》, 淡江大学, 博士论文。
- 麦永雄, 2007, 《后现代多维空间与文学间性——德勒兹后结构主义关键概念与当代文论的建构》,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二期。
- 石丽, 2016, 《网络宗教、网络社会与社会治理研究——以S市调研为例》, 《世界宗教文化》, 第五期。
- 孙梦琼, 2019, 《狂欢理论视角下的“网络锦鲤”现象研究》, 浙江大学, 硕士论文。
- 唐名辉, 2006, 《网络宗教兴起的社会机制探索》, 《宗教学研究》, 第四期。
- 王建平, 1997, 《电子网络会改变宗教吗?》, 《世界宗教研究》, 第四期。
- 王振威, 2014, 《嗜酒习俗与原始宗教信仰的现代维系——以黎族杞黎地区为例》, 《贵州民族研究》, 第十一期。
- 吴乔, 2020, 《信仰原理、路径依赖与文化屏蔽——从花腰傣原生宗教案例谈文化、制度的形成与维系》,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十一期。
- 吴越, 2016, 《网络的宗教使用和宗教的网络复兴——国外宗教与网络研究综述》, 《世界宗教文化》, 第五期。
- 杨丹, 2018, 《亚文化身份建构》, 上海外国语大学, 博士论文。
- 张阳, 2023, 《数字人文宗教学视阈下的道教问题探析》, 《宗教学研究》, 第二期。
- 赵一璋, 王明玉, 2023, 《数字社会学：国际视野下的源起、发展与展望》, 《社会学研究》, 第二期。
- 郑筱筠, 2018, 《互联网宗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宗教文化》, 第一期。
- Hadden, J.K. & Cowan, D.E. 2000, *Religion on the Internet: Research prospects and promises*, New York: JAI Press.
- Heidi Campbell 2006, “Religion and the Interne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rends* (Vol. XXV).
- O’ Leary, S. & Brasher, B. 1996, “The unknown god of the Internet”, In C. Ess(e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O’ Leary, S 1996, “Cyberspace as sacred space: Communicating religion on computer network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Vol. LXIV).

耦合与重构：非正式制度视角下的婚俗变迁研究

张亮*

提要：本文将婚俗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考察了云南省河村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婚俗变迁。研究发现，在宏观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背景下，婚俗实质意义虚化和松散耦合造成婚俗环节的合并简化；计划生育等政策规制推动了新婚配模式的兴起；婚俗的内在时间性约束与技术环境间的紧张倒逼村民做出妥协与变通。推而广之，对非正式制度变迁的考察应将建构、结构与条件三重因素统合于行动的结构化过程，以把握其流变表征下的耦合与重构机理。

关键词：婚俗 婚俗变迁 非正式制度 制度变迁

一、引言

2010年2月，田仁夫妇与儿子儿媳一同踏上了前往四川的大巴车^①。对于在云南河村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二老来说，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出远门。虽然历经了多天的舟车劳顿，但田仁认为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只有我们双方家长见了面，他们（儿子田林与儿媳杨燕）的婚礼才能算是真正圆满了。这是基本的礼数，也是我们的责任”（访谈编号：1984-田仁）。

在河村，“圆满”的婚礼有着一套约定俗成的传统流程与要求。第一，男方须要在媒人的陪同下到女方家“提亲”。提亲仅是初步问询女方家庭的意见，一般不声张，所以人数多控制在2~3人，携带的礼品也较为简单。第二，若女方有意愿，择日便可去“看家”，实地了解男方的家庭情况、经济条件、邻里关系等。第三，女方看家后的态度会通过媒人告知男方，得到女方同意后，男方还须邀约6~8人携带糕点到女方家取“八字”，并带回家请人掐算，简称“拿八字”。第四，若八字合适，双方即可择日“起媒”婚，这相当于女子正式宣布愿意嫁给男子。届时女方会邀请邻里亲朋到家中聚餐，男方则要根据订婚宴的人数预购糕点、猪肉、食盐、茶叶等物资送到女方家，并在宴席结束后将糕点分发给双方亲朋好友。第五，起媒后，男方还要再次到女方家“过礼”，商量双方的彩礼和嫁妆，敲定正式成婚的时间。第六，过礼后的环节便是迎亲成婚。当天，男方需要在午饭后前往女方家迎亲，并在“八大碗”的晚宴开始前赶回。第七，成婚三日后，新婚夫妇还须一同回到女方家，完成最后的“回门”。在田仁结婚的20世纪80年代，这套婚俗基本被河村人严格地遵循着。

相比于父母，田林夫妇的结婚历程则大不一样了。2008年，田林在广东打工时结识了与姐姐一起外出打工的四川女孩杨燕，两人很快坠入爱河。2008年末，田林带杨燕姐妹回云南老家过年。年后，田林和他的舅舅又与姐妹俩一同回到四川老家提亲，并决定在2009年12月正式成婚。在这个过程中，“看家”被简化了，“起媒”、“过礼”与“看八字”被压缩了，家长见面的时机颠倒了，“回门”的时限也放宽了。虽然田林夫妇最终完成了河村婚俗中的所有环节，但其具体顺序与形式却显然与传统的要求相差甚远。田林的结婚历程看似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但它的确反映出了近年来河村婚俗的一些普遍的特点和趋势。如田林所言，正是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事，而且大家也都这么做，我们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访谈编号：2009-田林）。那么河村婚俗的变迁是如何发生的呢？这是本文的主要经验

* 张亮，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 根据学术规范，本文出现的所有人名、地名均已进行匿名化处理。文中所引用的访谈材料也均以“成婚时间+匿名”的形式标注，例如1984年成婚的田仁的访谈材料，被编码为“1984-田仁”。

问题。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从历史上看，自周代以来作为非庶民的正式制度的婚礼不断下沉和扩散，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完全变成了一种非正式的婚俗。鉴于此，本文尝试将婚俗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回顾有关制度变迁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本文的分析框架。

（一）制度的折变：从婚礼到婚俗

婚礼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社会中构成人们生命历程的重要环节，有着明确的程序要求和意义指向。“娶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曰婚”（段玉裁,1981:614）。因为男方通常在阴阳交合的黄昏时分到女方家迎亲，所以古称“昏礼”。现代所谓的“婚礼”，实际上是古时的“亲迎”之礼（王玉波,1990）。据《仪礼·士昏礼》记载，迎亲乃是古代婚礼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在此之前还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五个步骤，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套有序的婚姻程式，也即后世所称的“六礼”（李学勤,1999:60-110）。礼节的繁复体现了中国社会对婚礼的重视，如《礼记·昏礼》开篇明义，“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

自天子至百姓，婚礼始终是婚姻确立的最重要的仪式，只是礼隆、礼陋有所不同（孙希旦,1989:81-82）。“惟当时礼不下庶人，故自汉及唐，无强制庶人亲迎之令。宋朱熹等儒家发挥以礼设教之意，将礼法推行于民间。”（费孝通,2009:169-223）。宋代之后，有关平民百姓所行之礼的正式文本才逐步出现和丰富起来。清末民初，制度化的国家礼仪与民众自然生成的生活习惯互构，呈现出一种礼俗相交、以礼节俗的一种社会状态或文化特质（张士闪,2016;杨志刚,1994）。如《金翼》中张茂德的结婚流程即与《礼记》所记载的“六礼”基本一致，这与当时苏南江村的情况也如出一辙（费孝通,2012:99-105）。此外，《满铁农村调查》亦有佐证，华北平原是时的婚俗也基本符合“六礼”的程序（徐勇,邓大才,2017:27-30,85-86），只是规格因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差别（黄宗智,2000:266-268）。

伴随着新中国成立而发生的上层建筑的重构使“礼教”丧失了国家层面的制度合法性，但民间却仍沿袭着传统的婚俗。五十年代初新《婚姻法》的颁布及关于男女平等、自由恋爱、反对父母包办婚姻的大力宣传，虽给传统婚俗带来一次外部冲击，但由于青年男女无力替自己积攒巨额的婚姻费用，婚姻依然大体沿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俗（阎云翔,2006:49-61;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2001:281-300）。在人民公社时期，虽然包办婚姻不断减少，介绍对象和自由恋爱的比例不断增加，但传统文化设定了一套提亲、相亲、订亲和结婚的程序，公社里的每一个年轻人也无一例外地按照这套程序去完成自己的婚姻大事（张乐天,2005:295-300）。管中窥豹，曾经作为在国家系统中有着严格文字规定的政治特权与等级区隔仪式的“礼”，业已成为融嵌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与道德世界中的“俗”，并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与行动。

在上述背景下，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对婚俗变迁的研究：首先，接续已有经验研究的时间线索，聚焦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婚俗变迁历程。这有助于我们将对婚俗的考察纳入整体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理解婚俗作为一种极具社会嵌入性的制度是如何存续的；其次，关注构成传统婚俗整体流程是如何增减、合并、变形和调序的，以此理解婚俗的整体变迁过程，而非对婚俗中的彩礼（王思凝,贾宇婧,田耕,2020）、婚礼（李银河,2002）、婚宴（曹晓昌,张盼盼,刘晓洁等,2020）或其它某个单独环节的考察；最后，不同于晚近对婚俗研究从阶级、法律、道德、文明化等视角作原因分析和政策建议（鲍宗豪,1992;康娜,2013;杨宇帆,2015），本文试图将婚俗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来处理，进而在已有（非正式）制度及其变迁理论的脉络中进行经验分析和理论扩展。

（二）将婚俗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是道格拉斯·诺斯(2008)在其经典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首次提出的。按照诺斯的观点,非正式制度是与正式制度相对应的、同样对人们的行为起到约束作用的一系列规则,它们并非经过人们有意识的设计而是在人们长期的社会交往中自发形成、并得到人们认可的约定俗成与行为规范,主要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及风俗习惯等。根据诺斯的定义,我们发现,事实上在中国乡村地区存在着大量的非正式制度,如各种民间信仰、宗族及宗教仪式、道德观念、民间风俗和社会习惯等。它们在特定的乡村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与国家正式法律法规等共同制约着村民行为,对村庄社会的意识形态、日常生活、村庄政治以及公共物品供给等有着重要影响(王冬梅、李小云,2010;周雪光,2019;温莹莹,2013)。

需要注意的是,以往对非正式制度的狭义定义多将其限定在政治领域,但非正式制度涵盖了政治、经济(如黑市交易)和社会(如约会规则)等各个领域(Helmke and Levitsky,2004)。在社会领域,广义非正式制度主要表现为具有约束力的交往规则,最为典型的便是传统风俗。这些规则并无成文规定也并非由官方力量推动实施,但又对人的行为普遍产生约束力(蒋光明,陈慧荣,2022)。然而并非所有非正式性的映射都能成为非正式制度,只有那些能够以可预期、程式化的方式重复下去的部分才能够制度化(Radnitz,2011)。换言之,它们应当是在总体中时空伸延程度最大的那些实践活动(吉登斯,2016)。按照一般定义,“婚俗,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婚姻习俗,它以有规律性的活动约束人们的婚姻行为与婚姻意识,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鲍宗豪,1992),符合(社会性)非正式制度的基本要件。

那么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是如何发生的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一种路径是强调个人观念和理性选择对非正式制度变迁的重要影响。制度变迁实际上是把某些观念转化为新制度的过程(Tang,2011)。相比正式制度而言,非正式制度和社会观念的关系更为紧密,其变迁大多更为缓慢、渐进,非正式制度具有“顽强的生存能力”(诺斯,2008)。Knight(1992)从理性选择的视角出发,认为制度具有分配效应,行动者在持续博弈中保持制度均衡,不同立场的力量对比变化则会导致制度变迁。适应性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对限制过多的不合理正式制度的创新性回应(K. Tsai,2006)。Culpepper(2005)则认为“共同信念转变”才是制度变迁的必要条件,当人们开始相信旧有认知的错误,进而重新形成新的预期并遵循新的规则,非正式制度才将实现变迁。Helmke(2004)对上述两种观点进行了整合,提出了非正式制度变迁的三种主要动力:一是正式制度的变迁,尤为适用于内生于正式制度结构的非正式制度;二是权力和资源分配结构的变化,尤其适用于外部环境变化导致现行制度受益者优势弱化、受损者权力增长的情况;三是行为者的理念和预期发生变化,尤其适用于根植于传统文化的非正式制度。

与上述强调个体观念与理性选择的解释路径不同,伯格与卢克曼(2019)认为,制度是那些个体所经验的符号系统,是个体所面临的一种外在的和强制性事实的实在。赖特·米尔斯(2017)也认为,社会学要具有超出个人的眼光,注重对历史性与结构性因素的考察,以此捕捉到诸事物之间的关联。在社会学制度主义看来,制度对行动者施加了强大的约束,甚至充当行动者理解周遭世界、采取适宜行为的模板与脚本,并塑造了行动者的自我认知,建构了他们的理性与偏好。制度是一种“制度环境”,被定义为一个组织所处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社会规范、观念制度等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区别于组织的“技术环境”,是组织合法性的来源(Meyer,Rown,1977)。在此基本关照下,Dimmaggio和Powell(1983)把制度的维持与扩散分为三种不同的机制,即强制、规范和模仿机制,这些机制界定了人们采纳新的结构和行为的不同力量或动机。作为发展和延伸,理查德·斯科特(2010:55-100)进一步地讨论了制度合法性来源的三大基础要素: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它们对应的合法性基础分别是法律制裁、道德支配和可理解、可认知的文化支持。然而,如何处理能动与结构的关系是社会学制度主义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基本困境,也构成了解释非正式制度变迁的重大挑战(崔珊珊,2022;理查德·斯科特,2010:85-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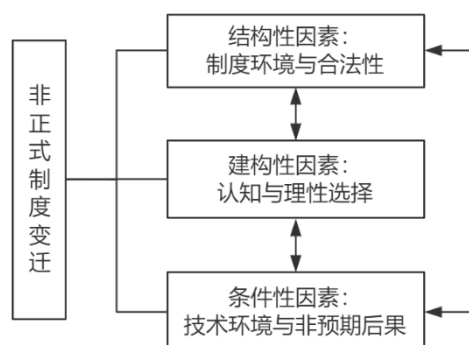
个体层面的内生性动力与制度层面的结构性约束构成了理解非正式制度变迁的两种看似对立的理论进路，“结构化理论”则为两者的统合提供了可能的理论框架。首先，吉登斯(2016)认为社会结构具有二重性，它们既是它们所组织起来的实践的中介，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而且这种过程总是历史地循环进行。结构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在行动和制度中被循环反复采用的规则与资源，是转换性关系的某种“虚拟秩序”。所谓的制度，即是在总体中时空伸延程度最大的那些实践活动。其次，行动者在参与社会结构的生产和再生产时，既要利用规则和资源，同时也要面对各种条件限制和非预期后果。行动和事件的持续积累最终会带来组织性和系统性的整体变动。最后，任何一种制度或社会系统都并非是独立自在自足的，而是处于一种“跨社会系统”(inter-societal system)的状态，即存在着跨越各个社会或社会总体之间既有分界线的社会系统，也包括一些不同社会的聚合现象。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建立起一个非正式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并以此阐释河村婚俗的变迁过程。

(三) 分析框架与田野简介

综合上述理论讨论，本文将根据下面的框架分析非正式制度（婚俗）变迁：

图 1 非正式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

(1) 结构性因素体现为制度环境及其合法性机制，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涵：一是作为正



式制度、法律、政策、规章等的制度环境，它构成了非正式制度（婚俗制度）运作与个体选择的结构性约束/规则。换言之，婚俗制度并非是一个完全独立自足的系统，它发生于更大的制度环境的之中，仍受到正式制度中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等合法性机制的影响(理查德·斯科特,2010:85-88)；二是婚俗制度本身又构成了个体或群体行动的制度环境，行动者在遵循规则的同时也有了支配资源的合法性。用韦伯的话来说是通过正当性信念在行动层面的达成而展现出的传统支配的效力(韦伯,2019:153-156)。

(2) 建构性因素体现为个体或群体认知和理性选择。对非正式制度（婚俗制度）的社会认知与正式制度环境和村庄群体结构息息相关，在“地方/生活—国家/系统”两个世界的碰撞与融合过程中不断建构。理性选择本质上是在社会认知的基础上作出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除了结构性因素外，还需要考虑其技术环境和非预期后果，这些条件性因素是行动的工具目标得以实现的现实物质基础。

(3) 对非正式制度（婚俗制度）条件性因素包括技术环境与非预期后果两个方面。与制度环境要求个体和组织不断接受和采纳外界公认、赞许的形式、做法或者“社会事实”不同，技术环境要求组织有效率，即按照最大化原则组织生产或者运营。我们将试图其扩展到社会行动领域，并将其作为行动者对行动效率的内在要求和行动过程中必须考量的物质技术条件，例如由通信、交通等技术发展而带来的社会性的时空压缩(哈维,2003:324-385)。

(4)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结构、建构和条件因素只是一种类型的理想分类，而包括婚俗在内的任何的实践都是一个诸多要素混融其中的不断变化的结构化过程，因此对非正式制度变迁的研究应该更注重其过程性、动力性、非均衡性的性质(诺贝特·埃利亚

斯,2013:3-10)。

本文经验材料来自笔者 2022 年 12 月-2023 年 2 月在云南省河村所做的村民生活史调查。田野调查期间,笔者首先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和村民问卷的方式,收集了河村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内三十多对夫妻结婚历程的口述史,及其基本家庭人口婚育信息;其次是通过参与式观察,亲身参与了两场完整的婚礼,观看了一场发生于 2016 年的婚礼录像;再次是收集地方相关档案、政策文件、音像材料等。通过上述三种不同类型的材料,本文力图在比较、印证与相互补充中尽可能还原当地婚俗转型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把握绵延其间的嬗变机理。

三、传统的松动：意义转化与松散耦合

(一) 传统婚俗的情理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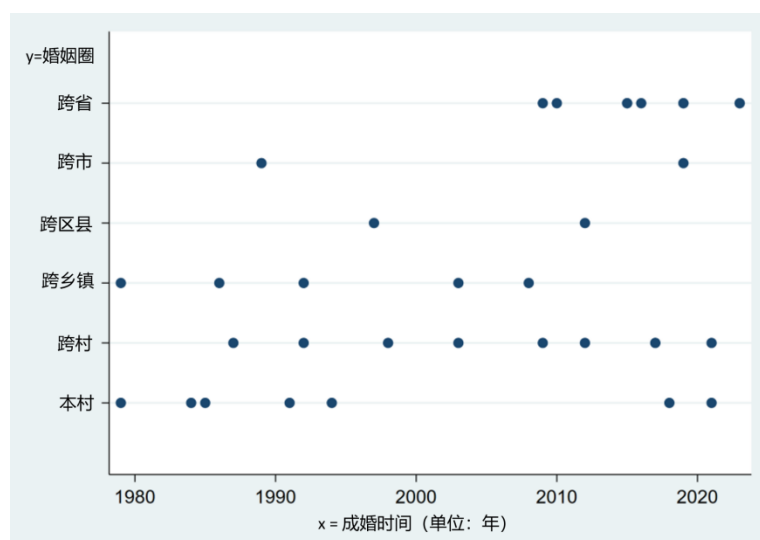
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传统婚俗流程中的每个环节基本都是合乎情理的。婚俗的意义伴随着其循序渐进的实践过程而逐渐生发,婚俗中的各个环节都是道德意义网络之中衔接个人道德感受力与集体习惯的节点,有其内在的道德嵌入性(王思凝,贾宇婧,田耕,2020)。在河村,男方除了要在提亲、喝小酒、起媒、过礼、回门等重要环节主动前往女方家外,平时也要常去女方家帮忙,借此表达自己的诚意,增加女方对自己的好感。按照河村人普遍认同的说法,“虽然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但结婚是一辈子的事,做父母的肯定要帮忙把把关”(访谈编号:1992-李贵)。加之看家环节,男方似乎一直处于女方的检视之下。然而从男方在不同阶段的差异化投入来看,这套婚俗其实也是男女双方相互考察的过程,男方也借此了解了女方的个人品质、家庭环境、邻里关系等情况。一个证据便是,男方因不满女方或其家人秉性而中途取消婚约的情况在河村时有发生。河村这套循序渐进的婚俗流程,体现了为人父母对子女婚姻的慎重考量。顺利通过这套流程,也意味着双方家庭乃至家族对男女婚配的接受与承认。与这种社会承认相伴而来的,是一个充满道义的社会经济空间,这些实际效用对于一个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新家庭来说至关重要。如余强所言,“我们结完婚还欠着一屁股账。我家老丈人看我比较上进,于是拿了点钱给我做挂面。他认得我们做面辛苦,时不时还叫我丈母娘买点东西来瞧瞧我们。我们也争气,苦了两三年基本就把欠的钱还完了,后来还盖了这个房子。”(访谈编号:1986-余强)

除了亲属关系内的增益外,成婚也是一种“成人”的通过仪式,赋予婚姻以更大范围的社会合法性。在河村人的观念与话语体系中,是否“成人”与自然生物年龄无关,而取决于结婚成家与否。“成人就是说结了婚,成了别人的丈夫或者媳妇,有自己的家庭、儿女,就要自己讨生活、过日子了”(访谈编号:1979-谢伟)。因此一个人如果没有成婚,即使到了耄耋之年,那也不能说“成人”了。在笔者的参与观察中,河村婚俗中的“喝小酒”与“成婚”时的婚宴都体现出了一种热烈、欢腾与公开的氛围,似乎是一种从日常生活的平淡中苏醒过来的场合。这些宴席虽然远未达到“夸富宴”般的奢侈与挥霍,但却蕴含着与后者类似的公开宣示与获得承认的总体性功能(马塞尔·莫斯,2016)。因此婚礼作为关键一环,被视作婚姻真正在社会层面达成的标志(张立平、樊平,1993),是河村人所期望的正常生命历程中的一项重要“通过仪式”,一种永久性地加入新环境的仪式,一次脱离旧的社会身份与加入新的社会角色的转变(阿诺尔德·范热内普,2010:10-18)。这种仪式又直接指向了农民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贺雪峰,2008)。因此所谓的“成人”其实是一种“概化他人”,体现为一种能够“过日子”的资格能力(吴飞,2009),也即成为可以“承前启后,生个传宗接代的后继者”(费孝通,2009:225)。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婚俗的合法性来自于河村社会本身,村庄共同体的力量又在婚俗的不断重复中再现与自证。遵循和实现婚俗的要求有助于在传统的规范裁决下“成人”,获得社会的承认。如若不然,则可能受到各种嘲弄与排斥,在村里“抬不起头来”。

（二）婚俗情理的渐进虚化

家族对婚姻的审慎控制与乡村社会的群体结构是婚俗存续的实质理由与合法性基础，婚俗也自然会随着前者的虚化而发生松动。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转型，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直接的动因是经济改革，这是确定无疑的(李培林,1992)。虽然从整体上看，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工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到人口城镇化的历史过程(周飞舟等,2018)，但由于发展的时空不均衡性，河村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出现“半耕半工”的生计模式。直至 2017 年前后，随着村庄农地的大规模流转经营而进一步转向“全工”模式。在这个逐步摆脱土地束缚而流入更为广大的劳动市场和社会场域的过程中，河村人的婚姻圈也自然发生扩展。与婚姻圈的扩展相伴而生的是男女双方婚配模式的变化，即自由恋爱逐渐增多，并逐步取代介绍型婚姻而成为河村人的主要婚配方式。根据图 2，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1 世纪初，河村人的婚姻圈主要在县域范围内，并以本村与跨村婚配为主。大约在 2010 年前后，跨区县、跨市、跨省婚配逐渐兴起。虽然在此之前也曾出过现跨区县和跨市的婚配，但其多是介绍型婚姻。加之电视媒介和网络通信的快速发展与接续普及，河村也呈现出了与下岬村类似的趋势，即个人在自己婚姻中的自主性不断增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再是婚姻中决定性因素，而变成了参考意见(阎云翔,2006)。

图 2 河村婚姻圈与婚配方式的变迁趋势



传统婚俗内涵的实质意义的渐进虚化趋向，从河村人对结婚证的理解中也可见端倪。根据 1982 年以来历次颁布的《云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结婚证始终构成小孩落户的基本材料，“男女双方依法办理结婚登记并取得《生育证》后始得生育”。“办结婚证只是为了让孩子正常落户，顺利上学，基本没有考虑过领证对我们婚姻有什么(意义)”(访谈编号: 1998-李国利)，这种观点得到了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中成婚夫妻的普遍认同。直到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指出“非婚生子女落户需提供《出生医学证明》和父母一方的居民户口簿、结婚证或者非婚生育说明，按照随父随母落户自愿的政策，申请办理常住户口登记，随父落户还需提供亲子鉴定证明。”这也意味着，结婚证在取得生育合法性上的功能在逐渐减弱，而跟多地指向于婚姻或爱情本身。

从个体自主性的角度看，结婚证甚至成为河村青年逃离父母或原生家庭桎梏与追求浪漫之爱的重要手段。在河村，“生米煮成熟饭”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未婚先孕，二是偷户口本结婚领证。前者体现了通过生育对婚姻进行“道德绑架”，后者则是一种“向上借力”。因为结婚证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安排，象征着一个超越地方性的国家力量对婚姻的确认和保障。否认这种合法性不仅有法律上的风险，还须面临在户口本“婚姻状况”栏被戳印上“离

异”标签的后果。此外，“按法律说，我们离婚了，娃娃就必须归我。但不是说他就一身轻了，他每个月还要给一笔抚养费”（访谈编号：2017-李玉蓉）。结婚证将法律关系纳入婚姻关系之中，这也为婚姻破裂后的财产分割、子女归属等问题提供了依据。“结婚领证”作为一种可兹利用的制度规制与合法性资源卷入婚姻的全过程，同时也作为一种常人生活中的国家仪式，逐渐侵入村民的道德世界，重塑河村人的行动伦理，冲击和融入河村婚俗所扎根的地方权力文化网络。

（三）形式遵从的理由与后果

如果婚俗的实质意义已经有所虚化，那为何还保持着形式上遵从呢？首先，日常实践的展开不仅需要某种能够在话语层说明的目的性，还依赖于那些“理所当然”的自然态度(吉登斯,2016)。后者可以被为一种“文化惰性”，也即“我祖行之，我父行之，我亲戚邻里俱行之，我岂可不行？此为奉行习俗之惟一理由”(费孝通,2009:190;顾涛,2012)。其次，从社会底蕴上看，传统并非意味着某个固定的“过去”，它参与建构“当下”，并可以作为积极有意义的组成部分(杨善华、孙飞宇,2015)。婚俗的传统意义尽管有所弱化，但却并没有彻底消逝，其中仍蕴含着有关爱情、责任、家庭、承认等理想要素，这无疑也推动了河村人对婚俗的遵从。最后，尽管传统本身便可构成自身的正当性来源，但无论是在共同体抑或联合体中生活，任何形式的支配又都隐含着一种基于利害关系的自愿同意(韦伯,2020)。因此形式上的遵从实质上仍是一种基于利害考量的“松散耦合”。在社会学制度主义看来，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运动形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从耦合关系来看，耦合通常包括紧密耦合、松散耦合和非耦合。松散耦合可以使组织在保持标准化、合法化、正式结构的同时，又使其具体的活动可因情境而异(Weick,1976;Meyer and Rowan,1977)。正如前文所述，婚俗作为一种地方性制度环境，仍能为新人带来社会承认及可能的经济增益。但从其行动的伦理动因上看，支撑婚俗得以维继的力量已经逐渐从村庄集体层面坍塌到家庭内部，这点在那些自由恋爱但仍坚持传统婚俗的案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老一辈（爷爷奶奶及父母）的思想不容易扭转过来呢。孝顺孝顺，顺就是孝。对于我们（夫妻）两个来说，看家、喝小酒、起媒什么的都没必要了，但为了顺着他们的心意，我们还是按这套习俗来”（访谈编号：2016-杨远）。

对婚俗的松散耦合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化遵从的努力，因此只须在名义上保持婚俗中各个环节的整全即可。如开篇所述，提亲、看家、起媒、过礼、迎亲、回门构成了河村传统婚俗的“六礼”。但在笔者调查的34个案例中，1984年首次出现了起媒和过礼两环节的合并，1992年的两对新婚夫妻也将起媒和过礼在一天内完成了，而2008年后的每对夫妻几乎都是将两个环节简化为了所谓的“起媒过礼”这一个环节。按照传统婚俗的要求，彩礼与嫁妆应当一般在“过礼”时议定，但如今却大都被安排在“看家”之后，“起媒过礼”之前，即在“拿算八字”时便协商敲定。也就是说，“过礼”这一环节实际上被前置了，但名义上仍保持着传统的流程。这种“名”与“实”的分离，一方面是由于制度理想与主体实践之间的紧张，即财富的多寡越来越成为评判个人能力和达成婚姻联结的重要指标，诸如彩礼、嫁妆等切实物质要求亦须在举行关系正式公开的仪式——“起媒”前得到确认。另一方面，河村人大都无法从根本上挣脱家庭与地方社会，无论是在村庄还是在亲属关系内部，情理压力仍具有其内在固着性。虽然“过礼”在实质上被前置了，但在名义上仍须予以申明和承认。

然而正如田林夫妇的案例，除了由于“松散耦合”而对“起媒”、“过礼”作出合并与简化，河村还存在着对传统婚俗环节的增减、变形与调序。对此又该如何解释呢？这是本文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四、制度挤压：婚俗变迁的结构性推力

在前文关于结婚证意义的转变的讨论中,我们已能初步窥见国家正式制度对河村婚俗的影响与冲击。此外,在现代化的实际需求与理念指导下,那些试图改善人们生活境况的清晰化与简单化的国家项目与行政干预,也产生了许多历史性的非预期后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范围内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乡风文明建设运动以及新冠疫情期间的特殊政策都深刻地影响了河村的婚俗实践。

(一) 计划生育政策与新婚俗的兴起

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河村人口结构的代际差异。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大陆人口数量突破10亿大关。为应对中国日益加快的人口增长速度,缓解因人口压力而带来的各种社会和经济等问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政策要求每个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也被称为“一孩政策”。1984年起,计划生育政策有所调整。各地陆续实施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双独两孩),多数省份对只有一个女孩的农户实行可以生育二胎的政策(一孩半),自治区和一些省的少数民族(壮族、满族除外)可以生育两个子女。20世纪六七十年代,河村的每个家庭大都有多个孩子,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兄弟姐妹。然而在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控制下,第一胎是否为男孩成为了判定夫妻能否继续生育的关键,独生子、女孩-男孩与女孩-女孩成为河村新生代的家庭人口的三种简明类型。

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造成了“嫁娶”上的困难。按照河村的传统,一般是儿子娶妻,女儿嫁人,男子嫁到女方家做上门女婿的情况则少之又少。除受家计、养老、传统观念等的影响,多孩生育造成的家庭内部的性别均衡是保证每个家庭都“能嫁能娶”的社会人口基础。换言之,河村传统嫁娶模式在普遍多孩的情况下,也即直到20世纪末,一般都不成问题。但新的生育结构下,那些生育两个女孩或少数生育两个男孩的家庭则面临一种“嫁娶”上的困难。首先,对于有两个女儿家庭来说,河村人普遍认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如果女儿都按传统外嫁,那么父母便会无人照看。河村人“养儿防老”的观念里也默认和预设只有男性才能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其次,由于做上门女婿对于许多男性及其家庭来说实际上是一件略不光彩的事情,它说明父母没有足够的能力为儿子娶媳妇。但如果两个儿子都娶亲的话,整个家庭将要面对很大的经济压力,甚至激化家庭内部矛盾与纷争。河村人最现实的一个考量便是,随着土地政策的收紧,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下的新生儿即使达到适婚年龄,村集体也不可能再像对其父辈一般地给他分配宅基地。^①按照笔者收集到的近68人的平均初婚年龄来看,从出生到成婚需要经历23年左右的时间。因此这种隐含的“嫁娶”矛盾的可能性也将在二十多年后逐步暴露出来,这是人口政策必然产生的迟滞效应。

为解决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的“嫁娶”问题,“两头在”逐渐在河村兴起。到21世纪初,严格计划生育实施以来的第一批新生儿已经逐步达到适婚年龄。与此同时,一种新婚配模式——“两头在”也逐渐在河村铺展开来。“两头在”的婚居模式免去了男方给彩礼、女方给嫁妆的经济压力,男不言娶、女不言嫁,婚后可以上两方老人家里轮流居住;孩子则一般需要生两个,一个随男方姓,一个随女方姓,对两边老人都称“爷爷奶奶”,双方共同赡养双方的老人。这种婚配模式不仅是经济逻辑和文化价值所趋,还是一种独生子女家庭内部利益协调机制。它一方面调和与模糊了因计划生育政策及其相伴而来的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而引发的“嫁娶”矛盾,另一方面减少了双方在彩礼和嫁妆上的投入,又兼顾了双方家庭的赡养和抚养责任。显而易见,这种婚配模式也重塑了河村的婚俗传统。在“两头在”的婚配模式中,由于嫁娶之别的消除和模糊化,“提亲”、“看家”、“成婚”等环节转变为了双方齐平对等的过程,传统婚俗中的“起媒”、“过礼”、“回门”等环节也丧失了实质性意义,同时失去了形式上存在的必要。

^① 如果是在城市社区,那么这种由计划生育带来的嫁娶上的困难更将会被放大。

（二）乡风文明治理下婚俗红线

一般观点认为，乡风文明建设背景下对“恶俗”的整顿对婚俗实践造成重大影响。现阶段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随之而来的是诸如天价彩礼、铺张浪费、低俗闹婚等婚俗陋习呈现抬头趋势，广大农民既是婚庆礼仪的实施者，也是婚俗陋习的受害者。不良婚俗不仅影响农村当地文明乡风建设，侵害脱贫攻坚成果，更阻碍了农村基层治理发挥效能，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发展(高子元,2022)。国家为此也针对性地制定和开展了一系列专项治理工作。如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推进移风易俗，推广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做法，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2023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继续明确提出，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但就河村的实践来看，这些政策似乎并未对婚俗产生实质影响。改革之令落到基层时，大都转化为了某种倡导和呼吁。第一，自上而下的所有政策文件都未对“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内容给出一个确切的标准，因此地方也无法形成相应的监督和惩治机制。第二，高昂的监督成本也使得相关部门难以真正做到全程介入，因而对“恶俗”的治理更多是划定活动的“红线”，如不能涉黄、涉黑等，并通过“村级监督”、“群众举报”等自下而上的方式施行。第三，河村事实上也极少出现如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动辄花费数十万的豪华婚宴(张文军,2021)。恰恰相反，大多数河村人对婚宴总是精打细算的，他们在保证传统“八大碗”及其质量的最低标准下尽量节省开支。第四，婚闹等活动是一种私人领域的实践，参与者多为关系亲密之人，有着明显的内外之别，十分抵制行政力量直接干涉。而村庄道德力量仍或多或少地规范与引导着村庄的婚俗实践。在笔者2023年2月参加的一场当地婚礼中，每当新郎的朋友们“密谋”要如何“玩”这对新婚夫妇时，老一辈人总会给出善意的劝告，并在接亲的过程中“监督”，及时制止其出格行为。

（三）特殊时期政策影响的永续遗存

相比于文明化视域下的婚俗文明化政策，“新冠疫情”时期特殊的社会控制与动员政策对婚俗变迁造成的影响则更为直观。2021年起，为了减少疫情的传播与扩散，当地政府部门不仅采取了包括但不限于封村、封路等硬性措施限制人员流动，还明令要求“喜事不办，丧事简办”，并建立了严格的督查和惩罚措施保证其执行效果。按照河村人的说法，清明之后结婚是不吉利的，所以结婚时间主要分布在农历的冬月、腊月与正月，但这又恰好撞上了疫情的高发期。虽然直到2022年末，河村都未曾出现一例新冠核酸检测为阳性的感染者，但在当时的紧张氛围和村干部的总体性动员下，“婚宴能不办就不办”、“被举报就拘留、坐牢”、“不听打招呼，害人害己”等声音在河村流传开来。河村的公共舆论形成了软性约束，办婚宴不仅成了违法行为，还被认为是非常不道德的。

软硬兼施之下，河村婚俗被迫调整。尽管河村婚俗中的各个事项均已落定，但婚礼只能后延至疫情缓解与政策放松后再行补办，婚俗的周期也被迫拉长。其间，“结婚（指办婚礼）—领证—生育”的传统顺序再次颠倒了，“领证—生育—结婚”成为了河村的主流。正如张策的母亲说到，“我们也想早点抱孙子，领完证就让他们住一起了。再说他们都是法律上的合法夫妻，办不办婚礼也不怕的。”（访谈编号：2021-张策）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这种“先育后婚”的行为与前文所述的“生米煮成熟饭”有着极为不同的性质，后者是将生育和领证作为一种对抗和挣脱家族控制的手段，而如今这种行为则是在双方家族迫于政策压力而同意和支持的情况下发生的。但另一方面，前后两种“育先后婚”都是围绕着生育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作为达成婚姻的核心指向，传宗接代观念在河村人的价值序列中更为靠前，韧性更强。因此，当传宗接代遭遇疫情管控政策的直接冲击时，人们会选择“牺牲”相对次要的“先婚不育”的习俗，“先育后婚”于是作为一种保全传宗接代的策略开始出现(张文军,2021)，婚俗的结构被重新调整。更为深刻的影响是，疫情期间“迫不得已”的对婚俗顺序的调整，

使得“先婚后育”同时取得了来自国家、村庄与家族等多个层面的合法性。如2023年2月末，全国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并逐渐稳定下来，此时几位已经订婚或领证但还未办婚宴的“准夫妻”认为，“按这几年的情况，只要男女双方相互喜欢，父母也同意，结婚领证就可以住一起。婚礼肯定要办，但也是主要还是看自己情况，也可以延后”（访谈编号：20230223-杨迪）。

五、技术困境：时空压缩与区隔下的调适

河村传统婚俗有着特定的时空约束性。首先，婚俗“六礼”的达成，需要男女双方家族的多次相互拜访，即有间隔地进行多次独立的跨越距离的面对面的社会互动。其次，男方在女方“看家”之后应时常到女方家中帮忙，但又必须当天返回，不能在女方家中留宿。成婚当天，男方需要在午饭之后前往女方家迎亲，并在下午“八大碗”的婚宴开始前赶回，当地称作“抢房”。成婚三日后，新婚夫妇还须要一同到女方家“回门”。“回门”要求“当天去当天回”，不能过夜。因此婚俗的达成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距离的克服，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技术条件，尤其是交通的可及性。根据河村人的口述史，20世纪八九十年代，河村乃至所属县市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以脚力、驴车、马车等作为主要交通工具。拖拉机、自行车在20世纪九十年代的河村仍十分罕见，直到21世纪初才逐渐增多和普及。交通方式的落后不仅阻碍了人口的空间流动及其相伴而来的社会互动，也限制了河村婚姻圈的扩展。在此技术环境中，当地的婚姻圈大都被限定在了县域范围内，并以村内与邻村婚配为主。

交通条件与通讯技术的改善推动了社会性的“时空压缩”与婚姻圈的扩张。21世纪初，河村所在市的高速公路才正式开通；2010年前后，随着村庄道路条件的改善，摩托车成为了外出打工者的刚需，数量也开始不断增加；近五六年，河村道路上停放的小汽车也与日俱增。笔者调研正值过年期间，在村庄公路上堵车已是家常便饭。直到2022年7月，河村所属的市区的高铁才正式开通。这意味着一种“时空压缩”的可能性，即一定地域范围内人际交往所需的时间和距离，随着交通与通讯技术的进步而缩短。“时空压缩”本质上体现了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其影响一方面是经济生产模式从自然经济到现代福特主义，再向灵活生产与积累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另一方面“时空压缩”也意味着一种快速流动的、个体化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的兴起(哈维,2003:159-406)。在河村，这两个过程是交织在一起的，外出务工在扩大个人生计空间的同时也带了社会交往空间的扩大化。时空压缩使得传统婚俗所内涵的时空约束性能够在更大的时空条件下得到满足，河村婚姻圈也不断扩张。

然而“时空压缩”是有限度的，婚姻圈的“过度扩大”有着冲击传统婚俗的可能。从提亲到回门的家族间的多次相互拜访、“抢婚”等习俗都有着极为紧张的时间要求，这在跨市、跨省等远距离婚配中则仍存在现实的困难。这种困难不仅是由于交通技术还不足以支持人员跨越长距离空间而实现快速转移，更在于使用这些所需交通花费的经济代价。在2022年高铁开通前，河村人的省内外流动都主要依托于汽车大巴。即使如今通过高铁，跨省的流动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根本无法满足传统婚俗的要求。虽然河村所处市域内20世纪三十年代就出于抗战需要建有机场，但由于高昂的价格，乘坐过飞机的河村人还是极少的。当然，对于少数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来说，家长仍会选择在子女成婚前通过飞机、高铁等交通方式与亲家进行多次会面。按河村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老板的说法，“从他两个（赵福连与其妻子）谈恋爱到结婚，我们去过湖南三次，他们结婚时来了一次。都是坐飞机，加上杂七杂八的费用，我们每次去差不多也要花万把块钱呢。这些钱都是我出的。你说一般家庭怎么受得了。”（访谈编号：2019-赵福连的父亲）。但就河村的整体情况可见，在远距离婚配的情境下，维持婚俗的整全仍是个非常“昂贵”的事业。

基于婚俗意义的流变、技术约束、经济成本等多重因素的考量，在河村众多远距离（主要为跨省市的）婚配中，双方父母或家族对子女婚配的直接干预越来越少，并逐步默许和支

持对婚俗的“变通”以达成婚姻的缔结。河村比较典型的做法是先由婚配的男女二人和家里通气，而后两人分别（或在媒人的陪同下）一起到双方家中拜访，了解双方的家庭情况，商讨结婚事宜，这事实上合并了提亲、起媒、看家三个环节。受限于交通成本，后续的“过礼”多以现金的方式完成。成婚当天，新娘在离家不远的酒店等待新郎上门迎亲，这无疑能够保证“抢房”的时限要求。至于最后的“回门”，则多是延期或取消，极少能够按旧俗，即在成婚三日后陪同女方回到娘家并当日返回的。

六、小结与讨论

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巨大体制变革与社会转型背景下，河村婚俗经历了一个不断耦合与重构的结构化的历史性整体变迁。20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与信息通达度以及人口流动性等较低，河村婚姻圈大都集中在市域内，且以同村或邻村婚配为主。河村人仍相对严格地遵循着传统婚俗的各项要求。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外出务工的增加，河村男女的婚恋自主性不断增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力量日渐式微，但基于惯习、合法性利益与家内伦理等方面的考量，河村人合并简化“起媒”与“过礼”环节而对婚俗进行了“松散耦合”。进入21世纪，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第一代新生儿接续到达适婚年龄，但由于独生子女和一家两女情况的存在，“两头在”的婚居模式逐渐在河村兴起，在调和与模糊“嫁娶”之别的同时也省略了河村婚俗“六礼”中的绝大多数环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河村外出务工人员更大区域范围的流动，河村婚姻圈不断扩大。但远距离的婚配方式也带来了实现传统婚俗内在时间性要求的困难，交通通讯技术改善带来的“时空压缩”有助于缓解这一问题，但却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权宜之下，绝大多数河村人只能将婚俗的所有程式压缩并交由子女或其它“中间人”权宜性地完成。

推而广之，非正式制度变迁的考察应当纳入建构、结构与条件因素的叠加结构化过程之中。首先，制度体现为跨越时空而延伸与反复组织起来的具有显著结构性特征的活动，也就是说制度内在和体现于行动之中。因此对非正式制度的分析必须以具体情景下的行动过程为基础，理解行动者在结构与意义的双重均衡下的主位意义变动及其引发的后续行动，这些行动的结果又是如何结构化地卷入制度实践中的。其次，区别于“地方性”的建构性因素，结构性因素体现一种系统性约束，它是非正式制度所内生与外生的制度环境，换言之，非正式制度不仅作为一种规则和资源不断卷入内生行动者的实践过程，也内生于更大一个或多个更大的“跨社会系统”环境中。最后，条件性因素主要是对技术环境和非预期后果的关注。一方面，行动的具身性和时空的不可脱离性决定了技术环境是行动的制度化延展的绝对约束性条件。另一方面，受限于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和风险的普遍性，行动或制度的非预期后果也是考察非正式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条件。在现实实践过程中，建构、结构与条件三因素正是以一种相互交织和反复叠加的复杂方式不断卷入非正式制度的结构化变迁过程中。

参考文献

- 阿诺尔德·范热内普，2010，《过渡礼仪》，张举文译，商务印书馆。
- 鲍宗豪，1992，《中国婚俗的文化意蕴》，《社会科学研究》第5期。
- 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2019，《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吴肃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 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2001，《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
- 曹晓昌，张盼盼，刘晓洁等，2020，《事件性消费的食物浪费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婚宴为例》，《地理科学进展》第9期。
- 崔珊珊，2022，《社会学制度主义视域下制度变迁的发生机理》，《理论月刊》第10期。
- 诺斯，2008，《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杜赞奇，2003，《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
- 段玉裁，1981，《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 费孝通，2003，《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费孝通, 2009,《费孝通全集(第1卷)》,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费孝通, 2009,《费孝通全集(第16卷)》,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费孝通, 2012,《江村经济》, 戴可景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顾涛, 2012,《论古典婚礼根植于人之情性》,《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 高子元, 2022,《乡风文明视角下韩城市X镇婚俗治理研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
- 哈维, 2003,《后现代的状况: 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 阎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贺雪峰, 2008,《农民价值观的类型及相互关系——对当前中国农村严重伦理危机的讨论》,《开放时代》第3期。
- 黄宗智, 2000,《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中华书局。
- 吉登斯, 2011,《现代性的后果》, 田禾译, 译林出版社。
- 吉登斯, 2016,《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纲要》, 李康, 李猛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蒋光明, 陈慧荣, 2022,《非正式制度与国家治理: 一项研究述评》,《实证社会科学》第1期。
- 康娜, 2013,《婚约彩礼习惯与制定法的冲突与协调——以山东省为例》,《民俗研究》第1期。
- 孔子, 2007,《论语》, 张燕婴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 李培林, 1992,《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 李学勤主编, 1999,《十三经注疏·仪礼注(上、下)》,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李银河, 2002,《婚礼的变迁》,《江苏社会科学》第5期。
- 理查德·斯科特, 2010,《制度与组织: 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 姚伟, 王黎芳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林耀华, 1989,《金翼: 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 庄孔韶, 林余成译, 北京: 三联书店出版社。
- 马塞尔·莫斯, 2016,《礼物》, 商务印书馆。
- 孟子, 1960,《孟子》, 杨伯峻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 诺贝特·埃利亚斯, 2013,《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 王佩莉, 袁志英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孙希旦, 1989,《礼记集解(全三册)》, 中华书局。
- 王冬梅, 李小云, 2010,《变化与稳定: 非正式制度中的性别呈现——以河北H村仪礼为例》,《妇女研究论丛》第1期。
- 王夫之, 2011,《船山全书(第四册): 礼记章句》, 岳麓书社。
- 王宁, 2002,《代表性还是典型性?——个案的属性与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社会学研究》第5期。
- 王思凝, 贾宇婧, 田耕, 2020,《“议彩礼”: 论农村彩礼形成机制中的道德嵌入性——基于甘肃L县的案例分析》,《社会》第1期。
- 王玉波, 1990,《中国婚礼的产生与演变》,《历史研究》第4期。
- 韦伯, 2019,《经济与社会(第一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53-156。
- 温莹莹, 2013,《非正式制度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T村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第1期。
- 吴飞, 2009,《浮生取义: 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徐勇, 邓大才主编, 2017,《满铁农村调查(第五卷)》,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阎云翔, 2006,《私人生活的变革: 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 龚晓夏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 杨善华, 孙飞宇, 2015,《“社会底蕴”: 田野经验与思考》,《社会》第1期。
- 杨志刚, 1994,《“礼下庶人”的历史考察》,《社会科学战线》第6期。
- 张静, 2018,《案例分析的目标: 从故事到知识》,《中国社会科学》第8期。
- 张乐天, 2005,《告别理想: 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张士闪, 2016,《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民俗研究》第6期。
- 张文军, 2021,《知变又知常: 观念是如何转型的?——基于浙东屿村婚育观念的考察》,《社会》第2期。
- 周飞舟, 吴柳财, 左雯敏, 2018,《从工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到人口城镇化: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社会学考察》,《社会发展研究》第1期。
- 周雪光, 2019,《论中国官僚体制中的非正式制度》,《清华社会科学》第1期。
- Alexander Jeffrey, 1986, *twenty lectures: sociological theory since world war II*,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4-85.
- Culpepper, 2005,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Coordinated Financial Systems since 1990”. *World Politics*, 57(2), 173-199.

- Helmke, Gretchen, and Steven Levitsky, 2004,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A Research Agenda".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 no. 4: 725 - 40.
- Karl Weick., 1976,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Loosely Coupled System".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
- Knight, 1992,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onflict.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uchman, Mark, 1995, "Managing Legitimacy: 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 no. 3: 571 - 610.
- Meyer, John, and Rowan, 1977,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 340-363.
- Meyer, John, and Richard Scott, 1983,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s: Ritual and Rationality*,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 Michael Hannan and John Freeman, 1977, "The Population Ecology of Organiz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82(5).
- Radnitz, Scott, 2011, *Review of Informal Politics and the State*. *Comparative Politics*43, no. 3: 351 - 71.
- Tang, 2011, *A general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New York: Routledge.
- Tsai, Kellee, 2006, "Adaptive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Endogenous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59, no. 1: 116 - 41.

社会分层视域下的中国老年教育

——基于 CLASS2018 数据的实证研究

赵家艺*

提要: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显著,第三年龄群体,即 60-75 岁处于退休期老人的养老情况备受关注。在众多养老方式之中,参与老年大学,即老年教育,是离退休老人的一种选择。本文基于“2018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8 数据,参考 2021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家数据,从老年大学的供给和参与情况入手,探究社会分层视域下我国老年教育的参与情况。研究发现我国老人参与老年大学的情况与其性别、生理健康状况、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及社会经济地位有关。处于中高社会阶层,即出身城镇、低龄、身体健康、经济条件宽裕、文化程度较高、思想观念开放的老人更有可能参与老年大学。基于此现状,推进老年大学分层教育成为促进我国老人高质量参与老年教育的一种可行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 老年教育 老年大学 社会分层 第三年龄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早在 1999 年便步入老龄化社会,随着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之中的比重不断扩张,第三年龄^①群体的养老模式备受关注。第三年龄群体的养老情况不但关乎老年人个人及其家庭的幸福,更深刻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可持续运行与发展。老年人若能在退休期保持良好的身心健康水平、提升个人获得感与幸福感、提高生活质量,便可能缩短其第四年龄期(即依赖期)的期限,减轻社会的养老负担。与此同时,第三年龄群体虽然已经离退休,但仍然蕴含着“庞大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曹杨、王记文,2016),是支持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一笔宝贵财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承担着第三年龄教育职能的老年大学就是终身学习中的重要一环,发挥老年群体的潜在资本离不开第三年龄教育。然而数据显示,2017-2021 年我国省市县各级老年大学的供给总数有逐年递减的趋势,^②调查中参与老年大学的被访者人数仅占 2.39%,^③我国老年大学的供给及参与情况远远不及预期。为探求影响我国老人参与老年教育的因素,本研究以我国老年人为研究对象,以“2018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8)”依据,试从社会分层的视角分析我国老人参与老年教育意愿低迷背后的原因,并尝试给出可行的改良路径。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一) 理论基础

“文化资本”是布尔迪厄在其论文《资本的形式》(1989)中首次提出并使用的,这是他对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进行非经济学解读之后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资本的类型》一书中,布尔迪厄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其中文化资本主要表现为行动者所掌握的信息、知识、以及被制度化的文化符号等形式。文化资本是一种继承来的语言和文化能力,它包括精美的语言表述,优雅的行为举止,适度的礼仪方式,高雅的文化品位以及一般

* 赵家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本科生。

① 第三年龄:退休期,通常指 60-75 岁的老年人。

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 National Data, 2021 年。

③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2018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 CLASS2018, 2018 年。

性的文化意识等。

文化资本有三种基本类型：一是内含于个人的文化资本，二是科学制置或艺术作品等物品，三是个人所持有的文化资本在制度上被人所认可。其形态具体可以被分为三种：具体化的文化资本、象征化的文化资本和体制化的文化资本，这三种具体形态在不同情景的加工下可以实现相互转换。来自不同文化出身背景的人继承了不同数量的文化资本，这种资本像经济资本一样，可以创造、培育和传递给下一代，会对个人的学校教育及社会化有着累积性的影响，并从而对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和上升社会流动机会产生影响。

（二）文献综述

关于国内老年教育的现有研究主要包含我国老年大学的现状、影响退休老人参与老年大学情况的因素研究，以及相较于国外第三年龄大学，我国老年大学的发展方向探究等几个方面。

随着终身教育理念的传播与推广，“学习型社会”不断发展，大学不再被视为教育体系的制高点，而是逐渐成为建设学习型社会中必不可少的一环。高校逐渐成为不同人群及终身学习者服务的重要平台之一。(李子华,2014)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人们逐步意识到老年群体蕴含的庞大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文化资本，如何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和动力成为重要课题。(曹杨、王记文,2016)老年大学即第三年龄大学就是其中一种可行的实践形式。

国外的老年大学大都具备比较完善的政策支持，其中部分老年大学由高等院校创办，具有较完善的课程体系，各机构鼓励老年人主动参与课程设置，通过知识传递、体育活动等多方面教育内容鼓励老年人以积极健康的心态迎接老化。(Nascimento & Giannouli,2019)而国内的老年大学相较之下起步较晚，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课程设置标准，但也在实践中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李宏洁、张艳、杜灿灿、赵敬、李思思、田雨同、刘珍，2022)

老年大学参与情况的影响因素探究是聚焦第三年龄教育的另一重要关注点，截至目前已有多种角度的丰富研究成果。如：贾云竹的《中国老年教育参与者性别失衡研究——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分析》(2009)、岳瑛等的《关于老年大学学员学习需求情况的调查报告》(2003)、王英等的《“非正规”老年教育与老年人社会参与》(2009)、吴盛雄等的《老年学员的学习动机，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以福建省为例》(2014)、应方淦的《美国老年教育：动力，现状与趋势》(2007)、曹杨等的《中国城市退休老人参与老年大学的影响因素研究》(2016)、王琦等的《活到老学到老：老年人参与学习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2021)、王正东等的《老年人参与社区教育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2016)等。

现有研究对于老年群体参与第三年龄教育的影响因素情况考察，主要从个体、家庭及社会三个层面展开。其中心理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退休前的单位性质、家庭事务、社会适应以及社会关系对城市退休老人参与老年大学具有显著影响。(曹杨、王记文,2016)曹杨等指出，老年群体内部存在两极分化现象，现阶段的国内老年大学仍集中于精英层次，富人、知识分子、强关系网络中以及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退休的老年群体更可能参与老年大学。王琦等同样得出类似的结论，并由此揭示出我国老年大学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现状。在王正东等的研究中显示，老年人群体的教育需求侧几乎没有差异，不随教育程度与经济地位而变化，但供给侧却存在地域、城乡、干群等资源分配差异，亟待改善。

然而因现有研究时间、地缘跨度较大，部分成果存在结论矛盾的情况。如上世纪外文文献指出家务占用时间越长的老人更不可能参与第三年龄教育，(Cross,1983)而曹杨等在2016年的国内研究中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有能力分担家务劳动的老人身体状况较好，因而更容易参与老年大学；曹杨等的研究中强调老年群体中知识分子对老年大学的需求更多，但王正东等的研究却得出文化程度对需求影响不大的结论。不仅如此，国内暂时缺乏有关老年人参与老年大学影响因素方面的实证研究，现有研究对于老年群体生物属性、经

济属性及社会属性的考察也不够全面。

当前的第三年龄大学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如教育供给难以满足学习需求、全面覆盖愿望与部分覆盖现状之间的矛盾、技术使用困境限制、理论研究与实践服务相脱节等。^①基于此欧阳忠明等在《全球视野下第三年龄大学发展研究》(2018)中提出整合国内外资源以完善教育供给、扩大群体覆盖以实现全面参与、推动建设虚拟老年大学以弥补实体机构缺陷、推动研究理论服务于实践的国内老年大学发展思路。马丽华等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高校助力老年大学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2022)中提出借助高校助力老年大学高质量发展的思路,意在借助高校现有基础完善老年大学学科体系建设,推进教育与科技融合,在政策保障下,营造可持续发展的终身学习环境。毛建茹等在《基于需求的老年教育载体分层设计与运行策略》(2017)中提出对接老人需求侧的办学策略,提倡根据老人的年龄段分层设置课程;卢玉娟针对我国老年教育优质资源紧缺、一座难求、老年大学内部分层且流动困难等问题,也在《老年教育分层教学体系的实现路径探究——兼论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学分的应用》(2020)一文中提出明确各个办学机构定位、课程设置分层与学分银行的改进思路。

整体观之,有关老年人参与第三年龄教育的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人口学和社会学视角,较好地描述了国内外老年大学的开展情况和实践形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对老年人参与老年大学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较少,且数据老旧、针对性不够强。不仅如此,现有关于老年大学参与情况影响因素的研究大都围绕个人、家庭及社会经济三个层面展开,多为微观角度的阐述,缺少宏观层面的分析。第三年龄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实践形式,可从社会分层与流动的视角加以描述,通过宏观视角分类讨论阶层对老年大学参与情况的影响,并对我国老年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具阶层特征的启示。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 数据来源

1. 2021 年国家数据

国家数据(National Data),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面向公众免费开放的,有关我国国计民生、各行各业情况的综合型数据库。数据库以月度、季度、年度为单位更新数据,为群众提供具有高度时效性、全方位、多维度的数据参考。

本文检索了国家数据中有关我国各单位老年大学数量的数据:单位类别维度上,包含省、区、直辖市(级)群众文化机构、地市级群众文化机构馆、地市级群众文化机构馆、县文化馆以及群众文化机构馆;时间维度上,囊括从 2017 年-2021 年的数量信息;总样本量 7480 个。

2. 2018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8)

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CLASS),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发布的,具有全国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通过定期、系统地收集中国老年人群社会、经济背景数据,掌握老年人在衰老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评估各项社会政策措施在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效果,为中国老龄问题的解决提供重要的理论和事实依据。^②

CLASS2018 采用分层多阶段的概率抽样方法。选定县级区域(包括县、县级市、区)作为初级抽样单位(PSU),村/居委会作为次级抽样单位(SSU),调查对象为年满 60 周岁的中国公民。2018 年的调查涵盖了全国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总样本量为 11419。该调查问卷设计严谨、覆盖范围广且回收率较高,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① 参见欧阳忠明,杨亚玉,葛晓彤:《全球视野下第三年龄大学发展研究》,《中国远程教育》2018 年第 6 期。

^② 参见“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官网项目介绍。

本文参见 2018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中 D 部分“过去一年中，您上老年大学或者参加培训课程的情况是？”这一问题，剔除缺失值（无法回答）后，对剩下的 9578 个有效样本进行研究分析。

（二）变量

1. 因变量

对于“是否参与老年大学”的测量参考 CLASS2018 中“过去一年中，您上老年大学或者参加培训课程的情况是？”这一问题。该问题设有：几乎每天、每周至少一次、每月至少一次、一年几次、没有参加五个选项。受样本量的限制，为提高测量结果的显著性，本文将五维的参与程度合并为两大类：参与-是（2.39%）、不参与-否（97.61%）。

对于受访者所属阶层的测量参考 CLASS2018 中“您在停止从事有收入的工作/活动之前是做什么的？”这一问题。该问题设有：国家、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公室一般工作人员，商业/服务业/制造业一般职工，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农、牧、渔民，其它七个选项。这七种职业顺序及分层与陆学艺提出的当代社会十大阶层^①基本一致，具有分层分析讨论的价值。

2. 自变量

（1）生物层面

生物层面的变量包含：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身体状况。性别为二分类变量，样本中男性略多于女性；年龄为连续变量，中位数为 70 岁，均值为 71.45 岁；婚姻状况分为已婚有配偶、丧偶、离婚、未婚四类，其中近七成为已婚有配偶，近三成为丧偶，离婚与未婚的占比极小；身体状况分为健康、一般、不健康三类，其中超过四成的受访者自我评估为健康，近四成认为自己身体一般，不健康占比不到两成。

（2）社会经济层面

社会经济层面的变量包含：户口类型、居住地类型、文化程度、政治面貌、每周工作情况、停止工作前的工作、个人年收入。户口类型为二分类变量，其中农业户口略多于非农业户口；居住地类型同样为二分类变量，其中城镇略多于农村；文化程度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四类，其中小学及以下占比将近七成，初中程度超过两成，高中/中专及以上占比不到一成；政治面貌分为中共党员、民主党派（含无党派人士）、群众三类，其中绝大部分受访者为群众；每周工作情况为二分类变量，无需每周工作的受访者人数远超过需要每周工作的受访者人数；停止工作前的工作变量分为国家、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公室一般工作人员，商业/服务业/制造业一般职工，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农、牧、渔民，其它七类，其中绝大部分受访者属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个人年收入为连续变量，剔除缺失值后中位数为 4000 元，均值为 9388.65 元。

3. 其它变量：我国各级单位老年大学数量

我国各级地方单位老年大学的开设数量以时间为沿革，涵盖 2017-2021 年的数据，五年来各级单位老年大学总数的平均值为 1496 个。

表 1 相关变量的统计描述

N=9578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	------

^① 参见陆学艺：《当代中国十大阶层分析》，《学习与实践》，2002 年第 3 期。

性别 (%)	男	50.24
	女	49.76
户口类型 (%)	农业户口	57.18
	非农业户口	42.82
居住地类型 (%)	城镇	57.68
	农村	42.32
年龄 (岁)	中位数	70
	均值	71.45
	标准差	7.37
文化程度 (%)	小学及以下	67.20
	初中	23.15
	高中/中专	7.56
	大专及以上学历	2.09
是否有配偶 (%)	无配偶	30.68
	有配偶	69.32
婚姻状况 (%)	已婚有配偶	69.32
	丧偶	29.05
	离婚	0.95
	未婚	0.67
政治面貌 (%)	共产党员	3.31
	民主党派	0.06
	群众	96.63
身体状况 (%)	健康	43.89
	一般	38.88
	不健康	17.23
是否每周工作 (%)	否	81.24
	是	18.76
个人年收入 (元)	中位数	4000.00
	均值	9388.65
	标准差	14947.19
停止工作前的工作 (%)	国家、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	5.28
	专业技术人员	2.28
	办公室一般工作人员	6.10
	商业/服务业/制造业一般职工	30.84
	个体户、自由职业者	5.00
	农、牧、渔民	48.39
	其它	2.09
是否上老年大学 (%)	否	97.61
	是	2.39

(三) 数据分析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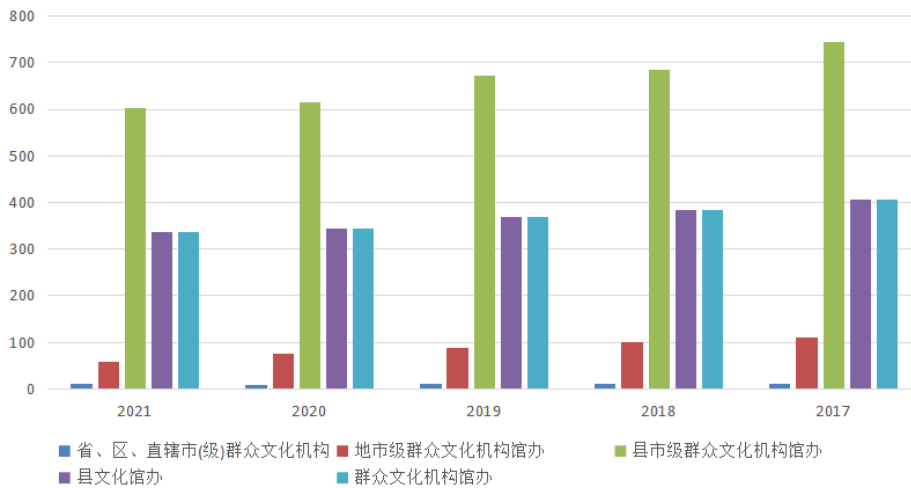
本文在实证分析部分主要采用描述性分析法、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以及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首先,对 2017-2021 年我国各级地方单位老年大学的开设数量及其变化情况做描述性分析,以考察我国老年大学的供给侧情况;其次,对因变量“是否上老年大学”随自变量变化的交叉列联表进行描述性分析;再次,将自变量分为生物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两类,并将两类因素纳入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以测量不同因素对老年大学参与情况的影响显著性水平;最后在此基础上,借助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影响受访者所属阶层的因素加以分析,并建立社会阶层层面的联系。

四、研究结果

(一) 我国老年大学的供给情况

如图 1 所示,自 2017-2021 年,我国各级地方单位老年大学的开设总数随时间有递减的趋势,可见我国老年大学供给不足的现状。我国省市级第三年龄教育办学单位较少,老年大学办学机构主要集中于县及群众一级,可见我国老年大学供给不平衡的现状。

图 1 2017-2021 年我国各级单位老年大学数量柱状图



国家数据库对于我国老年大学数量的公布具有一定的时间、地域及结构层面的局限性,因此并不完全(如缺失乡镇一级的数据等),只能作为推断数量逐年变化趋势的依据。

根据中国发展网的报道,“来自中国老年大学协会的消息显示,全国各级各类老年大学(学校)已达 7.6 万所,参加学习的学员 2000 多万人,已经形成省、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五级办学网络体系和 15 大门类、61 个专业、298 门课程较为完整的老年教育立体课程体系。”^①可见,我国老年大学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着实的成效与光明的发展前景。

(二) 我国老人参与老年大学的影响因素

1. 交互分析

性别层面,男性与女性的参与情况差异不大,其中男性参与老年大学的比重略多于女性。这可能是受访者群体中男性人数本身略多于女性,而带来的偏差。

户口及居住地层面,非农业户口及现居于城镇地区的老人可能参与老年大学。其一,因为非农业户口及居住于城镇的老人思想相较于农村老人更开放,更易于接受新鲜事物;

^① 参见中国发展网,《全国老年大学(学校)已达 7.6 万所》,2023 年 4 月。

其二，因为第三年龄教育资源分配的城乡差异，居住于城镇中可能有更多机会接触到成体系的老年教育机构。

身体健康层面，身体健康的老人相较于身体一般及不健康的老人，更可能参与老年大学。身体状况往往反应老人整体的精神状态，拥有充沛的精力是参与老年文娱活动的重要前提。同时，年龄与身体健康状况具有相关关系，第三年龄群体中的年轻老人往往身体状况更好，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随之衰老和退化，老人客观上及其自身认同的身体状况也可能随之变差。调查中，参与老年大学的老人平均年龄明显小于不参与者的平均年龄。

思想文化层面，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老人参与老年大学的可能性越大，高中/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老人参与程度明显高于其它文化程度。被访者均为 1958 年前生人，这一代人获取高中/中专及以上文凭，属于拥有极高的文化资本，他们的思想普遍更开放多元，更重视教育及知识的意义。同样体现思想先进程度的变量还有政治面貌，思想更为开放的中共党员群体明显比群众更可能参与老年大学。

婚姻状况层面，单从有无配偶来看，受无配偶原因的多元性，很难判断出其对因变量的影响情况。具体细分，离婚及未婚的群体更可能参与老年大学。这一代人思想总体较为传统，离婚与持续未婚属于打破传统习惯的“出格”行为，因此离婚与未婚群体的思想可能比其它婚姻状况中老人的思想更开放，也更有可能参与到老年大学这种“新事物”中去。

工作收入层面，无需每周工作的老人参与程度更高，这可能是因为该类老人的闲暇时间更充裕，因此更可能选择参与老年大学作为退休生活方式的一种。从停止工作前的工作变量看，受访老人之前的职业社会阶层^①越高，越有可能参与到老年大学之中，更高的职业社会阶层往往对应着更高的受教育水平与眼界，因此出于高社会阶层的老人思想更开阔，也更容易接受并参与老年大学。个人收入方面，参与者的年收入也明显高于不参与者。

综上所述，居住于城镇的低龄、健康且思想开放的中上社会阶层老年群体更可能参与老年大学。

表 2 相关变量的交互分析表

N=9578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是否上老年大学	
		否 (97.61%)	是 (2.39%)
性别 (%)	男	97.55	2.45
	女	97.67	2.33
户口类型 (%)	农业户口	98.29	1.71
	非农业户口	96.70	3.30
居住地类型 (%)	城镇	97.01	2.99
	农村	98.41	1.59
年龄 (岁)	均值	71.29	68.54
文化程度 (%)	小学及以下	98.09	1.91
	初中	97.45	2.55
	高中/中专	94.84	5.16

^① 参见陆学艺：《当代中国十大阶层分析》，《学习与实践》，2002年第3期。

	大专及以上	93.58	6.42
是否有配偶 (%)	无配偶	98.22	1.78
	有配偶	97.34	2.66
婚姻状况 (%)	已婚有配偶	97.34	2.66
	丧偶	98.38	1.62
	离婚	95.65	4.35
	未婚	95.00	5.00
政治面貌 (%)	共产党员	94.21	5.79
	民主党派	100.00	0.00
	群众	97.72	2.28
身体状况 (%)	健康	97.56	2.44
	一般	97.60	2.40
	不健康	97.82	2.18
是否每周工作 (%)	否	97.90	2.10
	是	96.49	3.51
个人年收入 (元)	均值	8394.84	9978.41
停止工作前的工作 (%)	国家、企事业单位领导人	97.16	2.84
	专业技术人员	93.67	6.33
	办公室一般工作人员	95.96	4.04
	商业/服务业/制造业一般职工	96.94	3.06
	个体户、自由职业者	96.42	3.58
	农、牧、渔民	99.53	0.47
	其它	98.31	1.69

2. 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

交互分析部分的自变量较为分散,分类不具有体系化,且无法精确判断各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程度的显著性。本部分以我国老年人是否参与老年大学为因变量,将自变量分为生物层面与社会经济层面两个维度,借助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统计方法,通过不同分类的模型,测量我国老人参与老年大学状况的影响因素。其中,模型 1 仅考虑生物层面,模型 2 在考虑生物层面的基础上,将社会经济层面纳入其中(详见表 3)。

模型 1 仅考虑生物层面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在控制其它生物层面变量的条件下,年龄变量对我国老年人参与老年大学的情况具有很显著的影响,而性别、婚姻状况和身体状况对因变量的影响不够显著。高龄老人参与老年大学的发生比比低龄老人群体低 6%,可见低龄老人参与老年大学的可能性更大。

模型 2 在考虑生物层面的同时,加入社会经济层面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年龄变量的影响依然存在,但是其显著性水平有所削减,在本模型条件下,高龄老人参与老年大学的发生比相较于低龄老人群体低 4%。在控制其它生物层面变量和社会经济层面变量的条件下,生物层面上,性别、婚姻状况、身体状况的显著性开始体现;社会经济层面上,户口类型、

居住地类型、文化程度及政治面貌对老年大学参与情况具有显著影响，而收入及工作方面的变量影响不够显著。具体而言，女性参与老年大学的发生比是男性的 1.4 倍；已婚有配偶群体参与老年大学的发生比相较于其它婚姻状况群体低 83%，丧偶群体参与老年大学的发生比相较于未婚群体低 90%，与交互分析中离婚及未婚群体参与程度更高的结论相一致；身体状况一般的群体参与老年大学的发生比是其它群体的 2.4 倍；非农业户口参与老年大学的发生比是农业户口的 4 倍，居住于农村的老人参与老年大学的发生比相较于居住在城市的老人的低 64%，可见第三年龄教育受众显著的城乡差异；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老人参与老年大学的发生比相较于其它文化程度的老人低 62%，此外非党员参与老年大学的发生比较中共党员低 33%，可见思想文化先进及开放程度对第三年龄群体参与老年大学影响的显著性。

表 3 我国老人参与老年大学情况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表题置于表上）

注：*P < 0.1, **P < 0.05, ***P < 0.01。

N=9578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回归系数	标准误	优势比	回归系数	标准误	优势比
性别（以男性为参照）	0.0145	0.1371	1.0146	0.3255*	0.1973	1.3847
年龄	-0.0573***	0.0118	0.9444	-0.0336**	0.0161	0.9670
婚姻状况						
已婚有配偶	-0.6628	0.6008	0.5154	-1.7865**	0.7051	0.1675
丧偶	-0.9293	0.6205	0.3948	-2.3207***	0.7451	0.0982
离婚	-0.3130	0.7860	0.7312	-1.5089	0.9232	0.2211
未婚	0		1	0		1
身体状况						
健康	-0.0738	0.1991	0.9289	0.1981	0.3754	1.2190
一般	0.0206	0.2000	1.0208	0.8866**	0.3647	2.4268
不健康	0		1	0		1
户口类型（以农业户口为参照）				1.3785***	0.4296	3.9690
居住地类型（以城镇为参照）				-1.0160*	0.5661	0.3621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0.9572**	0.4166	0.3840
初中				-0.4697	0.3850	0.6252
高中/中专				0.0795	0.3912	1.0828
大专及以上				0		1
政治面貌				-0.4076**	0.1690	0.6652
每周工作情况（以无需每周工作为参照）				0		1
停止工作前的工作				-0.0703	0.0811	0.9321
个人年收入				3.58E-06	4.69E-06	1.0000
样本量	9578			9578		
pseudo R ²	0.0184			0.1293		

(三) 社会经济因素与社会阶层

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 2 中的社会经济因素对受访者所属的社会阶层存在潜在相关关系, 本部分以受访者停止工作前的工作为因变量, 户口类型、居住地类型、文化程度、政治面貌、个人年收入为自变量, 借助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 建立各社会经济因素与社会阶层之间的联系。

表 4 影响社会阶层的社会经济因素回归分析

N=9578

变量	(以“农、牧、渔民”为参照)	国家、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办公室一般工作人员	商业/服务业/制造业一般职工	个体户、自由职业者	其它
户口类型	回归系数	2.9372***	2.7983**	2.9514***	2.7695***	1.4371***	0.5763**
	标准误	0.1794	0.2874	0.1819	0.0890	0.1524	0.1790
	相对风险比	18.8626	16.4169	19.1332	15.9509	4.2084	1.7795
居住地类型	回归系数	-0.5866***	-	-	-1.8097***	-0.8840***	-
	标准误	0.1839	0.3908	0.2220	0.1191	0.1700	0.2726
	相对风险比	0.5562	0.1938	0.2479	0.1637	0.4131	0.1182
文化程度	回归系数	0.7530***	0.9192**	0.7698***	0.5046***	0.2240***	0.4233**
	标准误	0.0518	0.0770	0.0503	0.0314	0.0527	0.0709
	相对风险比	2.1235	2.5073	2.1594	1.6563	1.2510	1.5269
政治面貌	回归系数	-1.0758***	-	-	-2.4385**	-0.3335*	0.0389
	标准误	0.1230	0.6925***	0.7877***	0.1207	0.1896	0.3084
	相对风险比	0.3410	0.5003	0.4549	0.7836	0.7164	1.0397
个人年收入	回归系数	5.10e-08	5.00e-10	-1.21e-07	-1.05e-07	-	-
	标准误	1.73e-07	3.32e-07	3.36e-07	1.39e-07	0.000022***	6.75e-06
	相对风险比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注: ①pseudo R²= 0.2520 ②*P < 0.1, **P < 0.05, ***P < 0.01。

结果显示, 在控制其它社会经济因素的条件下, 受访者的户口类型、居住地类型、文化程度及政治面貌对其所属阶层具有显著性影响, 其中政治面貌的显著性随阶层的降低而有减弱的趋势。个人年收入的显著性仅在个体户与自由职业者一项中显现出来, 可能是样本量较小、个体差异被放大的结果。

根据陆学艺提出的当代社会十大阶层理论, 因变量职业依次对应: 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5.办事人员阶层、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及 8.产业工人阶层、6.个体工商户阶层、9.农业劳动者阶层。(每个阶层前的数字为所属阶层的序次)^①

具体来看, 城乡层面, 与农业劳动者阶层相比, 更高阶层受访者为非农业户口的可能性大很多, 分别是农业劳动者阶层的 18.9 倍、16.4 倍、19.1 倍、16.0 倍、4.2 倍; 更高阶层受

① 参见陆学艺:《当代中国十大阶层分析》,《学习与实践》,2002年第3期。

访者居住于农村的可能性也更小,分别比农业劳动者阶层低 44.4%、80.6%、75.2%、83.6%、58.7%。可见所处社会阶层具有较大的城乡差异。

受教育程度与思想先进程度层面,与农业劳动者阶层相比,高社会阶层受过的更高层次教育的可能性更大,分别是农业劳动者阶层的 2.1 倍、2.5 倍、2.2 倍、1.7 倍、1.3 倍;高社会阶层为群众的可能性比农业劳动者阶层低 65.9%、50.0%、54.5%、21.6%、28.4%。由此可见总体而言,文化程度,即受访者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情况与所处社会阶层具有正相关关系。受过高层次教育(包括文化教育与政治觉悟教育)者通过教育获得文化资本,并将部分文化资本转为经济资本与社会基本,进而更可能获得较高的社会阶层地位。

结合关于我国老人参与老年大学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第三年龄群体是否参与老年大学与其受教育水平与思想开放程度,即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同样具有显著相关性。因此,是否参与老年大学的选择与老人所处社会阶层有关,我国老年教育偏向非农业户口、居住于城镇且拥有文化资本的“精英老人”。一方面,“精英老人”可能对老年大学教育环境更为青睐;另一方面,从供给端入手,或许现阶段我国老年教育的供给更偏向“精英老人”,而不是比例更大的普通老人。

五、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在供给侧层面,我国老年大学建设总体态势良好,但仍存在着供给不足、城乡及地域供给不平衡、供需不匹配等问题。在需求侧层面,第三年龄群体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身体状况、户口类型、居住地类型、文化程度以及政治面貌对其参与老年大学的情况具有显著影响。受访者的收入及工作状况虽然也对因变量有一定的影响,但综合考虑并不显著。进一步讲,老年大学的主要参与群体为居住于城镇地区的、低龄、身体状况较好、受过良好教育的、思想先进开放的老人,且参与者中女性偏多,这也与现有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

老年大学是终身学习的一个环节,是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必不可少的机构之一。究其性质而言,老年大学理应是面向大众、造福大众的普惠性教育机构,老年大学的资源分配不能仅局限于城镇知识分子、进而发展出精英主义的苗头。

面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现状,第三年龄群体对于养老的需求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在老年教育方面具体表现为:文化程度低的老人更倾向于动态课程,如民族舞、武术等;文化程度高的老人更倾向于静态课程,如书法、国画等;低龄老人更侧重如何拓展和发展自己的兴趣,而高龄老人更需要心灵上的关怀。面对这种需求侧的分层,我们可以借鉴国内外优秀经验,将老年教育相应分层。难度层级上分为“高、中、低”三种,以便不同文化基础的老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更适合自己的课程,规避文化资本的门槛;年龄层级上可以分“低龄、中龄、高龄”三类,为有运动需求的老人提供更合理的指导,打破门槛,兼顾需求侧的差异,让各阶层的老年群体通过老年教育流动起来。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数据不够新、参照题目过少、样本量有限、变量之间因果关系推断问题等。面对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以及后疫情时代的诸多影响,老年学习模式已不局限于线下老年大学一种,老年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些新模式是否具有阶层差异,有待更新的数据及研究加以探讨。此外,本文采用截面数据,缺少纵向的追踪追溯及比较研究,有待更多历时性数据的检验与支撑,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参考文献:

- 曹杨,王记文.中国城市退休老人参与老年大学的影响因素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6,22(05):98-104.
- 贾云竹.中国老年教育参与者性别失衡研究——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分析[D].中国人民大学,2009.
- 李宏洁,张艳,杜灿灿等.积极老龄化理论的国内外研究进展[J].中国老年学杂志,2022,42(05):1222-1226.
- 李琦,王颖.活到老学到老:老年人参与学习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33):89-96.
- 李子华.现代大学功能的选择与定位[J].高等教育研究,2014,35(11):7-11.

-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分析[J].学习与实践,2002(03):55-63+1.
- 卢玉娟.老年教育分层教学体系的实现路径探究——兼论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学分的应用[J].成人教育,2020,40(12):52-55.
- 马丽华,蒋亦璐,王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高校助力老年大学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J].教育发展研究,2022,42(Z1):31-38.
- 毛建茹,胡丽亚.基于需求的老年教育载体分层设计与运行策略[J].成人教育,2017,37(07):36-40.
- 欧阳忠明,杨亚玉,葛晓彤.全球视野下第三年龄大学发展研究[J].中国远程教育,2018(06):40-49.
- 王建生.全国老年大学(学校)已达7.6万所[N].中国发展网,2023.4.26.
- 王正东,琚向红.老年人参与社区教育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中国远程教育,2016(05):50-56.
- Cross, K. P. 1983, "Adults as learners: increasing participation and facilitating learning".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54(5)
- Nascimento M, Giannouli E, 2019, "Active aging through the university of the third age: the Brazilian model J1" *EduGerontol*, 45/1

社会公平感与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

——基于 CSS2021 数据的实证分析

吴翠珍*

提要：本研究以 CSS2021 数据为基础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析，本研究发现人际信任与社会公平感都能正向预测政府信任，人际信任亦能正向预测社会公平感；并且经过逐步回归分析检验，发现社会公平感在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中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这说明人际信任除了能够直接对政府信任产生影响外，社会公平感也是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影响路径中的重要环节，这提醒我们，社会公平感的提升是构建社会主义信任机制的重要一环，增强居民的社会公平感对于信任机制的重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社会公平感 人际信任 政府信任

一、前言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越来越陌生，要想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更加顺利和紧密必须使人与人之间更加信任，所以维系人类在沟通过程的纽带——信任已成为当务之急。特别是我国的社会发展日趋复杂，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日益提高，许多学者对信任的研究也扩展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转型的日益深化，我国居民的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居民的信任机制也进行了改变，政府信任作为对政府职能与绩效的重要衡量标准，其产生与影响机制的研究也日益增多。而目前社会的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机会不平等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的现象反映，这些反映同时也是人们社会公平感相对较低的体现。而我国对“共同富裕”的追求也需要正确认识到社会的公平问题。当前，我国社会公平问题依然很明显，居民对社会公平的关注度日益上升，社会公平对我国的社会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选题意义

我国是一个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与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形成了我国独特的公平观，使马克思主义社会公平理论从理论走向实践。在我国，第一个代领导人毛泽东就提出了提出的“共同富裕”的概念，后来，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的实际行动方法，而不是同时同步平均富裕，并指出共同富裕的实质应该是使人民普遍共同富裕，而且贫富差距不大。他的理论更贴近中国的情况，从一定程度上兼顾了公平和社会的发展效率。习近平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公平和就业公平，要求完善包括机会公平社会公平保障制度，包括深化考试招生体制改革，保持和加强全国统一高考在人才选拔培养中的中心作用，整顿和规范特殊招生形式；机关和国有企业的公开招聘工应做到信息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创造真正平等的就业环境，使就业的隐形门槛现象得到治理。

从上述可知，我国社会公平问题具有相对良好的理论和基础，在过去已有许多学者对信

*吴翠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社会工作硕士生。

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性别、户籍、经济收入、教育程度、职业类别、社会阶层、以及经济不平等对居民一般信任的影响,但很少有研究涉及社会公平感这一主观因素对信任水平的影响。而本研究则主要解答以下几个问题,居民的人际信任和社会公平感对政府信任是否会产生影响?社会公平感对人际信任和政府信任的关系是否存在中介效应进而产生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 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通常指公民对政府或政治制度的运作将产生的结果与他们所期望的结果是一致的的信念或信心(胡荣,2007)。也有学者从被信任的对象出发对政府信任概念进行阐述,指出政府信任中的政府应是广义的政府,司法系统、官方和半官方媒体等组织也是政府信任的对象(史红民,2004)。

维持政治制度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不断输入信任(卢曼,2005)。中国古语中对政府与民众关系比喻为水与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强调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直接关系到政府政权的稳固,甚至关系到政府的未来前途命运。政府信任的高低可以看作是政府运转的晴雨表和对政府绩效进行评估的软指标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有可能会使民主制度和政府治理受到破坏。政府的不信任还可能会导致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如税务抗议、激烈的投诉、第三部门的异常发展(张成福,2003)。

近年来关于政府信任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其现状的测量与描述、影响因素以及其提升方式上。其中,学者发现我国居民的政府信任呈现出“央强地弱”的特点,即我国民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要显著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赵建国,2017),针对这个现象我国学界提出了较具有中国特色的“差序政府信任”概念,诸多学者对此展开实证研究,并且证实了这个问题。此外,还有学者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不同政治行为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了政治参与,村社认同等重要变量(郑建君,2013;郑建君,2021),总的来说,目前对于政府信任的研究多集中于从社会资本视角和政府绩效的角度来进行探索。

(二) 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

在传统社会,即我们常说的“乡土社会”中,人际信任是最主要的信任形式,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乡土社会”也逐渐向“法理社会”转型,信任的主要形式也发生了改变。国内有学者认为人际信任是“先天”人情和“后天”交往的产物(陶芝兰,2006);认为从心理的层面进行分析,认为人际信任是一种对他人行为的预期和判断,是一种托付、期待或认可(张建新,2000),学者们还发现人际信任的表现不仅仅只个人的心理现象,而且还是对社会中其他个体的可信度的关系认知。彭泗清发现中国人建立信任的机制在不同情境下是不同的,在日常情境中会体现出工具性与情感性色彩的相互交织,但涉及到经济利益时,法律关系就会更占上风(彭泗清,1999)。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人际信任的内部机制是期望匹配,即人们的信任期望与其在现实情境的感受的匹配情况决定了其人际信任的趋向(韩振华,2010)。总体来说,对于信任的研究都探讨了个人和人与人的关系因素,然而西方对信任的研究更多的强调被信任者的特性,而对本土的信任研究更多的强调信任者与被信任者之间的关系(彭寅,2015)。总的来说,国内外学者对人际信任的含义有以下三个共同点:第一,信任包含许多复杂的潜在变量,是一个多维结构;第二,人际信任是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产生的;第三,人际信任的高低受到人际关系的直接影响。

目前,学界对人际信任的讨论一般认为人际信任可分为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熟人之间的信任”和“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在此,本研究明确本文中的人际信任只讨论一般信任。这主要是因为,随着“乡土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人们的社会交往和活动的的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地缘所带来的影响日益减少,从前的“熟人

社会”也迅速向“陌生人社会”转变，而最早由韦伯提出的“特殊信任”所产生的影响日益减少，普通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变得重要起来。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化，原来仅指人际信任的“信任”概念扩充。吉登斯将信任分成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吉登斯,2000)。系统信任与人际信任最大差别在于，系统信任的对象只与外部的制度有效运行有关，与个人特征和性质是无关的。

政府信任作为系统信任中的重要部分，从 20 世纪中期开始逐渐开始受到重视，到 21 世纪西方学术界对政府信任的研究已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居民政府信任度的提高获悉也将成为政府的治理成果检验的重要维度。基于这一经验，政府信任研究成为了政治学重点关注和研究的课题，也成为了政府改革处方制订的依据。

对于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密切关系，有不少学者都进行了研究，其中大多数学者以社会资本视角切入对人际信任对政治信任的影响进行探讨，认为社会资本可以解释为一种以信任为内核、同时包含公民参与的网络和互惠互利的规范的资源集合(胡荣,2007)，将人际信任视为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作为解释居民政府信任的重要变量。卢曼等学者也指出，人际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主要元素之一，也是公众的政府信任的重要基石。

学者们还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了政府信任对人际信任的影响，认为值得信任的政府所制定和实施的政策同时也是形成人际信任的重要基础(张海良,2015)。罗斯坦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居民对社会环境的心仁厚，政府信任和人际信任之间仍然存在着因果关系，居民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会显著地影响到其人际信任(罗斯坦,2012)。

笔者在以往学者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本研究的假设 1：人际信任能够正向预测政府信任。

(三) 社会公平感与政府信任的关系

社会公平感是人们在判断社会公平事件时产生的主观感受和判断，这种认知的形成是基于个体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判断以及对公平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主观感受，如果现实与理想状态越接近，那么其社会公平感就越高。由于社会公平感的客体是社会公平，或者说是社会或社会现象，其内容和程度必然受到社会环境、民族、阶级等客观的物质资源和宏观社会文化的影响，但社会公平感还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感受，不可避免地受到个人的认知能力、态度、情绪、价值观等主观要素的影响(陶梦馨,2014;熊青,2014)，因而存在个体间的差异。

目前，国内有许多学者对社会公平感进行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社会公平感如何进行测量以及对其影响因素的探讨上，综合多位学者的研究发现，我国居民的公平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居民受教育程度、主观社会阶层、家庭经济状况、年龄、户籍以及所在地区等都与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有关(张茂鑫,2017)。

也有学者将公平感分成了不同的维度或领域进行了探讨，其中，刘亚最早编制了组织公平感的问卷(刘亚,2003)，是国内较早的对公平感进行测量的研究。薛洁则将对公平感的调查范围进一步扩大，将不公平的社会现象、贫富差距、住房和房价、户籍制度、医疗、司法信任、税收意愿等因素囊括进来(薛洁,2007)。也有学者以大学生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机会公平、程序公平、分配公平、互动公平、权利公平和弱势公平六个维度对社会公平感进行研究(蒋庆刚, 2013)。经过学者们的长期研究和发展，目前测量社会公平感的量表已经较为成熟。

1. 人际信任与社会公平感的关系

基于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的紧密关系，有学者继续进行了探究并发现人际信任与社会公平之间存在直接的关系，其中经济不平等的程度对人际信任的影响最大，也就是说，社会资源的分配的不平衡，会对人们的对未来的期望产生影响，不相信自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从而导致普遍信任度下(尤斯拉纳,2006)。社会公平感相对较低的人们普遍会选择相信自己的非正式群体内的成员，对群体外人员采取敌对甚至仇视的态度，也就出现了我们常说的社会中

的“仇富”、“仇官”现象，这也是社会信任度明显降低的标志。

国内有学者研究了各类别的社会公平与一般信任在控制了主观阶级感知、预期寿命和生活变化等变量后的关系(朱博文,2016)。有学者在探讨城乡低保推出不畅这一实践难题时发现人际不信任会导致居民的公平感缺失，从而加剧低保推出的难度(张奇林,2016)。也有学者从社会资本的视角进行切入，发现社会信任中对陌生人的信任，即本研究中的人际信任，对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有积极的影响(徐延辉,2018)。基于以上研究，为了更好地探讨社会公平感与人际信任的关系，提出假设 2：人际信任能够正向预测社会公平感。

2. 社会公平感与政府信任的关系

亨廷顿在其著作中提出了“平等假设”，认为社会公平感能够通过提高人们的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从而达到提高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的目的(塞缪尔·亨廷顿,2008)。国内学者从政治学的视角提出公平感是对公民政治态度的反映(薛洁,2007)；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公平感较高的个体，社会冲突感较低，政治效能感较高，更愿意相信政府，即政府信任感更高(张茂鑫,2017)。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对政府的言行感到不公平是公民不信任政府的重要原因。但亦有研究表明，当个体受到不公平待遇时，会对不公平的施加者产生不信任，而在大多数时候政府会成为主要的归因对象(于洪波, 2019)。也有学者从代际差异的视角研究了社会公平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发现无论是青年还是中年群体，社会公平感都能对政府信任发挥显著的影响作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社会公平感变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和稳定性(邹宇春,2021)。

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为了更好地探讨政府信任与社会公平感之间的关系，提出本研究的假设 3：社会公平感能够正向预测政府信任。

3. 社会公平感对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关系的影响

有学者研究了互联网使用，社会公平感与政府评价三者间的关系，发现互联网使用对政府评价的影响有限，社会公平感则是影响政府评价的关键变量(田丰,2016)。而互联网不仅是新型的传播途径还是新型的大型人际交往社区，网络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构建了信任关系，进而认为互联网使用内涵了一定的人际信任元素，政府评价中一定程度也体现了居民对政府的信任。以此研究为基础，笔者提出新的问题，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是否会受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而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看，人际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是人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资源，类比物质资源分配的多少会影响居民的公平感知从而影响居民对政府的信任这一机制；本研究提出人际信任这一社会资源的高低会影响居民的公平感从而影响居民的政府信任。提出本研究的假设 4：社会公平感在人际信任与政治信任两者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目的

本研究在前人研究以及 CSS2021 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实证方法探讨居民的社会公平感与人际信任、政治信任的关系。

(二) 研究假设

假设 1：人际信任能够正向预测政府信任。

假设 2：人际信任能够正向预测社会公平感。

假设 3：社会公平感能够正向预测政府信任。

假设 4：社会公平感在人际信任与政治信任两者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三) 研究内容及数据采用

1. 人际信任

对人际信任的测量 CSS2021 采用了“请用 1-10 分,来表达您对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水平的评价,1 分表示非常不信任,10 分表示非常信任”的问题对人际信任进行了泛性的测量。

2. 社会公平感

社会公平感的测量通过 8 个问题测量了居民在高考制度,公民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司法与执法,公共医疗,工作与就业机会,财富及收入分配,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城乡之间的权利、待遇方面所感受到的公平程度,经过数据分析后,得出社会公平感的总体水平。

3. 政府信任

获得数据后使用 SPSS24 进行统计分析,主要通过相关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法来探讨社会公平感与人际信任、政治信任的关系。

四、数据分析

(一) 相关性分析

为了对本研究的假设 1、假设 2 以及假设 3 进行检验,分别对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社会公平感与人际信任以及社会公平感与政府信任进行了皮尔逊相关性分析。

	人际信任	政府信任	社会公平感
人际信任		0.384***	0.388***
政府信任	0.384***		0.538***
社会公平感	0.388***	0.538***	

表 1 皮尔逊相关性分析

由上表可知,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人际信任与社会公平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政府信任与社会公平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研究的假设 1、假设 2 以及假设 3 成立。

(二) 多元回归分析

1. 社会公平感的多元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人际信任与社会公平感间的关系,且对本研究的假设 4 进行检验,对社会公平感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引入了年龄,性别(是否为男性),政治面貌(是否为中共党员/共青团员),最高受教育程度、民族(是否为汉族)以及户口类型(是否为农业户口)的性质为控制变量,探讨人际信任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及其关系。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差	标准化系数	t
(常量)	2.517***	0.036		69.315
性别(是否男性)	-0.016	0.011	-0.016	-1.443
年龄	-0.002***	0	-0.053	-4.744
政治面貌(是否党员/团员)	0.075***	0.014	0.058	5.174
最高受教育程度	-0.013***	0.003	-0.05	-4.353

民族（是否汉族）	-0.164***	0.021	-0.085	-7.982
户口类型（是否农业户口）	0.02	0.012	0.019	1.641
人际信任感	0.096***	0.003	0.382	35.655

备注：1.* $p<0.05$,** $p<0.01$,*** $p<0.001$ ；2.政治面貌：1=中共党员/共青团员，0=其他；3.性别：1=男性，0=女性；4.民族：1=汉族，0=其他；5.户口类型：1=农业户口，0=其他

表 2 社会公平感的多元回归分析

由上表可知，人际信任与社会公平感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且人际信任对社会公平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即人际信任能够正向预测社会公平感，其未标准化系数值为 0.096。

2. 政府信任的多元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以及社会公平感与人际信任的关系，且对本研究假设 4 进行检验，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其中包括年龄，性别（是否为男性），政治面貌（是否为中共党员/共青团员），最高受教育程度、民族（是否为汉族）以及户口类型（是否为农业户口）等人口学变量以及人际信任变量和社会公平感变量。模型 1 仅考察了人口学变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模型 2 加入了人际信任变量，模型 3 加入了社会公平感变量，对三个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VIF 值在 1.011-1.2 之间，多重共线性较轻。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性别（是否男性）	-0.022	-0.009	-0.001
年龄	0.002***	0.001*	0.002***
政治面貌 （是否党员/团员）	0.202***	0.154***	0.117***
最高受教育程度	0	-0.001	0.005
民族（是否汉族）	-0.118***	-0.116***	-0.034
户口类型（是否农业户口）	0.013	0.003	-0.005
人际信任感		0.106***	0.058***
社会公平感			0.493***
常数	3.244***	2.586***	1.346***
R 方	0.022	0.166	0.331
调整后 R 方	0.021	0.165	0.331
F	25.817***	198.788***	433.628***

备注：1.* $p<0.05$,** $p<0.01$,*** $p<0.001$ ；2.政治面貌：1=中共党员/预备党员，0=其他；3.性别：1=男性，0=女性；4.民族：1=汉族，0=其他；5.户口类型：1=农业户口，0=其他

表 3 政府信任的多元回归分析（B 值）

由模型 1 可知，人口学变量能够解释政府信任变量的 2.1%，说明人口学变量对政府信任变量的解释力较低，其中年龄、政治面貌和民族三个变量对政府信任有显著的影响。

由模型 2 可知，人际信任变量的加入增加了模型 14.4%的解释力，其对政府信任存在显著影响，人际信任感越高的人，对政府的信任度越高。这里进一步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 1，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且人际信任能够正向预测政府信任。这个结果与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相同，说明居民的人际信任感越高，其政府信任感就越高。

由模型 3 可知，社会公平感变量的加入使模型的解释力上升到 33.1%，且社会公平感与

政府信任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研究的假设 3 进一步得到验证,且社会公平感能够显著地正向预测政府信任。而社会公平感变量加入后,人际信任变量在模型中仍具有显著性,根据 Baron 和 Kenny(1986)提出的中介效应逐步检验法,再结合表一所得结论,发现社会公平感在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根据逐步检验法程序,其中人际信任对政治信任的总效应系数 c 为 0.106;自变量人际信任对中介变量社会公平感的效应系数 a 为 0.096;控制了自变量人际信任后,中介变量社会公平感对因变量政府信任的效应系数 b 为 0.493;且以上效应均具有显著性;而控制了中介变量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后,自变量人际信任对因变量政府信任的直接效应系数 c' 仍具有显著性,其值为 0.058,即社会公平感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也就是说,人际信任既可以经过社会公平感对政府信任产生影响也能够直接对政府信任产生影响,本研究中的假设 4 得到验证。为了使研究结论更清晰,笔者绘制了人际信任、社会公平感和政府信任三者间的关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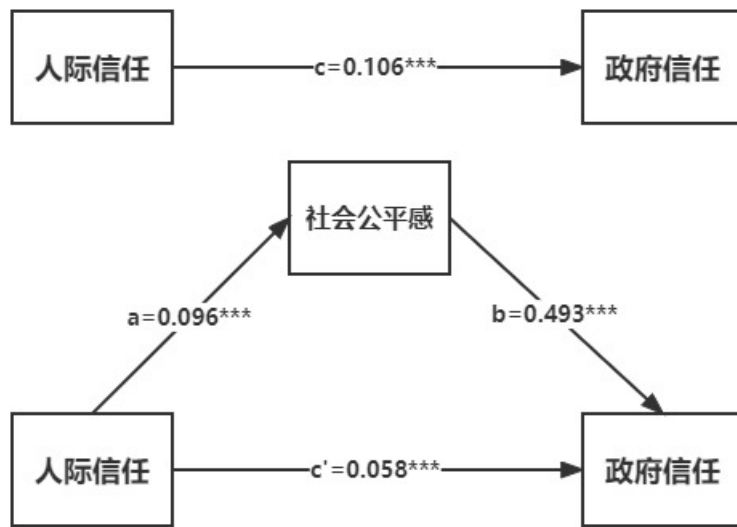


图 1 社会公平感与人际信任、政府信任关系图

表 2 和表 3 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社会公平感在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本研究的假设 4 得到验证,社会公平感与人际信任、政府信任的关系可以表达为图 1。

五、结论与讨论

在许多对政府信任的研究中,学者们均强调人际信任或社会公平感单个因素的作用,强调人际信任是政府信任的来源、是民主制度的基础,而社会公平感则是政府信任的重要影响因素,社会公平感的提高能使政府信任也获得提高,但对社会公平感、人际信任和政府信任三者的关系却尚未有明确的研究。本研究通过对 CSS2021 数据进行分析进一步清晰了三者间的关系机制,人际信任除了能够直接影响政府信任外,还能通过社会公平感影响政治信任,社会公平感在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基于本研究所获得的结论,笔者提出以下的建议。

(一) 以道德教育为抓手提高人际信任

人际信任的提高对政府信任的提高和巩固以及对社会的稳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传统的人际关系差序格局受到冲击与破坏,基于人际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联结变得松散,人际信

任感水平整体而言相对较低,且人际信任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力也逐渐下降。政府和社会组织应以道德教育为抓手,大力弘扬中华民族“重诚信,重诺守信”和“仁、义、礼、智、信”的优秀文化传统(俞国良,2017),更好地提高居民的人际信任感,与此同时还应该关注民生,注意社会氛围的营造。

(二) 维护社会公平是建设社会信任的必然

从本次的研究结果看,社会公平感对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这意味着,要建设和完善新的社会信任机制,公平的社会氛围与制度保障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更应该重视经济平等以及机会平等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作用,如今,社会阶层的不流动,“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说法更是越来越多,使居民对于自身的未来丧失信心,不相信自己能通过努力来使生活变得更好,同时对社会中的其他群体,特别是相对上层的群体信任降低,更有可能激发民众对政府机构的不满,严重的话甚至还会引发群体性事件,早前就有学者指出,相比于人际信任,社会公平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为直接,强度更大(张海良,2015)。

这要求我们要提高司法执法人员的工作素质,进一步保证政府组织履行职能的效率和公平性;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尽全力缩小各区域之间,特别是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的差异。而对社会上各种社会资源分配机制的不断健全则需要政府发挥其主导的作用,促进机会公平、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特别是针对教育、医疗、就业以及养老服务方面,进而增强政府信任度;同时也要通过提供并增强个体参政议政和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的机会,让居民感受到公平公正的社会发展参与氛围。

(三) 完善的法制体系是社会公平的保障和维持社会稳定的根基

法律体系越合理,政治环境越清朗,社会秩序就越稳定、道德风气也会越好,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也会越高,政治体系运行也会更趋于良性和高效。完善社会各方面法律的制订,完善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同时提高居民的守法意识,将规则意识、法制精神和教育有机地系统地结合起,在社区、学校、企业等组织内进行法律知识的宣传,与此同时,居民对社会公平感知也与政府的信息公开息息相关,将主流媒体和新兴媒体进行结合,为政府信息公开所利用,便于居民获取信息并进行社会监督。让公众对政府的工作和相关信息有一个及时、全面和客观的了解并能够进行监督,同时公众也将有更多的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诉求,社会公平获得了保障与提升,社会也更加稳定有序。

参考文献

- 埃里克·尤斯拉纳,2006. 信任的道德基础,张敦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韩振华,2010, 人际信任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研究,南开大学.
- 胡荣,胡康,温莹莹,2011, 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社会学研究.
- 胡荣,2007, 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社会学研究.
- 吉登斯,2000, 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 蒋庆刚,2013,大学生社会公平感的结构与测量,江西师范大学.
- 焦武萍,2006,组织管理中的人际信任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李砚忠,2007,论政府信任的概念内涵、形成因素与政治功能,晋阳学刊.
- 刘亚,龙立荣,李晔,2003,组织公平感对组织效果变量的影响,管理世界.
- 罗斯坦,2012,政府质量:执政能力与腐败、社会信任和不平等,蒋小虎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 尼克拉斯·卢曼,2005,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瞿铁鹏,李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彭寅,2015,人际信任研究,武汉大学.
- 塞缪尔·亨廷顿,2008,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什托姆普卡,2005,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北京:中华书局.
- 史红民,2004,中国政府信任研究,郑州大学.

- 陶梦馨, 2014, 我国社会公平感影响因素的探析,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 陶芝兰, 王欢, 2006, 信任模式的历史变迁——从人际信任到制度信任,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田丰, 孙正昕, 2016, 青年对政府评价的影响因素, 青年研究.
- 熊青, 2014, 社会不公平感与情绪状况,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 徐延辉, 刘彦,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 社会科学战线.
- 薛洁, 2007, 关注公民公平感——我国部分公民公平感调查报告,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 杨中芳, 彭泗清, 1999, 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概念化: 一个人际关系的观点, 社会学研究.
- 于洪波, 2019, 不公平感对政府信任与政府不信任的影响, 西南交通大学.
- 俞国良, 谢天, 2018, 社会转型: 社会心理服务与社会心态培育, 河北学刊.
- 张成福, 孟庆存, 2003, 重建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西方国家的经验,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 张海良, 许伟, 2015, 人际信任、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基于数据 CGSS2010 的实证分析, 理论与改革.
- 张建新, 张妙清, 梁觉, 2000, 殊化信任与泛化信任在人际信任行为路径模型中的作用, 心理学报.
- 张茂鑫, 刘红云, 2017, 中国民众公平感探析: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10 数据: 第二十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心理学与国民心理健康, 中国重庆.
- 张奇林, 李鹏, 2016, 政府信任、人际信任与制度依赖——一种城乡低保退出困境的解释框架, 青海社会科学.
- 赵建国, 于晓宇, 2017, 社会公平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基于 CGSS 2010 数据的实证分析, 财贸研究.
- 郑功成, 2009, 中国社会公平状况分析——价值判断、权益失衡与制度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 郑建君, 刘静, 2021, 公众村社认同、秩序感知对政府信任的跨层次影响,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郑建君, 2013, 政治信任、社会公正与政治参与的关系——一项基于 625 名中国被试的实证分析, 政治学研究.
- 朱博文, 许伟, 2016, 我国居民社会公平感与普遍信任关系研究——基于 CSS2013 的实证分析, 湖北社会科学.
- 邹宇春, 徐鹤深, 赵富民, 2021, 新时代青年的政府信任及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分析, 青年发展论坛.
- Deutsch, 1958, "Trust and Suspicion".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 265-279.
- Rotter, Julian. B.A, 1967, "New Scale for Measurement of Interpersonal Tru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6: 651-665.
- Wrightsmann, 1992, "Assumptions About Human Nature: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119-124.

“饭圈化社会”：“饭圈”失范与治理 文献述评

彭付雪子*

“饭圈”研究在中文学术领域从 21 世纪初至今已历时将近二十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05 年到 2010 年的概念争论，2005 年被中国学界认为是“粉丝元年”，中国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背景下，由于中国大陆首档选秀节目《超级女声》在湖南卫视上诞生并得到火爆关注，中文里“粉丝”一词不再只与农业食品相关，社会文化领域，“粉丝”狂热追星现象开始进入学术研究视野，此时，狂热的爱好者群体现象最初被较多地称作“迷群”、“网络迷群”和“趣缘群体”。第二阶段是 2010 年后到 2020 年，“饭圈”概念在在学术研究中得到明确的确立，同时“饭圈文化”在互联网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消费主义解释中备受关注，“饭圈”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文化叙事、媒体传播分析以及文化工业等领域的分析。第三阶段始于 2020 年，“饭圈”作为“一个社会治理变量”引起社会学研究的重视(田丰, 2020)，这一可贵的转变将“饭圈”这一“类社会组织”纳入社会学研究范畴(毛丹, 王敬雅, 陈佳俊, 2021)，“饭圈”作为一个现实的社会现象得以有机会从不可捉摸的网络媒体社会中被拉入传统的国家制度和社会经济关系视域中重新被考察(吕鹏, 2020)。

具体来说，研究内容方面，“饭圈”概念内涵从“粉丝”、“追星族”、“明星偶像崇拜行为”、“参与文化”、“网络社群和想象中的共同体”、“粉丝民族主义”、到“自组织”、“社会治理新变量”、“类组织和亚组织”等有一定的变化，基于实证资料进行系统深入理论解释的研究不多，导致“饭圈”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有模糊与未尽之处，其一，“追星”这一在人类早期历史就有所记载的行为和偶像崇拜有所关联；其二，“饭圈”始终围绕文化创意产业的内容产出与资本运用而存在；其三，随着现代社会发展，流行明星狂热追捧已不是新鲜现象，披头士、迈克杰克逊、好莱坞和奥斯卡现象，到现在极度盛行的 kpop.....

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文化传播与消费行为批判上，较少涉及对“饭圈”作为行为者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早期研究受到西方理论为主的外来的追星群体研究影响，将“粉丝”文化简单归类为青年亚文化的一种，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较多研究以英国伯明翰学派詹金斯等人“文本盗猎”的流行文化分析作为工具，以皮斯克的美国爵士乐歌手研究为例，并没有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去解释“饭圈”的形成与发展。

研究方法上，“饭圈”自诞生与形成起的合法性寻求似乎是一种原罪，使得大多数学者忙于对其价值进行“好”、“坏”二分的标定。研究初期，普遍结论认为“饭圈”是“好”的，所谓“即将迎来融入主流文化的高光时刻”，这本身蕴含着一个悖论，如果“饭圈”本身是好的、被社会广泛接受的，为何还需要融入主流文化，这种预设是否意味着不融入主流文化的亚文化就都是不好的？同时也有较多研究对“饭圈”作出“坏”的价值判断，认识到“饭圈”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差、失范行为。然而，针对“应当怎么办”这一实际的问题，在众多对“饭圈”的描述和解释之后较少得到充分思考，欠缺以社会治理的干预视角出发寻求更进一步的讨论空间——一方面，“饭圈”作为一个社会治理变量应该是中性的、价值中立的，是我们至少要在社会学分析范式中去严肃研究和思考的客观对象。另一方面，正如“饭圈”研究普遍以文化视角出发，其具备独特的文化内容，本身受到文化现代性的影响，但其形成发展绝对离不开个体与“饭圈”群体之间的相互形塑，分析“饭圈”对儿童、青少年等群体的影响是对社会行动者主体性的重视(徐岩, 2015)，从而可以从国家社会制度建设角度对“饭圈”这一社会群体进行反思，寻找合适的主体能在儿童、青少年面临“饭圈”消极影响时的进行妥当的干预。

*彭付雪子，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社会学博士。

一、从“饭圈”概念辨析到文化研究

2010年以前,“趣缘群体”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探讨、类型与特征总结是学者最初关注“粉丝”现象的主要切入点。谢玉进(2007)较早地界定“网络趣缘群体”是由不同的上网者以网络为平台,以各种相近兴趣为纽带联系在一起并在网络上频繁互动形成网络互动关系的群体,这一概念把握了“网络”平台、“兴趣”纽带、“频繁”互动的特点并直接指出“粉丝”群体互动关系的研究视角。

2010年后,“饭圈”概念的诞生伴随着对上述“趣缘群体”、“粉丝圈”身份认同问题的进一步深入讨论,张芷凡(2013)以社会学和心理学视角研究韩流男子偶像团体成员韩庚的粉丝身份认同过程,在规范的质性研究基础上首次提出“饭圈”概念来从“粉丝”自身主体出发运用身份认同理论探究粉丝在偶像崇拜中的自我行动方式。鲁婵(2017)研究了“粉丝”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内部互动机制,其行为主要是在追星观念、情感需求的促进下产生的,而最终“饭圈”的形成就在于这种动力起点促成的形象认同基础上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的持续深入造就了该群体内部的权力支配关系。刘凯文(2020)将网络“虎扑社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指出“虎扑社区”以篮球趣缘群体为主的虚拟网络社区就是一个流动性不强的“凝固”圈层,群体内部会因成员兴趣点属性的变化发生内部流动,具备“半凝固性”特点。这一阶段基于对“粉丝”现象描述、特点确认和身份认同与社会互动的研究是“饭圈”研究初期的主要内容,社会交往理论相关的“圈层理论”得以明确地用以解释兴趣相关的“粉丝”现象,促使“饭圈”研究获得发展。

概念的明确使得具体研究内容逐渐扩宽,张一帆(2019)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对网络趣缘社区运营进行研究,朱睿钊(2019)研究网易云音乐客户端的“音乐共同体”来说明网络趣缘群体在社区情理中的自我实现。“饭圈”在社交网络媒介的信息传播过程中实现了个体认同到群体身份认同从而汇聚成一种独特的文化,较多学者将“文化”定义为“一种生活方式”,“饭圈文化”作为一种青年生活方式被明确为当代青年亚文化的一种,受到了广泛社会群体的理性规则及社会共同价值目标的规制,其结构功能与权力运作在权力关系理论中得到讨论,且“饭圈”参与者们借以需求层次理论得到了主体性关注(孟威 2020)。

较多的新闻学、传播学等分析视角使“饭圈”文化自诞生起便被悬挂于不可捉摸的网络社会分析视线中,同时被框定在媒体时代的虚幻滤镜下。21世纪初,“饭圈”概念的争论方兴未艾,“粉丝”、“趣缘群体”等代替性的指称下,相关群体在互联网社会中的形成特点、互动机制、传播路径等问题率先得到新闻学、传播学的解释。章雯(2005)认为“趣缘群体”促进社会互动且互联网已成其交流的主要手段和活动场所。范芳旭(2010)通过关注现实空间对“读者”类趣缘群体的影响而进行了网络和现实空间的比较,这种比较研究的视角揭示了趣缘群体成员的价值观、活动参与行为以及认同的形成机制,理解、遵从、共鸣和参与等“自我认同维系资源”的共同作用下,一个“反思性的场所”最终成为个体获取意义的来源。罗自文(2013)以网络沟通平台为标准将青年“网络趣缘群体”进行分类,得出青年网络趣缘群体结构由相对固定的活动“空间”、相关的规制、认同感和归属感组。李鲤和陈玉婷(2017)提出从浅层技术联通发展到深层情感共振的网络人际关系是“网络趣缘群体”本质,这种从单一个体到共识群体的身份革命通过“众智”书写与“聚合”文本催生的内容革新,进行关系驱动与分众传播样式的阅读扩散从而形成“网络趣缘群体传播的社会化阅读新模式”的传播新生态,达到价值和场景需求并存的效果诉求。李林憶、张怡飞(2020)等研究网络社区中网络趣缘群体传播现象,基于网络趣缘群体的价值共创行为剖析其文化传播机制。

总之,在承认“饭圈”的主体性这一前提下,研究者们清晰指出“饭圈”文化构建了一种“互动的共同体”,具备相当的凝聚力(曾庆香,2020)。

二、“饭圈文化”的消费主义批判

互联网和流媒体本身的传播特性决定其成为“饭圈”诞生必不可少的温床,互联网产业

和媒体技术发展促进更多关于“粉丝”现象极其背后明星经济、造星产业的消费主义视角的解读,例如,针对“韩流”音乐这一专门类型,郑佳(2017)介绍了韩国流行音乐产业(k-pop 产业)专业与商业相结合的特点,在其独具特色的商业运营模式和练习生人才培养体制下获得快速发展。冯挺挺(2019)以嘻哈说唱为例研究亚文化资本的转换研究,在嘻哈说唱亚文化资本向其他资本转换的过程中,媒介是基础,“趣缘群体”是转换过程中最为凸显的特质,转换成功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又为亚文化资本再次获取提供了经济基础和社会保障,从而强化亚文化资本。宛轶(2020)从经济社会的角度分析了 K-pop 团体的营销模式创新,在 90 年代起就进入巅峰期的韩国音乐发展背景下,KPOP 这种独特的流行文化产物通过对欧美、中国港台等流行音乐形式的借鉴综融而最终自成一派,目前在非常成熟的音乐风格和运作模式下不断地向世界各地以流行文化的形式进行输出,例如出身小型公司 Big Hit Entertainment 的“防弹少年团”自 2016 年起持续刷新各类记录,改变了韩国市场的寡头垄断格局并成功突破欧美音乐市场的壁垒,但其团体运作及营销模式在流水线生产及稳定的寡头垄断市场下也有天然的桎梏,使其达到某种顶峰而难以进一步突破。

显然,与文化工业解释一道,深受西方学术研究影响的消费主义理论将“粉丝”作为受众和“互联网、媒体”等媒介串联,“消费”本身的确和社会经济息息相关,正如具体的流行文化产业门类的发展使得“流量”法则在新兴互联网和流媒体经济中中盛不衰,互联网经济市场的资本控制和技术变革操控“饭圈”兴盛,但是,这些中观层次的社会切面关注却只是为“饭圈”形成背景提供了注脚,消费主义的单一视角并不足以全面解释“饭圈”诞生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机理演进,致使“饭圈”研究落入尴尬境地,“大部分精英知识分子要么对粉丝现象视而不见、不屑一顾,要么就将粉丝看成是消费意识形态的可悲受害者。”

总之,新闻传播学视角将“粉丝”现象囚禁在了互联网和媒体空间之中、消费主义视角陷入“谁有权对粉丝文化文本实施控制”的研究局限,导致粉丝文化分析难逃媒介生产者与粉丝消费者的二元对立藩篱。这两种既有研究视角实则都遗漏了当代社会中更复杂的权力结构分析视角,中国当代社会的消费文化生活的变迁实际上嵌入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中,“饭圈”作为当代大众文化和消费行为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任何傲慢的忽视和武断的批判都阻碍着其产生发展的真实原因的显现,探索“饭圈”这种新兴消费模式或者说生活方式出现的深层影响因素务必要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联系起来。“新中国 70 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社会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巨变”、“中国正在经历着世所罕见的巨大社会结构转型……”(李培林, 2019),在这样的社会转型背景下,迈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更强调社会治理,这也是当前研究“饭圈”问题相当欠缺的研究视角。

三、“饭圈”的公共参与误解

直到目前,仍有一些研究执着地对“饭圈”进行“乱象”、“问题”的价值标定,这主要源于“饭圈”研究自始存在两种路径——

一种是上述将“饭圈”文化内容直接进行考察并衡量这种所谓“亚文化”生活方式和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饭圈”并非一种典型的社会团体或社会组织,实际情况是,该群体的行动从未上升到政治层面,不过,一贯以来的“饭圈”文化关照至少贡献了几点——第一,置“饭圈”于社会宏观的语境中考察其位置、与宏观环境依存关系及社会政治经济力量的作用,进而引出“饭圈”如何被更广泛的社会理性接纳、“饭圈”对社会共同体的价值讨论。第二,“饭圈”作为一种亚文化的分类隐喻了“饭圈”在广泛吸纳社会规则后还需步入主流文化这一背景,这一价值层面上的思考为后来“饭圈”在社会治理视域下的失范讨论埋下了伏笔。第三,较少见的“饭圈”文化审美研究尝试为社会学分析增加了丰富的人文精神关怀,使得“饭圈”偏重理性的讨论进路中增加了对“人”的关怀旨趣和可贵的审美层面的哲学反思。同时,“饭圈”文化看似宏大的讨论中实质已较多运用社会组织权力结构理论、社会交往理论等来解决“饭圈”为何、“饭圈”如何等基本问题,但遗憾的是,尽管“饭圈”文化

直观后的研究看似完整地总结了“饭圈”形成和运作特征、发展生态和趋势，但却选择了直接忽略“饭圈”始终被桎梏于互联网社会空间讨论中这一问题，这与“饭圈”文化研究试图将其引入社会治理与社会行动讨论的出发点之间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社会治理和社会行动主体并不只在网络空间中活动且网络空间的状态是由活生生的个体与群体行为所触发的，所以，这也表明，单一地把“饭圈”文化作为整体研究对象，其指向的研究内容全然不能为“饭圈”在社会接纳和社会排斥之间的灰色地带反复游走而频发失范问题提供解释及解决办法。

另一种则是从政治参与和意志表达层面来描述分析“饭圈”行为，例如，张宇(2020)直接研究青年网络迷群的政治参与及意志表达，一些以新闻学、传播学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学者接过“饭圈”政治参与和政治表达研究内容穷途的接力棒，戳破“饭圈”的民主参与幻象本质是工具理性和资本操控下的一种“参与式文化”(金方廷，2021)，可如果承认“饭圈”这种“亚文化”在主流文化边缘游走，其和更广泛的社会规则和社会理性之间关系的讨论自然无法回避，“饭圈”参与社会治理行动的运是进一步讨论的重点已是昭然若揭。因为，仅站在精英主义的角度来刻意贬低“饭圈”价值的研究也是毫无必要的，当下“饭圈”的行动与民主主动的关联并不大，其“集体行动”本质上缺乏追求最大公约数的“政治热情”，与社会平等主张相去甚远。

然而，在私人感情出发外化为具备较强市场民粹主义特征的社会行动过程中，“饭圈”将自身的一套行为和社会交往的逻辑高度自觉地内化为一种可复制、可再生产的生活与生存方式，只强调急于个人喜好和偏向的社群差异，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异质性的文化身份，这些丰富的社会实践会随着社会形态的演变发生着丰富的变化并造成深远的社会影响，远不是用文化研究就能解决的，亦不是试图转向政治行为分析的研究脉络所能持续的。

四、作为社会治理“变量”的“饭圈”

2020年左右，社会学分析的力量开始在“饭圈”研究领域突破迷雾而崭露头角(田丰,2020;李龙、刘汉能,2020)，“饭圈”文化影响下的青年社会参与已呈现线上、线下共同进行的双重路径，关注青年社会网络行为融入实际社会生活的影响已迫不及待(田丰,2020;陈骢,2020)。

“饭圈”已形成内部专属的话语体系与运作规则是一种不争的事实，作为社会行动者的新形式，“饭圈”研究具有建设性意义(吕鹏、张原,2019)。

这些鲜见而珍贵的研究呼声标志着“饭圈”终于开始从过多的“文化”关注、“公共意愿表达与政治参与”的误读而落实到新时代社会治理这一重要视域中(田丰,2020;吕鹏,2020)。在网络社会兴起的、以“追星”行为为核心特征的“饭圈”在个体维度、群体维度、组织维度和文化维度有其专门的社会学解读，在个体层面，异质性偏好是作出进入某一“饭圈”的选择重点，物质性是进行筛选的最优特性；在群体层面，“饭圈”有诸多不同类型的划分，并且每一种类型在较完善的功能构成下都具备相当完整的结构；由此，“饭圈”的组织维度上，角色分工、组织形态与运作模式都呈现出非常清晰的规则体系与等级结构。从而，一个“社会治理新变量”的提出意味着“饭圈”被看作一个社会群体（或类社会组织）而得以在个体与群体、社会交往、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等层面得到综合、充分的考虑。

因此，新时代社会治理视域中的社会群体（类社会组织）研究视域解构了“饭圈”组织特征、形成和运行规则、特定社会参与模式等方面的内容，同时，研究方法论的突破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处理“饭圈”作为虚拟网络群体和现实社群之间的关系。其二，思考“饭圈”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社会群体的行动是否被社会结构接纳。

五、“饭圈”的“失范”问题关注

2022年5月开始，“饭圈”相继涌现的“不当”行为频繁受到新闻媒体的曝光，与两年前的“出圈”不同，“饭圈”不断受到官方主流媒体的点名“批评”与“指责”，作为一个崭新的社会群体，“饭圈”效应(彭焕萍、刘念念,2022)、“饭圈”极化(崔志梅,2022)、“饭圈”思

维泛化(林雅楠、姒晓霞,2022)等相继得到讨论,尽管这些讨论囿于较短篇幅容量的期刊论文发表而相对欠缺系统性,少有几部学位论文已尝试从“失范行为”、“偏差行为”或者失范理论中的“群体极化”概念出发来有意识围绕“饭圈”被社会结构接纳状况来探讨其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但个中不足都未能绕过目前“饭圈”研究的通病:或许由于充分的实证资料支撑的欠缺,“失范”理论概念被简单归咎于“亚文化”理论进行理解(马赫,2020),或仅采用“失范”的微观含义(王瑜瑾,2021),且彼此在对“失范”概念界定上有高度相似性(盛莹莹,2021),分析工具的不明确与不完善最终造成研究对象“明星偶像崇拜行为”、“网络饭圈”、“饭圈文化中粉丝行为”等概念在内涵与外延上参差不齐,“饭圈”并没有被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事实概念得到明确、充分的理论解释。

总之,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娱乐工业发达及造星方式的变革,“粉丝”组织从“追星族”变为“饭圈”,且不同阶段的“粉丝”文化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代际差异”,但这些差异并非不可调和的对立矛盾,更没有孰优孰劣的高下之分,可见,历时性地梳理“饭圈”发展的前世今生十分必要。然而,既有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欠缺对“饭圈”概念的明确界定,其概念外延和内涵的不清晰主要由于“饭圈”主体性的忽视:没有从其内部出发去历时性地梳理概念产生及形成过程。欠缺对“饭圈”主体的失范行为的重视,尽管既有研究表现出了明显的对社会治理视域下“饭圈”行为解释分析,“饭圈”对合法性寻求的核心存在目的与社会规范张力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关注。同时,研究内容上的理论运用相对混乱复杂,彼此的讨论缺乏深度对话和学术共鸣。

参考文献

- 安静、张妮, 2022,《基于治理政策的网络“饭圈”乱象研究》,《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8 期。
- 蔡骥, 2008,《消费主义引领下的明星经济——对“粉丝”现象的传播学解读》,《新闻记者》第 12 期。
- 曾庆香, 2020,《“饭圈”的认同逻辑: 从个人到共同体》,《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 曾一果, 2020,《从“圈地自萌”到“文化出圈”——社交媒体环境下“饭圈”文化的自我突破》,《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 陈骢, 2020,《饭圈文化的畸变与归正》,《人民论坛》第 22 期。
- 崔欣润, 2020,《饭圈传播中的信息茧房现象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
- 崔志梅, 2022,《饭圈的日常极化: 表现形式、发生机理与演化效应》,《中国青年研究》第 10 期。
- 范芳旭, 2010,《趣缘群体中的群体认同——以《读库》读者群体为例》,《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冯蜓蜓, 2019,《亚文化资本的转换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韩思琪, 2021,《粉丝文化“进化论”: “饭圈”游戏、流量法则与时代症候》,《花城》第 2 期。
- 金方廷, 2021,《偏离的饭圈——资本与舆论之间的网络社群》,《文化纵横》第 5 期。
- 李鲤、陈玉婷, 2017,《基于网络趣缘群体传播的社会化阅读新模式》,《中国出版》第 24 期。
- 李林德, 2020,《网络社区中网络趣缘群体传播现象探究——以“豆瓣小组”为例》,《新媒体研究》第 6 期。
- 李龙、刘汉能, 2020,《舆论爱国: 爱国粉丝社群的社交化与集体协同》,《中国青年研究》第 4 期。
- 李培林, 2019,《新中国 70 年社会建设和社会巨变》,《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9 期。
- 林雅楠、姒晓霞, 2022,《饭圈思维泛化的媒介分析》,《中国报业》第 18 期。
- 刘凯文, 2020,《半凝固的“圈层”——虎扑体育社区趣缘群体的传播动力与秩序格局》,《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刘雅超、姬辛尧、金凤, 2022,《“饭圈”集资问题治理路径研究》,《法制博览》第 26 期。
- 鲁婵, 2017,《“饭圈”与“圈饭”——大学生粉丝群体的互动机制探究》,《青少年研究与实践》第 32 期。
- 罗自文, 2013,《青年网络趣缘群体的结构和功能研究——基于 6 个典型青年网络趣缘群体的实证分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第 06 期。
- 吕鹏, 2020,《“饭圈”的拓扑结构及其参与社会治理的思考》,《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 吕鹏, 2020,《“饭圈”的拓扑结构及其参与社会治理的思考》,《人民论坛·学术前沿》第 19 期。
- 吕鹏、张原, 2019,《青少年“饭圈文化”的社会学视角解读》,《中国青年研究》第 5 期。
- 马赫, 2020,《明星偶像崇拜的失范与重构路径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
- 毛丹、王敬雅、陈佳俊, 2021,《“饭圈”观察: 组织特征与圈内外关系》,《社会学研究》第 36 期。
- 孟威, 2020,《“饭圈”文化的成长与省思》,《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 彭焕萍、刘念念, 2022,《“饭圈效应”的特征、扩散及其逻辑》,《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47 期。
- 盛莹莹, 2021,《“饭圈”文化中粉丝行为失范及引导策略研究》,浙江理工大学硕士论文。
- 孙翼飞, 2019,《流量时代下的饭圈 KPI》,《新金融观察》第 12 期。
- 田丰, 2020,《“饭圈女孩”对网络时代治理模式的启发》,《中国文化报》第 3 期。

- 田丰, 2020,《网络社会治理中的“饭圈”青年: 一个新的变量》,《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 田丰, 2020,《网络社会治理中的“饭圈”青年:一个新的变量》,《人民论坛·学术前沿》第 19 期。
- 田丰,2020,《网络时代社会治理的反思与对策——以抗击疫情的“饭圈女孩”为例》,《青年探索》第 2 期。
- 宛焱, 2020,《K-pop 团体“防弹少年团”营销模式的创新研究》,《市场观察》第 1 期。
- 王瑜瑾, 2021,《网络饭圈失范行为及其治理研究》,《北京邮电大学硕士论文》。
- 谢玉进, 2007,《网络趣缘关系与人的发展》,《理论导刊》第 39 期。
- 徐岩,2015,《社会资本和儿童福祉——从社会学理论视角分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5 期。
- 杨玲, 2011,《西方消费理论视野中的粉丝文化研究》,《长江学术》第 1 期。
- 张一帆, 2019,《基于社会认同理论的网络趣缘社区运营研究》,《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张怡飞, 2020,《网络趣缘群体中的文化传播机制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张宇, 2020,《青年网络迷群的政治参与及意志表达》,《人民论坛》第 28 期。
- 张芷凡, 2013,《青年“粉丝”身份认同》,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 章雯, 2005,《试析趣缘群体的社会整合功能》,《黄梅戏艺术》第 18 期。
- 郑佳, 2017,《论韩国 k-pop 音乐产业发展的特点与影响》,《吉林艺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 朱睿钊, 2019,《“音乐共同体”: 网络趣缘群体的自我实现与社区情理——以网易云音乐客户端为范式》,《智富时代》第 1 期。

重庆市奉节县旅游生态调查报告

——以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期为例

谈芯羽*

提要: 研究者采用观察、深度访谈、政策文本分析等方法,并于2022年对重庆市奉节县现阶段的旅游生态进行了调研,发现其正处于缓慢且艰难的恢复期与发展的瓶颈期。总结出管理层中上级与下级的治理政策存在明显矛盾;当地文化深奥多样,难以凝练出宣传核心;政府补贴资金门槛过高等问题。并结合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需要,给这些问题以政策建议。

关键词: 突发性公共事件 旅游业 旅游生态

引言

2020年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场影响持续至今的严重公共卫生事件,对全国几乎所有产业都造成了严重冲击。有赖于人口流动的旅游行业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据文化和旅游部统计,2020年旅游总人次总预测值为39.41亿人次,同比下降34.97%;旅游总收入预测值为39228.83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39.83%。^①

旅游业的脆弱性与敏感性是被广泛承认的(Sharpley,2005),但国内外学者大多认为旅游业具有强大的韧性。他们期待旅游业能在受到冲击的同时,借机完成转型升级,快速恢复甚至达到更高的发展水平(Brouder & Saarinen,2019)。而卫生事件的突发性、反复性等特点让游客对外出旅游失去勇气,导致旅游业的恢复十分艰难。如何在公共卫生事件突发背景下维持并促进旅游业发展,成为学界相关研究的重点。而类似重大事件对旅游业的打击不止反映了景区与当地政府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时的不足,同时也暴露出了当地旅游业本身存在的问题。

奉节作为一个拥有优质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的城市,在中国正在发展的旅游城市中有一定代表性。本研究以重庆市奉节县为案例,聚焦于奉节县旅游业在面临公共卫生事件时的复苏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深入剖析奉节县的旅游原生态,试图在经验层面找出其文旅产业在运转过程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思路

旅游业不是一个单一的产业,而是由旅游业、交通客运业和住宿业等多方行业组成的一个产业群^②,对旅游城市本身有着很好的经济带动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提高,旅游已经成为一种被正常需要的“商品”而非“奢侈品”(刘光岳,2016)。由于淡旺季的存在,旅游业本身就是敏感的(魏小安,2003)。在影响旅游业发展因素的研究方面,蒋丽丽和王新越认为,旅游资源、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业人力资源是影响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蒋丽丽,2018;王新越等,2020);杨勇认为餐饮住宿业的发展也是促使旅游业前进的原因(杨勇,2008)。国外对此的研究一方面更倾向于实证,另一方面认为目的地气候(Fitchett,2018)、创新与产业结构(Romao,2019)、环境(Ignacio,2019)均会影响旅游业发展。

经历了非典与新冠的双重打击后,学界内也出现了不少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旅游业应如何自处的文献。总体来看,这些文献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类研究聚焦于旅游业如何

* 谈芯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本科生。

^① 冯璐、宋瑞:《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评估与建议》[J],《财经智库》,2020年第5期。

^② 来自百度百科定义

弥补亏损，打牢基石。这一类的文献中，学者认为，需要政府、旅游企业和行业协会相互协同，彼此扶持才能支撑旅游业度过急性公共事件时期的寒冬(明庆忠,2020;石培华,2020;王少华,2020)。崔凤君和申军波等多位学者认为，文旅人自救才是根本之策，需要开展远程办公，引导消费行为(崔凤君,2020;申军波,2020)。第二类研究以夏杰长为代表，学者认为旅游业应该抓住机会，化危为机，推动自身改革升级，开拓二级市场与虚拟旅游产业，鼓励旅游和数字技术相结合(夏杰长等,2020;盛方富,2020;陈林,2020;李默涵,2022)。刘淑英等人认为，文旅产业会产生新机遇和新方向(刘淑英等,2022)。祝铠推测，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反而催生了新的生活和旅游方式，生态和谐化是旅游业未来发展的大方向之一(祝铠,2020)。

综上所述，第一类学者提出的意见往往是建立在理论上，操作起来有较大难度，且笔者认为，这些研究实地考察依据方面存在不足。如前人所言，文旅人的确在自救，但其方式往往是“另寻出路”，如转行农业、手工业、电商直播等，工作内容往往与文旅产业无关。这类“自救”，挣来了文旅企业的存续，却并非如学者所建议的那般，是来自旅游业内部的自我发掘，更不是旅游业的市场主体间的联动与互助。换言之，旅游业在寒冬期的自愈能力十分薄弱。而第二类学者对于旅游业的整体走向持积极态度，而笔者调查发现，不仅旅游企业常常入不敷出，政府用于补贴的财政状况同样困难。这类学者认为“危机也是机遇”，可旅游业本身已经没有余力生存，更难支出额外资金借机转型升级。本研究在学界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实地探访奉节县的文旅产业发展现状，探寻问题的根本，希望以经验事实为基础，回答“在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时期，旅游产业如何发展”这一问题。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政策文本分析与半结构访谈法。通过查阅相关的期刊、论文、政策文件、县志，以及通过奉节政府网，获得一定数据，对奉节县旅游产业进行了初步的认识。如奉节自2019年以来，旅游业每年的营业额，奉节政府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的有关措施，奉节拥有的旅游资源都有哪些，奉节的旅游业管理架构是怎样的等等。并且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定了问卷和访谈提纲。文献的阅读范围还覆盖了旅游业的相关论文，并且基本涵盖了影响旅游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和其他旅游城市对于相关卫生事件的应对措施，以及来自学界的专业建议。在为期十天的调研中，笔者多次走访奉节县文化与旅游委员会、奉节县档案馆等地获得资料。根据所获得的文献与资料，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多份半结构式问卷，根据问卷进行深入访谈，并组织了一次座谈会，与当地旅行社职员、餐饮住宿类从业者、奉节县政府工作人员、奉节文化馆工作人员、旅游类博主等多位文旅产业相关的从业者进行深入交流，从多角度了解奉节县文旅产业经营现状，把握文旅产业目前所面临的问题，获得了约6万字的访谈资料与近百份的政策文献，用以支撑调查报告的写作。

二、案例基本情况

截至2022年9月，奉节县全县5A级景区1个，4A级景区6个，A级景区共23个。根据奉节县县志到2016年的记载，奉节县内的自然旅游景点有41个，人文旅游景点37个，其中包含奉节县唯一的5A级景区白帝城。自然文化中，奉节自然旅游的资源主要为三峡之巅、三峡原乡、天坑地缝等景点，风景十分宏伟壮观。另一方面，奉节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诗词文化、三国文化和各种古遗址内容都十分丰富。有大量文人墨客留下关于奉节的著名诗篇，也有白帝庙永安宫托孤等著名三国文化遗址^①。总的来看，奉节是一个体量不大、但拥有核心旅游景点以及配套基础设施的二线旅游城市，有着成为著名大型旅游城市的潜力与天赋。

在疫情爆发之后，奉节县的旅游业经营情况几经波折。2019-2021三年相比，2019年整年的发展相对正常，可以算作对比数据。基本所有景区受疫情影响的时间线为：2019年底疫情爆发，2020年1-3月几乎全部停滞，4-8月景区恢复，客流量爆发式增长，其中4-6月为高峰期，这三个月的营业额几乎与2019年半年的收入相当，这也是从数据上看，2020年

^① 来自《奉节县县志》(至2016年)

的营业额并未大幅度跳水的原因。9-12月景区继续封控。2021年1-6月正常运营，7月以后营业萧条，10月至2022年6月13日景区呈熔断状态，6月13日至今再度恢复营业。

图 1 2019-2021 奉节县旅游业年度旅游综合收入（数据来源：奉节县文化与旅游发展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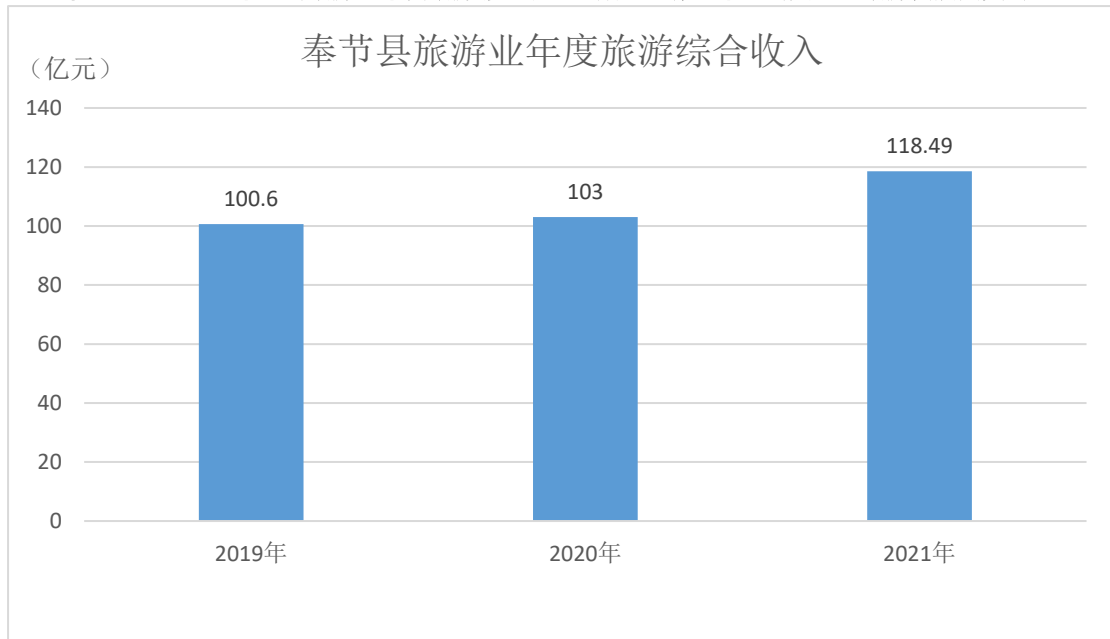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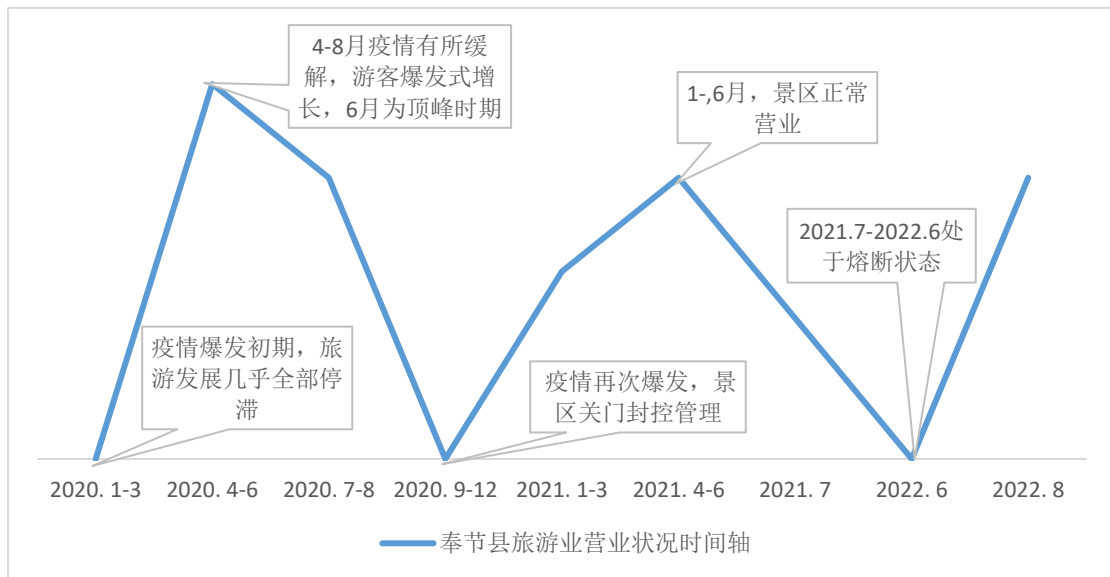


图 2 奉节县旅游营业状况时间轴（数据来源：对白帝城旅游开发公司成员访谈）



在国家政策方面，有关部门先后出台政策助力旅游企业渡过难关，重振旅游业，这些政策包括：暂退旅行社缴纳的保证金；对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四类受公共卫生事件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企业2020年度发生的亏损，结转年限延长至8年；适当下调贷款利率等。文化和旅游部在2020年7月14日出台扩大旅游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指出可以恢复跨省团队旅游。奉节县在执行国家要求的基础上，也制定了相关补贴政策，对住宿、餐饮、连锁酒店、民宿等市场主体进行评级，并按营业规模给予补助，鼓励当地开发旅游商品与文创产品等^①。通过图1可以看出，阶段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并没有严重影响文旅产业发展，它得以

^① 参见《奉节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奉节县全域旅游发展奖励补助办法的通知》，奉节府办发〔2021〕95号

维持自身的持续收入的增长与政府的支持等措施有较大的关系。

表 1 奉节县文旅展业 2019-2021 年主要数据表（数据来源：奉节县文化与旅游发展委员会）

主要指标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旅行社	13	13	12
星级酒店	2	2	2
旅游从业人员	7600	6000	8000
全县接待游客（万人次）	2040	2046	2285
全年购票游客（万人次）	145.1	126	156
过夜游客（万人次）	112.3	107	131
乡村旅游（万人次）	695	886	979.88
旅游综合收入（亿元）	100.6	103	118.49
文化产业增加值（万元）	38637	35006	39662
旅游产业增加值（万元）	82730	82813	102772

文献综述提到，旅游业是一个“敏感”的产业，除了本身就存在的淡旺季外，还会受到多方面不可规避的影响。敏感这一特性，让旅游业中一些本身存在但可以避免的问题同样被掩盖，让旅游产业的发展除了创新和向前之外，忘记了还要不断回头，反省自身。旅游业这一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打击的原因和体现总是肉眼可见，如天气和高铁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但在旅游业绩低迷的背后还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如果不深入访谈旅游业的内部工作人员，是得不出结论的。所以，对一地区旅游业本身的整体生态进行考察成为必要。

三、对奉节旅游产业生态的分析

（一）宏观层面：奉节县文旅产业内在结构分析

首先，从管理层构成上，国家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统率旅游业大局。奉节县委县政府统辖管理，负责制定文旅产业发展的大体方向，颁发相关补助奖励文件等。县委县政府下属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文旅委”），负责将政策文件落实到各主体，统计文旅产业相关详细数据，制定详细具体的发展计划，如各景点游客中心的设置与服务规范的要求，评审相关特色产业并划分等级等。文旅委不直接管理奉节县的景区，景区由相关旅游发展公司管理。旅游业六大要素“吃、住、行、游、娱、购”大部分由个体户组成。

景区管理中，赤甲集团是国有集团，承担奉节的几个高星级与高人气景区的管理与开发工作（如 5A 级景区白帝城、高人气新开景区三峡之巅、印象系列大型演出“归来三峡”等），赤甲旗下还管有大型旅行社、交通运输车队等业务，在奉节县内可以说掌握了旅游业资源的“半壁江山”。

然而组织层面暴露出了比较明显的问题。上层的规制政策与中层鼓励发展的政策相矛盾，为下层景区治理带来的进退两难的局面。以问题最显著的“天坑地缝”景区与“三峡原乡”景区为例。曾经天坑地缝景区与三峡原乡景区都是经过赤甲集团重金开发的旅游资源，一度成为奉节县内的“必游景区”，这两个景区内部风景秀丽，宏伟壮观，都是有望成为头牌级别的旅游资源。开业期间的游客数量也相当可观，在口碑上获得一致好评，有当地原住民甚至成为“景区自来水”的旅游博主，专心并专业地为家乡做着免费的宣传，招徕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但这两个景区都在开业后不久被国家列为自然保护区。政策上，要求自然保护区内不能进行任何的旅游开发与营业，这对前期投入巨资建设景区，甚至还未能回本就惨遭关门的旅游开发公司来说无疑是严重打击。景区本身无人打理，据居住在景区附近的本地人描

述，曾经风景迷人的三峡原乡现已落得“杂草丛生”的地步^①。在“上层”限制了景点的开发后，“中层”的重庆市又将这两个景点划为“风景名胜地”，期待奉节县对其加大宣传与开发，吸引更多游客为奉节县文旅产业输送活力。作为“下层”的赤甲集团即便有心继续发展“天坑地缝”与“三峡原乡”景区，也不得不遵从“上层”的指示，将景区关闭，重新规划奉节县的核心旅游线路，寻找新的可开发旅游资源。

另外关于景区开发限制，尽管需要政策限制旅游资源过度开发，维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也不该是“一刀切”的政策，完全阻止任何资源开发的可能。过度限制景区发展同样缺少吸引力，让本可以成为千古名胜的景点只招徕少量游客，成为“小众宝藏景点”。举例如白帝城景区，容自然与人文资源于一体，在进入白帝庙前有一段山路要爬，建设电梯成为必要。通过笔者对景区负责人的询问，在白帝城内建设电梯，似并不会对其内部资源造成破坏。有了电梯，便利了数量庞大的老年游客与行动不便、带孩出行家庭等潜在消费群体。所以不设电梯对景区会造成隐性打击。

（二）微观层面：旅游资源分配现状

1. 赤甲旅游文化创意开发集团

说到资源分配，自然要先介绍一下在旅游业甚至农业都占据了“半壁江山”的赤甲集团。已知奉节县的产值主要由文旅产业与农业贡献，县内几乎没有大型的第二产业作为工业生产的“顶梁柱”。所以旅游业与农业都有投资的赤甲集团有着重要的分析和参考价值。

重庆白帝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帝城旅游开发公司”），注册资本 1048.492 万元^②，隶属赤甲旅游文化创意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旗下（以下简称“赤甲集团”）。2016 年，县政府以“重庆白帝城旅游开发公司”的主体回购两大景区（天坑地缝景区、白帝城·瞿塘峡景区），公司自此成立。2017 年，赤甲集团完成股权变更，白帝城旅游开发公司成为了集团的权属子公司。如今，赤甲集团下设三个子公司，结构上三个公司平行，行政管理上，白帝城旅游开发公司作为其中之一代为管理重庆市归来印象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经营业务为张艺谋导演设计的“归来三峡”印象演出活动，由于其演出场所设于白帝城景区内，所以为整合人力资源，卫生与售票等经营活动一并由白帝城旅游开发公司代为管理。另一个白帝城旅游开发公司作为股份公司，再下设三个子公司。分别是赤甲国旅、三峡之巅脐橙销售公司与赤甲客运公司。

图 3 赤甲集团组织架构



其中，赤甲国旅是国际旅行旅行社，负责组团与地接等业务。脐橙销售公司有一整套标准化的生产线与销售平台，并且建设了厂房（预计今年投入使用）包括脐橙的清洗、烘干、包装、检测含糖量等标准化项目。在规模上，该厂房是奉节、巫山、云阳片区内规模最大的厂房之一。赤甲客运公司主要负责交通的运营，负责有小车与船运两大板块。其中，船运主要为旅游业服务，小车业务还包括为企事业单位提供包车等。原本，赤甲旅游客运公司还持有大车（40-50 人座）业务，在夔州交通公司成立后，赤甲集团将大车业务进行划分，

^① 来自对当地居民的访谈

^② 自“企查查”，<https://www.qcc.com/firm/c1027e3dd91b5d11e92830dd399d6d90.html>

以投资加车资作为夔州交通公司 51%的占股。

2019 年白帝城·瞿塘峡景区与天坑地缝景区共接待 118.01 万人次游客，收入约 4000 万元，其中门票收入约 3600 万元，占收入的绝大部分，剩下 400 万为二消（门票以外的消费收入，如讲解费、观光车、房屋租赁、餐饮收费、停车场等）收入。由于白帝城瞿塘峡景区主要为人文景区，而天坑地缝景区又受相关政策限制，两个景区都很难进行其他娱乐项目建设，以至于二消收入萧条。

2. 其他文旅产业商户同样在经历寒冬期

奉节全县的文旅企业一共 628 家，其中有 90%的企业都是中小微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它们的社会资本参与度不超过 70%，呈现规模小、布局零散、不成体系不成规模、服务水平较低的特征。通过餐饮与住宿协会提供的数据看出，吃住娱的经营情况与当地旅游市场的联系非常紧密。餐饮方面，根据 2020 年奉节县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户数统计表，住宿和餐饮业共 6327 户。2021 年奉节统计年鉴显示，贸易与旅游业限额以下企业和个体户的经营数据下降比例较大。相较于 2019 年，2020 年的营业额亏损了 10%，2021 年亏损了 30%，行业的寒冬期与回暖期基本和景区关门与开放时间保持一致。在高铁开通与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有所改变后，夜市行业运营逐渐恢复，而举行聚集性婚礼与聚餐类型的大餐饮商户恢复较慢。

表 2 2020 年住宿和餐饮业主要指标（数据来源：《2021 年奉节统计年鉴》）

指标	单位	2019 年	2020 年	±%
住宿和餐饮业	万元	188208	200797	6.7
限额以上	万元	91716	97524	6.3
限额以下企业和个体户	万元	185659	103273	-44.4
住宿业	万元	37503	37344	-0.4
限额以上	万元	29943	29976	0.1
限额以下企业和个体户	万元	7561	7368	-2.6
餐饮业	万元	150705	163453	8.5
限额以上	万元	61595	67548	9.7
限额以下企业和个体户	万元	89110	95905	7.6

在住宿方面还另有文章，奉节县酒店总体的入住率目前在 85%-90%，房间多的五星级酒店在 70%左右，行情与旅游业的发展几乎同调，而住宿业面临的问题与其他行业的不同在于 OTA 平台的抽成。举例五星级诗城皇廷在与携程签约后，平台会收取酒店营业额的约 12%作为服务费，同时，平台上酒店的所有优惠折扣都由酒店自行承担，这对酒店经营来讲是一笔不小的抽成。笔者在访谈期间获悉，酒店希望政府能够介入此类抽成严重的情况，虽然这是市场行为，但还是希望能将惠企政策落地到相关方向。

交通业方面则与其他行业有所不同，高铁的开通为其他行业带来了更多游客与消费机遇，但是对于其它交通业却是新的寒冬，因为高铁取代了车队跨县运输的职能。据访谈，奉节某车队的绩效下降了 30%，除去县内运营外，跑县际的大巴车（如万州到奉节，重庆到奉节）只得转向尚未被高铁取缔的城市（如奉节到巫溪），但随着中国基建工程的不断发展，车辆的运营还需另谋出路。

3. 问题：“一家独大”的利弊观

国企“挑大梁”在奉节县的治理效果有利有弊。国企不裁员的特点保证了一定劳动密集型员工在特殊事件期间免于下岗，为奉节的防疫工作提供了充足的岗位调动。旅游景点的统筹管理也有利于奉节的景点之间形成成熟的景区游览路线。而大型旅行社的存在会有意或无

意间压榨其他小型企业的养分。奉节县的旅行社在特殊卫生事件期间由 13 家减少至 12 家，通过访谈，除了赤甲以外的小旅行社都在苦苦挣扎。门店停业、员工辞职，这期间的自救行为为只有到其他行业另寻办法，处境十分艰难。

“一家独大”的现象除了在说赤甲集团集中管理景区、管理奉节县内大型旅行社外，还有一层含义。即笔者观察到奉节县文旅资源在地理分布上的问题。

在社区规划与城市设计的概念中，往往越是人口流动核心的区域，其经济应该越活跃和发达。而笔者通过观察发现，除了如奉节县城中心的商业街富有餐饮业与娱乐行业外，本该同样发达的核心景观（如白帝城、三峡之巅）附近却相当冷清，仅仅围绕游客服务中心有零星几家。即便来自渡轮的“一日游”旅客，也应有着庞大的饮食需求，为什么景区内或景区附近的餐饮住宿行业数量稀少呢？笔者猜测原因之一是因为核心景区离主城区有一定距离，而二者之间缺乏公共交通进行传送，当地居民首先就不愿过来创业。如公共交通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影响城市配套服务落后的因素之一。

（三）游客量下降带来的困境如何解决？

1. 大型旅行社：增加二消但发展自由受限

从 2019 年至今，白帝城旅游开发公司所经营的景区共关门三次，景区从关门到开门到正常营业之间需要 2-3 个月甚至半年的缓冲时间，所以开业并不等于旅游业进入恢复状态。

由于国家政策要求，以白帝城景区为例，门票从 120 元不断下调至 80 元，而由前文所述，门票又是景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如果景区想要创收，只能将重点转移至二次消费。但除观光车与饮用水等项目外，作为受政策限制的自然景观和本就有发展瓶颈的人文景观，二消内容几乎无所适从。现在的游客相比于以往的“后备箱经济”式游客消费（指到一个地方旅游会进行大量纪念品与特产的购买）显得更加“吝啬”。景区里主要的消费品为纪念币和文创雪糕，小巧精致、便于携带、价格低廉的特点让他们更容易销售。但是文创产品的内容却容易显得单调没有新意。通过访谈得知，文创产品的开发销售，除了故宫的系列文创外都是亏本经济。从产品设计到建立生产线都十分烧钱，而体量与知名度不如故宫一样大的景区，很难通过文创盈利，所以文创的创新同样处于瓶颈。

2. 小型旅行社与第三服务业的挣扎

奉节县内其他小型旅行社的生存现状艰难。笔者访谈到了在其他旅行社的工作人员 DYX，他们作为小型旅行社的生存空间十分狭窄，所以将竞争点向内投放在定制化旅游与主打贴心与关爱的老年旅行团上，以固定常客；向外则侧重申请旅游产品专利，以及与高铁沿线省份的旅行团进行合作。公共性卫生事件的爆发让旅游业行业低迷，电商行业兴起。而旅游业与农业正是奉节县的两大经济支柱，旅行社毫无生意，想要生存，只能来到农业。奉节县农产业的主要作物是脐橙，有旅行社运用自己在其他城市合作的旅游资源，通过售卖脐橙的形式获得收入。

由于坚持在旅游岗位的工作人员都相信在急性公共事件结束后，就会迎来旅游高峰，他们在封禁时也会进行尽可能的预备工作，比如有旅行社的负责人会在关门期间自行开车到其他城市与当地旅行团进行宣传与合作，提前做好宣传，准备随时有可能出现的游客潮。

由于来奉节的散客越来越多，旅游团越来越小，旅行社的旅游产品也要随之转向。除了减少开团数量，增加散客业务外，旅游地点也不局限于奉节县内，力图与巫溪、云阳两地组成联动路线，增加旅游吸引力。由于高铁站的开通，交通时间与金钱成本大大降低，县际间的旅游联动变得也更为便捷。

从旅游业三年间就业人数的变化上看，有相当一部分从业人员选择辞职另谋出路。另留下的员工，由公司或单位组织去深造学习，打造复合型人才。这期间他们的工资从旅游旺期的约 5 千元降到基本工资。据访谈，留下来的相当一部分职员一方面对家乡旅游业有一定热爱，另一方面他们坚信在寒冬期后，旅游业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都在等待时机以期盈利。

由于国企无法裁员，国营旅游公司员工在停业期间大多被调去卫生防控岗位做其他工作，其中有的员工因为工作内容发生改变，无法接受而选择离职，离职后的员工大多去从事滴滴司机、美团外卖一类的职业。而如餐饮、住宿业之中劳动密集型岗位的雇员，无法进行进一步培训。停业期间，基本采取“保留职位，做一休一，只发基本工资”的政策，虽然可进行兼职的时间增多，但这类人群往往不具备进行兼职的工作能力。

相比于中小微企业的挣扎，赤甲集团则拥有与奉节县政府一同前往河南省举办大型交换宣传活动的权利，这一活动会为奉节县整体带来客流量，但其中的绝大部分流量资源还是有可能以依托赤甲集团为主，对更需要帮助的小型旅行社来说，依然需要他们自己去“挖资源”。

3. 核心文化因素提炼困难，无法凝聚宣传重心

文化是旅游的属性，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功能(刘艳兰,2009)。旅游回归文化是旅游产业发展的高级阶段和高级形态(马波,王嘉青,2021)。奉节县文化产业的问题，不在于找不出宣传亮点，而在于历史文化底蕴过于厚重，核心文化 IP 难以提炼，摇摆不定，以至于一直难以将自己的招牌打牢。

关于奉节县的文化，访谈者提到“不是驾驭不住，是举个例子，一个人的五官长得都特别好看，但是放在一张脸上的话，整体反而就不好看了”。这种在深挖奉节文化过程中出现的危机感成为奉节县文化宣传的难题。根据前文所述，奉节县的历史文化底蕴相当丰厚，包括但不限于诗文化、三国文化、长江文化等等历史悠久的文化大 IP。通过访谈了解到，这种样样丰厚却无法融合和提炼的，不成体系的文化内涵，会根据当地领导想法的变化而变化。处于不断变化中的文化核心是无法有效宣传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已经抛出却难以解决，如何将多方面同样深厚且有价值的文化内容进行取舍并提炼，还能与当地旅游资源进行结合，是当前奉节文旅面临的难题。

而奉节旅游业在宣传上还存在手段单一的问题，没有利用当今的媒体平台增加自己的旅游知名度。通过收集资料，发现奉节对景区的宣传主要在县内，针对县外的宣传手段一是与高铁沿线城市举办推介活动进行宣传^①；二是通过与节目《中国诗词大会》的合作，以 15 秒广告、口播、滚动字幕条、独家片头呈现等方式进行宣传，执行价格为 1647 万元（2019 年）^②。手段比较单一刻板，随着各种新网络媒体的普及，宣传手段也应与时俱进。且高铁现已通车，宣传口径可以扩大到全国范围。

表 3 奉节县文旅平台点击量统计表（数据来源：奉节县文化与旅游发展委员会）

平台名称	发布量	浏览量（万）
奉节旅游公众号	104	19.38
奉节赤甲文旅微信视频号		460.41
奉节赤甲文旅抖音号	37	295.7
白帝城·瞿塘峡景区官网	701	4.75
白帝城·瞿塘峡景区公众号		15.28

笔者通过对奉节县电商中心和一些旅游博主与网红培训班成员的采访，发现通过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对旅游产品的宣传影响力很大，成本很小。本地有能力、有流量、对家乡有热爱情怀，以至于有意愿投入精力的旅游博主可以做到很好的宣传，但由于奉节的景点与县城有一定距离，且频繁出入景区取材，在门票上需要大量投入，博主往往不敢付出时间与资本前往，也不敢转行做全职的旅游博主。通过访谈与观察，一条十几秒或一分钟的视频就可以带来一定流量。若由政府与网红交流合作，承担门票，组织网红定期（约每个季节一次）前往

^① 《关于赴郑州开展文化旅游推介工作方案》（送审稿）奉节文旅委 130_ (07.03)

《奉节县“高铁时代”文化旅游宣传营销总体方案》（送审稿）奉节文旅委 131

^② 《2020 年 CCTV<中国诗词大会>（第五季）文化名胜特别呈现——奉节专案》奉节文旅委，奉节档案馆提供

景区取材,就可以持续输出宣传短视频。或者旅游开发与景区培训导游与工作人员尝试进军短视频领域,在自媒体平台都会有成本低、回报好的宣传成效。

4. 政策补贴难以落实

在发生公共卫生事件后,政府为受到影响的商户出台了一系列补贴政策^⑨。但是存在门槛高、难以落实的情况。如针对游乐场所的补贴政策中,“在全县范围内新增一处游乐场所,按游乐设施投入20%进行补助”,忽略了正在经营中且经营困难的娱乐商户。市场服务部在筛选可补贴的企业过程中发现,受疫情影响最严重且最难以维系生存的小微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反而最难满足补贴政策的门槛要求,导致财政资金无法落实。同样,关于缓缴社保的补贴政策,要求可以不按月缴费,但需要企业到年底结清,对各个企业来说帮助不大,因为公共性卫生事件对旅游业的影响是长期的,亏损的血液很难在一年之内恢复,这样的政策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通过访谈得知,各企业还是希望缓缴社保能拖延到企业经营情况有所恢复后再补缴,而非按年计算。

四、政策建议

要提出有利于发展的政策建议,需要先弄清游客具体的游览欲望。在旅游社会学的学科范畴中有着一定的成果讨论。发现游客更倾向于在旅游时体会到的真实感;强调在旅游时让多种感官有所体会,比如壮丽风景中的视觉、音乐节中的听觉、美食节中的味觉等;期待旅游这一行为与游客的日常产生明显区分,也就是想要“开开眼界”(Cohen & Scott,2019)。有了这样的研究,以下对旅游业的建设便有了一定的针对性。

(一) 迎合旅游真实感:合理开发的同时更是有效利用

该意见针对于上文中提到的组织架构打架的问题,通过对访谈对象的采访,笔者能感受到上位政策的“一刀切”限制对于景区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例如“三峡原乡”景区是旅游开发公司发现并修建,成为旅游景点的资源,花费了一定资金并被寄予厚望,突然被勒令关门不仅对景区与景区周围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对奉节县整体的旅游线路与发展构造都造成影响。建议旅游资源在申请进行景点化打造之前,就由上级评审,需要进行资源保护的区域提前划分,在投入精力建设前给予否定,以免浪费建设心力。

除了具体审核建议,该问题还暴露出管理结构的矛盾,国家级的景区保护要求与省市级的旅游开发需求造成的矛盾,需要决策者亲临现场探查,与中层下层个体深入交流,优化旅游资源的管理结构。

(二) 满足多种感官:视觉、味觉与体验感齐发力

除了努力放大夔门、三峡之巅等视觉性自然景观的特点,奉节本身还拥有味觉与体验性旅游资源可以挖掘。除了特产脐橙,笔者观察到奉节县在饮食上并没有过多特色,可以考虑打出特色招牌的同时,向着附近的美食之城重庆与成都的饮食系统靠拢,“蹭蹭热度”,比如利用“重庆火锅”的名声支撑一部分餐饮产业兴起。

奉节县的著名体验性景点是张艺谋设计的印象系列演出“归来三峡”,而该演绎也由于高成本、高票价和低客流逐渐停滞。如何再度重启,除了可以向其他印象系列演出借鉴经验外,笔者认为“归来三峡”演出场地周围也值得建设。该演出需要在晚间举行,演出地位于白帝城内部,离主县城较远,需要增加周围景区吸引力以增加游客的观影兴趣。在归来系列附近有着两个著名景点三峡之巅景区和白帝城·瞿塘峡景区,缺少可以解决三餐与休息场所

[9]参见《奉节县全域旅游发展奖励补助办法》,奉节府办发〔2021〕95号

《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恢复提振文旅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奉节府办发〔2020〕61号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推进旅游企业扩大复工复产有关事项的通知》,奉节文旅委,奉节档案馆提供

的餐饮业和基础设施，如何让游客们游玩的整天都被“塞满”，以至于能留到晚上是有待建设的一点。另一点是，建议增加景区之间以及景区与县城之间的公交系统建设，安全便利的交通系统是影响景区游客量的重要因素。

（三）旅游生活与日常的二分法

这一点针对于奉节县旅游的未来发展。笔者认为，可以尝试针对平原地区的游客经营“山城”招牌，建在山上的城市对于长期生活在平原的游客有一定吸引力，将由长江路过的游客吸引至县城内部游玩。另一点也是基于奉节县文化旅游产业“十四五规划”的规划，发展田园综合体与康养结合线路，将旅游的体验感向着“度假”感转变，拓展慢旅游资源。

（四）调整补贴门槛，准备迎接爆发式游客返潮

笔者认为，在旅游业现有矛盾尚未解决时，思考转型升级可能会将矛盾带去下一阶段。再加上如何度过公共事件带来的寒冬期，以及如何适应未来防疫常态化的社会变动是主要问题，旅游业中绝大部分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环境依旧艰难，政府补贴政策急需降低发放门槛，能够稳定适应社会的波动是进行旅游业改革创新的前提。这不仅是为了维持当地的经济运转，还为了在重大公共事件结束后，依然有能力应对突然爆发的“游客潮”。

参考文献

- 陈林.2020,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经济影响及应对经验——基于文献回顾视角[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0(04):20-29.DOI:10.19653/j.cnki.dbcjdxxb.2020.04.003.
- 崔凤军.2020, 新冠肺炎疫情对文旅产业的冲击与对策——兼论文旅产业的敏感性与脆弱性[J].台州学院学报,2020,42(01):1-5+48.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0.01.001.
- 蒋丽丽.2018, 旅游业发展影响因素及实证分析[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18(03):58-59.
- 李默涵,陈钢华.2022, 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旅游研究进展及学术贡献——基于 10 本英文期刊载文的分析[J/OL].旅游学刊:1-17[2022-10-18].DOI:10.19765/j.cnki.1002-5006.2022.00.019.
- 刘光岳.2016, 对影响我国旅游业发展主要因素的探析[J].北方经贸,2016(07):166-167.
- 刘淑英,宋丹璞.2022,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旅游业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J].科技和产业,2022,22(08):232-240.
- 刘艳兰.2009, 实景演艺: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的业态创新——以桂林阳朔《印象·刘三姐》为例[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9(08):105-106+111.
- 马波, 王嘉青.2021, 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旅游产业新走向 [J]. 旅游学刊, 2021, 36 (2): 1-3
- 明庆忠,赵建平.2020, 新冠肺炎疫情对旅游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学术探索,2020(03):124-131.
- 申军波,徐彤,陆明明,翟燕霞.2020, 疫情冲击下旅游业应对策略与后疫情时期发展趋势[J].宏观经济管理,2020(08):55-60.DOI:10.19709/j.cnki.11-3199/f.2020.08.011.
- 盛方富,李志萌.2020,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的冲击、传导及其应对——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J].企业经济,2020(03):12-20.DOI:10.13529/j.cnki.enterprise.economy.2020.03.002.
- 石培华,陆明明.2020, 疫情常态化防控与旅游业健康保障能力建设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对旅游业影响与对策研究的健康新视角与新变革[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1(06):55-67.DOI:10.14100/j.cnki.65-1039/g4.20200723.002.
- 王少华,王璐,王梦茵,王伟.2020, 新冠肺炎疫情对河南省旅游业的冲击表征及影响机理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20,39(02):1-7.
- 王新越,芦雪静,朱文亮.2020, 我国主要旅游城市旅游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与评价[J].经济地理,2020,40(05):198-209.DOI:10.15957/j.cnki.jjdl.2020.05.022.
- 魏小安,付磊.2003, 旅游业受“非典”影响情况分析及对几个相关问题的辨析[J].旅游学刊,2003(04):14-23.
- 夏杰长,丰晓旭.2020, 新冠肺炎疫情对旅游业的冲击与对策[J].中国流通经济,2020,34(03):3-10.DOI:10.14089/j.cnki.cn11-3664/f.2020.03.001.
- 夏杰长,毛丽娟,陈琳琳.2020, 外部冲击下旅游业的演化与变革——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1(06):43-54+2.DOI:10.14100/j.cnki.65-1039/g4.20200812.001.
- 杨勇.2008, 旅游资源与旅游业发展关系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07):22-27.

- 祝铠.2020,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四川旅游学院学报,2020(03):13-16.
- Brouder, P. & Saarinen, J., 2019, "Co-evolution and resilient regions: Moving towards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In J. Saarinen & A. M. Gill (Eds.), *Resilient destinations and tourism*, London: Routledge, 67-76.
- Cohen, Scott A., and Erik Cohen. 2019.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of Tourism."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2(2):153-72.
- George F. Deasy, Phyllis R. Griess. 1966, "Impact of a tourist facility on its hinterland".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56(2): 290 - 306.
- Jennifer Fitchett, Gijsbert Hoogendoorn., 2018, "An analysis of fact or affecting tourists' accounts of weather in South Afr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meteorology*, 62(12): 2161-2172.
- Juan Ignacio Pulido-Fernández, Pablo Juan Cárdenas-García, Juan Antonio Espinosa-Pulido. 2019, "Does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contribute to tourism growth? An analysis at the country level".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13(3):309-319.
- Romao, Joao. Nijkamp, Peter. 2019, "Impacts of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specialization on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on European regions".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2(10):1150-1169.
- Sharpley, R., 2005, "The tsunami and tourism: A comment",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4).

名为信仰的女性活动空间： 江村宗教活动概况

柯思羽*

提要：江村庙宇繁多，信仰氛围浓厚。本报告以民间信仰活动为主题，于2023年7月10日至7月19日进行了十天的田野调查，走访了江村东南西北四座主要庙宇与十四名相关村民，参与了“初一庙会”与教堂礼拜两次主要的宗教活动，以全面了解江村的民间信仰生活。研究发现，江村的宗教活动呈现出明显的性别特征，表现为仅女性参与、具有业余性质以及私人性质。这一现象的成因，除了传统宗教活动中的性别分工外，还包括女性借宗教活动赋予休闲空间正当性的诉求。

关键词：民间信仰 女性 宗教活动 江村

一、导言

江村（开弦弓村）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七都镇南靠震泽，北临太湖，与洞庭相望，港口和庙宇众多，古时又被称为庙港镇。据江村村民说，现在镇上（七都镇）能叫出名字的庙就有一千多座，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二十座庙，可见该地区庙宇之多，民间信仰之兴盛。从历史角度来看，吴江区早于三国时期就存在佛庙^①（冯月根,2013），明代传教士利玛窦也驻留过此地，清末太平天国也将此处作为重要据点，吴江的民间信仰由来已久，沉淀深厚。历史背景与现实情况共同描绘出一个信仰氛围浓厚的地区，信仰作为话题有了合理性。于是笔者以民间信仰为研究主题，于2023年7月10日至7月19日进行了十天的田野调查，走访了江村东南西北四座主要庙宇与十四名相关人员，参与了“初一庙会”与教堂礼拜两次宗教活动，大致了解了江村的宗教生活，发现江村的宗教活动与传统的南方宗教活动大有不同。因此，本报告决定以江村的信仰活动为对象，总结其特点，并探索现象形成的实质。

二、概况

开弦弓村的民间信仰主要为以佛教为基础的俗神信仰与基督（天主）教两派，两种信仰关系紧张，村民会因不同信仰排挤对方，且佛教徒（自称）处于优势方。两方有着各自的庙堂与活动且互斥，因此本部分分为俗神信仰与天主教概述。

（一）俗神信仰

江村共有七座庙庵，分别为东永宁庵、西永宁庵、福善庵、刘皇庙、口子灵佛庙、圆通庵和财神庙，由不同的村民小组管理^②，属于哪个小组的村民就去该小组地盘上的庙庵祭拜，而不是根据供奉的神灵不同，神灵的职能不同去不同的庙庵：

X：北庙，一般都去这个自己的小庙。

* 柯思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本科生。

^① 据唐陆广微撰《吴地记》载，孙吴赤乌年间（238~250），在吴江城区的三角井银杏广场建圣寿禅寺，这是吴江佛教史可考的最早寺庙。

^② 江村保留集体土地，划分为若干个村民小组管理若干个片区，类似于生产大队。

W：我们这里这么多（庙），不可以每座庙都要去的对吧？就是（去）自己这里的。
（图 1）

图 1 口子灵佛庙与东永宁庵



每个庙中供奉的神灵大同小异，基本为刘皇、观音菩萨、关帝和财神。此外还有灶神（只在家祭拜）、蚕神（物）、船（物）、阿太（地方神）、总管（地方神）、曹大人（地方神）、韦驮、土地公等神灵。其中刘皇是古时候的地方官，因为治理蝗灾，村民为感谢他立了生祠，后来演变成当地的地方神。可以看到俗神、佛教神、道教神共居一室，既拜佛也拜道，既拜人格神也拜物，但不管是什么神，都被称作菩萨。

当地有句俗语：“初一、月半，庙门开”，意指这两天人们要去庙里烧香，这是这里俗神信仰里的主要活动。笔者于 7 月 18 日（农历初一）观摩了东永宁庵与口子灵佛庙的庙会。庙庵约早上 4 点开门，4-5 名管理者到场，打扫除尘，摆放桌椅。5 点左右，赶完集的妇女陆陆续续前往各自小组的庙庵祭拜，一般用红色塑料袋装着祭品、一对蜡烛和一把香，先放祭品，再烧蜡烛，然后烧香和纸钱，插上香后再对着佛像合十拜拜。接下来，部分人会留下来聊天，管理者给她泡一杯熏豆茶，几个人就坐在神像面前开茶会。（图 2）

图 2 初一庙会时烧蜡烛、管理者泡白茶接待、众人拜完聊天



四名管理者十分好客，每一个前来烧香的妇女都会被邀请聊天喝茶，来烧香的妇女也会跟管理者打招呼，将带来的祭品（主要是茶叶）赠送给管理者。对远道而来的贵客，管理者会泡上锅巴茶^①，唱自编的颂歌，以示诚意。

访谈员：阿姨，你们泡茶是有什么讲究吗？您刚刚说给我们泡这个是比较客气的，有分等级的吗？

Y2：第一次来就是锅巴茶，熟一点的人就是茶叶（白茶），再次就是矿泉水。

^① 锅巴茶是用坛底（糯米锅巴）和糖冲开水，在春节及人生重大事件中待客饮用，寓意甜甜蜜蜜。

7点前后来的人最多，到8点基本没有人再前来烧香，不过还是有不少围坐在神像面前的妇女。她们往往聊到9点再离开，此时管理者也准备关门，直到下一次的初一十五才重新开庙。（图3）

图3 东永宁庵管理者唱祝福歌



除此之外，家内的祭灶也是每家每户一定会进行的活动（除了天主教徒）。灶神负责管理各家的灶火，作为一家的保护神。家中厨房灶头上砌上神龛，专供灶神像，并绘有吉祥图案。即使土灶已经被抽油烟机和电磁炉代替，村民也会留一间屋子专门保留土灶用于祭拜。同样是初一十五举行仪式：在灶神前点香和蜡烛，向灶神鞠躬，不烧纸钱，不摆供品。通过这些仪式来表达祈福、求平安等愿望。

X的丈夫：（土灶）现在也没怎么用，（但）拜灶的话我们都会在这里拜。那么就是那十五啊，或者是初一啊都可以拜拜的，人家说什么小孩子出门啊，求学啊，都要拜一拜，出去多拜拜。我们这边有这样的习惯的风俗，就是这个。你这个正好碰着这个初一，这时候我点几根香你拜一下，或者你出门的时候，你点几根香，放在灶上，你拜一下，也可以。（图4）

图4 土灶和祭台



其余还有祭祖、神灵生日、拜阿太（成人礼）等活动，但由于此类活动不属于日常生活的内容，因此暂不叙述。

（二）天主教

《开弦弓村志》记载 2010 年村内共有基督（天主）教徒 23 户，35 人（男 11 人，女 24 人）（《开弦弓村志》编纂小组，2015）。据江村天主教话事人 Y2 介绍，疫情前（2018）全村约有百人信仰天主教，但 2023 年后她只知道有十户人是天主教徒，而响应聚会一起做礼拜的只有 4-10 人。Y2 解释到由于江村没有教堂，天主教的主要阵地不在此处，所以江村信仰的人少，其他村的教徒会多一些。

访谈员：阿姨，我们这大概有多少户人信耶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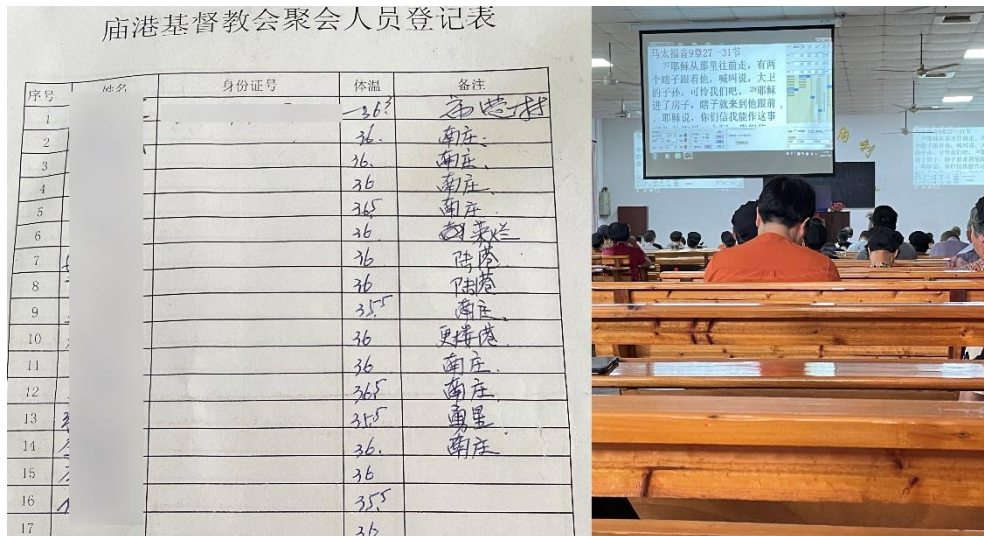
Y2：村里好多。以前多得不得了，现在你们老人都离开世界了，下一代他们不相信耶稣了，有的就嘴里相信，没有时间去做礼拜。

访谈员：我们平常周五来这里（家庭）聚会的大概有多少人？

Y2：以前，我们家里要十七八个，是本村的，现在都死了，下一代不来了，没有几个的，现在有的是四五个、五六个。

笔者于 7 月 16 日在庙港基督教堂（离江村 4.6 公里）的礼拜活动中进行观察，2/3 位置坐满（约有 120 人），25% 为男性，根据教堂的疫情防控登记表来看，绝大部分教徒来自南庄，证实了 Y2 回答，江村的教徒数量是特例，从七都镇来看，天主教徒虽然基数小但也有一定规模。（图 5）

图 5 教堂的疫情防控登记表和内部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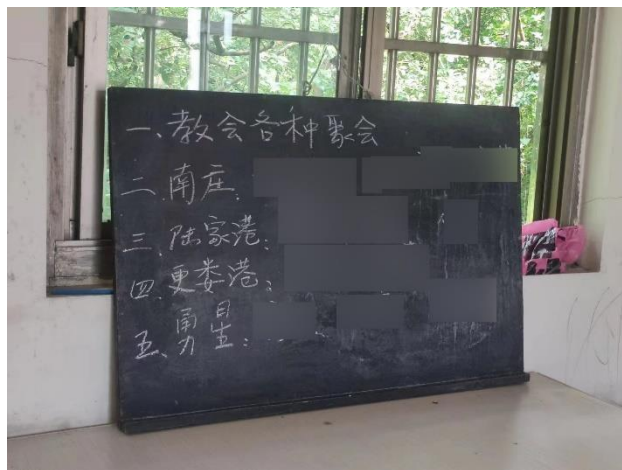


天主教徒的活动主要为每周日的礼拜和每周的家庭聚会。做礼拜主要到震泽镇教堂和庙港教堂，礼拜时间为中午 12 点到下午 2 点。T2 说到，她们一般是 3-5 姐妹结伴搭乘公交车前往，由于班次较少，一般需要通勤五十分钟。事实上，据观察，教堂门前搭起了专门的车棚，停放了约 100 辆电动车（特别是三轮电动车），所以，大部分教徒一般是骑车前往。

礼拜的内容为吴江区的传教士讲道，传教士用吴江方言讲述圣经，并采用乡土的比喻解释。台下信众基本分散落座，但女性结伴坐一起的情形较多。虽然没有交头接耳的现象，大部分人都在认真听讲，但也有部分人趴在桌子上睡觉。比邻教堂，有一间侧屋改造的教会学校，由于大部分教徒都是老人，他们往往会带孙辈一同前来，当自己在教堂中做礼拜时，小孩就可以安置在侧屋中，有一名教会成员给小孩讲圣经故事，教唱圣歌。从教堂负责人那里了解到，一般在小孩 6 岁后才带去教会学校，里面大概有 20-30 个孩子。

每周的家庭聚会基本在 Y2 家中开展。这一天江村所有的天主教徒都会前来，举办时间和地点往往会写在教堂里的黑板上，在周日做完礼拜后就会知晓，而聚会那天七都镇的基督教会还会派传教士来教授圣歌和讲道。从 Y2 与 T2 的讲述来看，她们更喜欢家庭聚会活动，因为由于信仰原因，茶会排斥她们加入，家庭聚会活动像是某种茶会的替代，让她们获得同样的生活形式。（图 6）

图 6 写着联系人的教会黑板



由于江村中的天主教徒人数过少，内部排他性强，难以获得详实的田野材料，所以本报告剔除了天主教群体，而以佛教徒的宗教活动为研究对象。

三、活动特点

（一）仅女性

从香客到寺庙管理层都是清一色的女性，当问及丈夫或儿子是否会随同参拜时，每一个受访者都矢口否定，表示“他们不懂这些”“他们没兴趣”“这是女人的活”，而对男性采访时，他们说“女性管理是习俗”“拜拜是婆婆妈妈的事”，明确表示出对此类信仰活动的拒绝以及理所当然该由女性参与。

T1: 男的不来，都是妇女。他就不是搞这个的，都是家庭主妇来。

Y: 我们这个地方就有这样一个习俗，反正搞这种东西都是女人去搞的，那都是女人，家里的家庭妇女是为主的。如果是一个男的呢，就好像做起来不合适，我们这个地方叫好像“反了”，就是有句话叫，船不是有个船头和船艄，船头向前的，但是呢，如果男人去拜拜的话呢，变成那个船艄向前的，就是反了。

家内祭灶时也全权交由女主人开展，即使赐福的对象并不是女主人，比如祝孩子考试顺利，丈夫出门平安等祝愿，也是由女主人进行仪式，而不是希望得到保佑的人；当家人生病时，也是女主人来进行驱灾仪式。

但参与的前提是对这些活动有所了解，江村有不少外嫁来的媳妇，并不清楚江村的信仰习俗，这时候一般由婆婆或丈夫教导。X 女士是他村外嫁来的，嫁来之前并无信仰，也不清楚如何祭拜。相反，X 女士的丈夫对这些十分了解，但他依然不会去烧香，也不会祭灶，而是教导妻子如何祭拜，然后由妻子负责。而当婆媳因信仰产生矛盾时（一个信基督一个信佛），男主人没有调解作用，似乎因为矛盾来到了信仰的领域，男主人在这里失去了权力与权威，

无法干预妻子与母亲的行为。

同时，笔者也了解到当地有不少女神信仰，比如“阿太神”，她是西太湖女神，每当孩子满月和成人时，都要进行拜阿太的仪式，以祈求福佑。另外还有观音菩萨、老太菩萨、曹夫人、土地奶奶等女性神灵。围绕观音菩萨还开展了一种叫做“观音会”的纯女性活动，在观音菩萨生日（二月十九）、成道日（六月十九）和出家日（九月十九）三天，成员上午先到主办人家喝茶，然后每人带好香烛到庙里烧香、点烛祭拜。中午回到主办人家中用餐，午餐全是素食（《开弦弓村志》编纂小组，2015）。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到，在江村，不管是现实层面的参与还是精神层面的归属，信仰生活空间的主导都为女性，并且与诸宗教对女性有明显歧视不同的是，江村的俗神信仰里有着女性偏向，比如物化的神多为女性（船、阿太），中性的神塑造成女性（观音），男性的神替代成女性（曹夫人、土地奶奶），神明的代言人（神婆，当地叫做借生人）几乎为女性，这样，整个俗神信仰的最高旨意为女性赋予了神圣性与宗教权力。具体到庙庵的管理，全由女性小组把控，在世俗层面强化了女性在宗教领域的地位。在代代传承下，最终形成了宗教活动成为女性专属的局面。

（一）业余性

1. 各种宗教的杂乱混搭

无论是佛教徒还是信仰地方神的村民，都称自己供奉的神灵为菩萨，问起信的是什么教时，也都确信地说是佛教。于是笔者前往村民推荐的“最大”“最正统”的佛庙老太庙（距江村约三公里）观察，希望得到该地佛教的进一步认识，结果发现该佛庙的布局充满业余性。如来佛祖与老太菩萨供在侧殿，地方神刘皇菩萨位于主殿；虽然都叫做菩萨，但刘皇和老太的神像明显着道袍，戴纶巾；用具上，既有写着藏文的蜡烛，也有印着“佛光注照，长生禄位”的佛道用语混搭灯牌。（图 7、8）

图 7 灯牌和藏文蜡烛



图 8 老太庙中的老太菩萨（中）



1. 缺乏神圣与世俗空间的划分

无论是口子灵佛庙那样一间平房大小的小庙，还是东永宁庵那样总占地约 2000 平方米的大庙，都会在内殿空地摆放桌椅，供香客喝茶聊天。因为桌椅就在佛前，来上香的村民要穿过开茶会的妇女，而聊天的妇女并不在意，于是就出现一方跪在蒲团上虔诚念诵，一方在一拳之隔谈天说笑的现象。这是令人十分费解的现象，在这里，寺庙并没有创造出一个神圣性的空间，或者说拜神上香等仪式不需要在神圣领域中完成，而是伴随着家长里短的闲话，发生在世俗空间中。

Z1：其他庙都有的。摆这些桌椅为了她们来拜完佛喝个茶，像这些茶叶也是我们村民自发的拿过来的，然后初一十五有人活动来烧香，他们就拿出来泡给她们吃。（图 9）

图 9 在神像前休憩喝茶的妇女们



（三）私有性

江村的庙虽多，但管理并不麻烦，因为每一座庙只有农历初一十五才开门，并且早上 9 点左右后就又重新关门。门钥匙在管理小组组员手上，管理员 Z2 提到，如果有哪户人家小孩要考试了，就专门跟她说一下，她帮忙打开门，除此以外庙庵都是关闭的。这样看来，江

村的庙庵不像是公共场所，更像是私人的，归属于管理者。从村委那里了解到这些庙庵确实不由村集体管理，庙庵的重建、修缮、活动举办都是由各庙管理小组筹划的，管理小组不知道村委有专门的部门管理村内宗教事务，村委也不知道管理小组都是哪些人。

有一些庙在管理的过程中完全变成私人的财产。Y 先生提到南面有座刘皇庙不对村民开放，只自己祭拜：

Y：南边有两个，一个属于私人的一个是集体的。

访谈员：私人的那个是什么？

Y：私人的也是属于刘皇庙。她因为供的东西太多了，她怕被人家眼红了，就把庙挪到了她家里去。

村民的上香习惯进一步体现出庙庵的私有性，他们只选择与自己同组的寺庙^①进行宗教活动，从未去过其他小组的寺庙，尽管那个寺庙离他家只有 1 公里，可见庙庵带有某一群体属性，只对同类人开放。从管理层也能看出这点，Z3 和 Z4 都是东永宁庵的管理者，因为某些事情，两人起了争执，此时其他的管理者一致支持 Z3，最终 Z4 离开了管理层。在问及为什么支持 Z3 而不是 Z4 时，管理者们回答：“Z3 是 1 组的人，北庙（东永宁庵）在 1 组，Z4 是 4 组的，有矛盾了我们还是向着 Z3。”向 Z2 询问为什么能当上口子灵佛庙管理者，她也同样回答：“我是 11 组的，东庙（口子灵佛庙）归 11 组管。”江村的庙庵大多都是按组分配管理，根据是否同组赋予权力，再一次可以看到庙庵的私有性质。同时，也是因为这样的管理制度，间接导致江村存在许多功能一致的庙庵。

四、活动实质

（一）家内宗教的拓展

江村的庙庵和宗教活动为什么会呈现出上述特点？笔者认为可以回归到江村的宗教本质寻找原因。没有神圣与世俗的二分，正是说明了这种俗神信仰并不是宗教，那么，它是什么？从私人化的管理和纯女性的参与的现象出发，本报告认为江村的宗教活动实质上是家内宗教活动的外扩，宗教活动空间从家庭扩大到村民小组，因此本来属于家庭女主人的空间成为了本组妇女的空间，只有女性参与是因为保留传统家庭事业里的性别分工。

当问起家中祭灶和去庙里上香的区别时，村民们很难给出明晰的答复，因此本报告没有直接的证明材料，但从侧面一样能发现两者的一致。首先从上香祈福的实际主体可以发现，老太庙中的祈福灯牌基本以“阖家”“阖府”为落款；各庙功德榜上登记的姓名都为男主人，因为“要保佑一家健康，（男主人）一家之主嘛，写其他的好像家里没有主人了。（W）”；过节时必须只能有一个人来，因为一人就代表一家，即宗教活动的主体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其次，反过来，因触碰禁忌或不敬受到的惩罚也是落在家庭上。再次，从实施目的上看，Z2 和 X 的描述的多个祭拜目的是一致的，但前者发生在寺庙里，后者发生在家中灶台上。最后，家中的神像经常会被拿去庙庵中，放在耳房里或是庙中大像旁，目的是使家中的小像更“灵”，不过两者可以放在一起，同时被供奉，也说明了两者在超越性的意义上是一致的。这四点都说明了在家外进行的祭拜，其主体、功能、地位与家内一致，可以被看作是家内宗教活动的延伸。（图 10）

^① 指该寺庙位于该村民所属的村民小组划分的土地上

图 10 写满男主人名字的功德榜和从家中带来的神像



（二）茶会的延续

上述可以解释只有女性参与和私有性的现象，但无法解释在外延的过程中，有着神圣空间（类似图腾般的土灶和独立安置的房间）的祭灶变成了可以佛前唠嗑喝茶的庙庵。观察发现，每次上香活动后的聊天与当地的茶会活动十分相似。茶会源于江村村民的吃茶习俗，经常有中老年妇女，借茶聚会，一边品茗，一边拉扯家常，有的也干些针线活。分手时又约定下次聚集的时间、地点（《开弦弓村志》编纂小组,2015）。同样是喝熏豆茶、拉家常，甚至是同样一拨人。可以这样解释，因为庙庵是家内宗教空间的外扩，所以庙庵的空间依然有家的属性，既然可以邀请朋友来家中开茶会，那么也可以与前来祭拜的香客唠嗑，佛前的聊天相当于某种茶会，自然可以进行。这样说来，庙庵被女性视作家中厨房的替身^①，厨房是部分女性展示其价值和存在的一个特殊空间，甚至也是她们独享的空间（刘文娜,2019），可以自由地进行休闲娱乐，比如开茶会。

（三）小结：给予女性休闲正当性的场所

那么，为何要在庙庵中开替代茶会？从部分男性村民的访谈中发现，他们对妻子开茶会的做法颇有微词。因为她们一开就是从早开到晚，早些时候还有农活时，妇女会因为茶会忘记干活，忘记带小孩。于是，当妇女借宗教的名头开茶会，从形式与实质上变得理直气壮了起来。前文写到江村女性在宗教事务里有着极高的地位，因此她们通过宗教活动的形式将自己的闲暇空间合理化，在形式上获得正当性。而与上香融合后的茶会时间也大大缩短，很少出现消磨一整天的情况，使茶会在实质上变得更合理。

Z3：就是这个（庙）是一个机会，一个妇女的活动，一个聊天的场所。所以为什么妇女更加愿意参插进来呢？就是没地方，这里可以聊聊天。现在有时间闲下来了，那么为了这个时间能够发挥作用，也能够保佑我家里平安健康，那何乐不为呢？

五、总结

通过宗教活动达成休闲活动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明清时期，妇女可以借口参加具有宗教色彩的种种活动，以满足她们外出参加娱乐性活动的愿望。比如河南新乡三月十八日城隍庙会时，“城乡妇女烧香者众，有肩铁索者曰‘代重’”；浙江乌程“村庄流俗，以佛经插入劝

^① 在对 Y2 的入户采访时她正在开茶会，而茶会地点也是在厨房。由于女性不上桌，厨房是一个独立的较大的空间，里面摆有额外的桌椅，有的村民家还有电视，就像一个小客厅。

世文俗语，什五群集相倡，私名曰宣卷，盖白莲之余习也。村姬更相为主”（赵世瑜,2003）。古代，在“敬鬼神”的社会氛围下，女性巧妙地利用宗教活动获得正当性的自由。当下亦是如此，如果妇女非常愿意接受宗教，归根到底是因为宗教满足了一种深深的需要(西蒙·波伏娃,1988)。女性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权力难以获得时，只能借助宗教，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来到神圣的空间，成为众人认可的权威，从而获得宗教领域的话语权，以此抗衡。

以上是本次田野的总结报告，本报告仅是对江村的民间信仰活动进行概述，并以性别视角选取部分现象描述与分析。江村的民间信仰活动繁多，还有许多现象值得被独立讨论，比如天主教与民间信仰的争斗与妥协，官方与民间宗教事务管理的问题，家庭作为主体导致的文化断层以及年轻一代弥散性的宗教意识。待日后有机会再对其他观察到的现象进行探索与分析。

参考文献

- 《开弦弓村志》编纂小组，2015，《开弦弓村志》，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第354-367页。
- 冯月根，2013，《吴江民间信仰述考》，香港，香港四季出版有限公司，第10页。
- 刘文娜，2019，《教会厨房：女性信仰空间的生成研究》，《宗教学研究》，第二期。
- 西蒙·波伏娃，1988，《女人是什么》，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第427页。
- 赵世瑜，2002，《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91-292页。
- 郑振满、陈春声，2003，《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第124—128页。

党建 |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研讨会”成功举办

2023年10月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老年学与社区研究中心主办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研讨会”在房山区西潞街道苏庄三里社区党建活动中心成功举办。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执行院长、老年学与社区研究中心主任赵一红教授主持和点评。房山区西潞街道武装部部长郝爽，房山区西潞街道苏庄三里社区书记邵雪松，中国社区发展协会副会长、北京城市副中心治理研究院院长、教授、老年学与社区研究中心副主任汪碧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副院长、副教授、老年学与社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副教授、老年学与社区研究中心成员庞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老师、老年学与社区研究中心助理白雪松，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老师、老年学与社区研究中心成员郑玲，苏庄三里社区副书记、党委副书记刘艳辉，苏庄三里社区党委组织委员张晓杰，苏庄三里社区刘宜萍、臧小洁共同出席了本次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执行院长、老年学与社区研究中心主任赵一红教授主持和点评。

中国社区发展协会副会长，北京城市副中心治理研究院院长，老年学与社区研究中心副主任汪碧刚教授作题为《首都治理体系背景下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主旨报告。汪教授从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基层治理创新、首都接诉即办倒逼基层治理向主动治理深化、中央社会工作部打开基层治理新局

面，以及构建“一核多元、融合共治”的社区治理体系几个方面作了分享。汪教授指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要坚持党建引领、重心下移、科技赋能，服务是最好的基层治理。

随后，房山区西潞街道苏庄三里社区邵雪松书记作主旨发言。邵书记重点介绍了苏庄三里社区的基本情况，指出苏庄三里社区党委坚持不断强化政治能力和组织力，坚持党建引领，不断强党性践行动，构建和培育多元的协同治理体系，积极开展域网式工作法党建品牌的培育和“好邻居议事协商”社区治理创新平台，实现了社区党建的新发展和社区治理新突破的双重的目标。社区把网格作为社区治理的基本单元，将所有的事项全部纳入到网格管理体系，将社区整体划分为五个大网格，五名党委委员分别担任大网格的网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分为十五个微网格，由社区党员干部楼门长担任网格员，真正实现社区网格的全覆盖。网格员深入网格内的居民，及时了解生产生活中存在着各种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副教授，老年学与社区研究中心成员庞志从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意义、存在的问题、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相关建议三个方面做了主题发言。庞老师指出，治国理政，重在基层。这对当下我们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践行好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内在要求。

最后双方就苏庄三里社区的“人才队伍建设，政治站位提高，社工专业能力提升，心理健康疏导”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研讨会”在与会专家、参与人员的热烈交流落下帷幕，取得圆满成功。

我院本科生参加“乡村振兴与行行重行行”纪念费孝通先生《小城镇大问题》发表40周年研讨会分论坛

由中国社会学会、社会变迁研究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策略研究院等协办的“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暨纪念费孝通先生《小城镇大问题》发表40周年研讨会”于9月23日在江苏吴江召开。我院2021级四位本科生受邀参会。



本科生分论坛上还有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上海大学、云南大学以及南开大学的二十余名社会学本科生。同学们一方面聆听了学界知名专家学者在论坛上高屋建瓴的发言，另一方面在本科生分论坛上以文与会，交流思想与田野调查体会，增进了学术友谊，开阔了研究视角。下面是我院四位同学的参会发言。

方菲同学的发言主题围绕着江村的市集，通过阐明市集的改造工程以及各方意见，从市镇社会学的视角对江村的新旧市集进行对比分析，提炼出了“谁的市集”这一主题与疑问，同时总结出在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应该遵循费老思想，深入实地进行调研后抓住发展核心的观点。

柯思羽同学的发言主题围绕着江村的宗教活动展开。通过对江村民间信仰活动的观察和对庙庵管理者的访谈，发现江村的宗教活动呈现出明显的性别特征，表现为仅女性参与、具有业余性质以及私人性质。这一现象的成因，除了传统宗教活动中的性别分工外，还包括女性借宗教活动赋予休闲空间正当性的诉求。

刘媛珊同学发言的主题为“民间信仰对农村社会整合的影响”，基于费老在《江村经济》中描述的江村宗教，通过阐述江村的民间信仰氛围、信仰活动，以比较的视角分析民间信仰群体与基督教群体在家庭分工、代际传递和群体排他性几个方面的特点，由此总结民间信仰对农村社会整合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孟韵妍同学的发言以江村土地流转案例入手，通过分析当地村民对于土地流转的不同意见分析农民对于土地产权的观念，提出农民流转土地的心态背后有对国家权威的想象和土地制度性的影响，同时提出政府等方面要理解农民对土地的依恋心态，构建农民与政府间长期持续健康的土地利用模式。

学术论坛为本科生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学术交流平台，在提高本科生学术水平、培养卓越创新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暑假我院多位学子参与南开社会学年会并做发言报告，通过参与学术共同体交流，开阔了学术视野，提升了研究能力。在未来，我院将继续鼓励支持同学们参与学术论坛和各类学术交流活动，砥砺思想、勇于创新，不断提升学术科研创新能力。

田野课堂总结 | 社会与民族学院成功举办社会学专业实践暨田野课堂建设经验交流会

2023年暑假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2021级本科生在指导老师和研究生带领下，分赴山东邹平、江苏吴江、浙江海宁等地，分别开展了为期十天的暑期专业实践暨田野课堂活动，同学们在期间走村入户、访谈村民、村干部、企业主和经营户，在田野中调研，践行研究型学习方法。为了更好地呈现2023年暑期专业实践暨田野课堂的调研成果，并就田野课堂建设中的经验和问题进行交流，10月15日下午，我院2023年社会学专业实践暨田野课堂建设经验交流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良乡校区笃学讲堂举办。来自校内外的十余位领导和专家与同学们一起，就田野课堂建设交流经

验并开展深入研讨。



交流会的第一个环节是领导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王新清首先向参会的各位领导与专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各位同学取得的田野调查成果表示祝贺。他指出，注重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做好调查研究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前提。王校长回顾了老一辈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和陆学艺先生注重调查研究的治学风范，指出社科院社会学所和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都有“从实求知”的学风传统，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为党和国家决策提供第一手真实可靠材料方面具有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王校长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实验室在社会，社会调查是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研究工作者应该娴熟的基本功。实践育人是思政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抓手。“田野课堂”这种教学形式促使学生走出课堂、走向田野、走进社区、农村和企业等社会生活场景，融入社会生产生活实践，见证时代发展变化，能够更好地获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感受。社科院大学将会继续支持社会与民族学院田野课堂建设，并鼓励推广这种实践育人创新模式，为把同学们培养成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材而不懈努力。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指出，田野课堂的定位不是访学，也不是观学，而是研学，要真正“进入田野”，就需要多次去田野，并将其作为对象世界而持续研究，从他者转化为其中的一部分，深入其深层结构。张院长指出，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和《云南三村》中所刻画的乡土社会，已经被中国式现代化所改写。现在的村落社会是一个与中国传统社会相比而被市场、政府与社会所打造的全新社会，而且还是一个迅速变迁的社会。这使社会学人能够在这个压缩的时空结构中亲身参与体验与观察其变迁过程，研究其过程性特质。应该说，实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老百姓的首创精神与生产生活探索是我们最好的理论建构之源。读懂社会这个文本与读懂经典理论的文本同样重要。他鼓励同学们与社会紧密结合起来，加深自身的社会学的修养。同学们要提前布局自己的学术生涯，在调研方法方面多加钻研，要善于将他人知识转换为自我的内在理论逻辑，并用行之有效的方法分析我们的对象世界。要做好田野课堂的培养，避免出现“学社会学的却进入不了田野”的问题的发生。老师只能将大家带进田野的空间。但要让田野转化为自己能够学理进入的田野，才能学有所成。另外，还要在进入田野之前做好充分准备，将社会学研究方法和社会学理论结合起来，较快进入那个叫做“自己的田野”。同样一个田野，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获得。希望大家今天好好总结，为下一次进入田野做好学理准备。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院长陈光金老师表示，田野课堂的举办和召开田野课堂成果汇报和经验交流会非常有意义，这是社会与民族学院首次以团队建制的方式开展田野课堂实践教学，今后要坚持下去，将其设为人才培养的“制式环节”。陈院长强调，作为“三大课堂”之一的田野课堂，其重点不在于提升多少学术水平，而是引导同学们对社会现实的追问与思考，期待同学们通过田野课堂，更加关注社会现实，从稚嫩的幼苗成长为大树，成长为国之栋梁。陈院长也从学术成长的角度为同学们今后在实践与治学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等给出了切实的指导建议，比如要从关注身边单一的田野，到看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多样性的田野，去追问为什么不同，寻找背后的道理，从经验性的田野到学理性的田野，从静态的知识传承到动态的社会实践，学会描述社会，理解社会，提升参与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实践进程的能力。



交流会的第二环节由带队教师和各组组长汇报发言。李原老师主持这部分的师

生汇报环节。带队教师代表刘亚秋、朱涛、赵亮员老师先后上台发言，充分肯定了此次田野调查中同学们的表现，并结合带教体会，从田野课堂组织实施、田野课堂定位、实践效果评价、改进方向和建议等方面进行了发言交流。各组组长黄蕊、柯思羽、张振国、高禀超、吴奕帅同学分别结合自己的实地调研做了主题汇报。

邹平组黄蕊同学以《党建引领乡村发展》为题发言，结合在长山镇东尉村和青阳镇钟家村的实地调研，探索了关于农村老龄化、空心化、传统农业与本土代际割裂等问题和改进之道。

吴江组柯思羽同学以《土地、集市、信仰：江村八十年后》为题发言，介绍了此次调研的研究设计，以民间信仰组为例展现了此次活动的具体过程，最后展示了活动的丰硕成果。

海宁组张振国同学以《感受潮乡文化，研习富民产业》为题发言，展示了同学们开展的志愿活动和调研情况，表示同学们借田野课堂看到了课堂和书本中的社会学知识的真实体现，也从乡土中生长出了属于自己的问题和关怀。

参与CSS调查的吴奕帅同学以《行者常至，为者常成》为题发言，借《城市社区物业纠纷中的角色互动与博弈》分享了自己的田野工作小结，并表示自己将“愿为民安乐，策马再力竭”。

辽宁兴城组的高禀超同学以《凝望古城——辽宁兴城田野工作小结》为题，围绕兴城古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开展调研，并针对古城保护的具体问题展开深入思考。

交流会的第三环节是专家点评及经验交流环节，由赵一红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刘能教授分享了北大社会学近年田野课堂开展的经验，并谈到自己对从“跟自家导师调研”到“团队调研”的转变的理解和思考。他指出，田野调查的关键在于“占有”。对田野资料的占有，如果只在导师身边旁听是会有欠缺的，必须亲自实践。研究不只是理性的过程，也是情感和伦理的过程，不是书本中的别人的东西，而

是活生生体会到的案例、“我自己”的案例，只有下到田野才能收获自己的东西。同时，刘老师也宽慰同学们不用焦虑，作为才入行一两年的社会学新人，初次田野只是“试试”调查，需要多次重访和长时间的停留。

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院部主任唐军教授忆及参与 2021 年社科大社会学本科生培养方案论证的过程，肯定了社科大社民学院从田野课堂的动员、计划、实施、效果评价等各个环节形成了完整闭环，这类培养活动对于提升学生调查能力和学术功底大有裨益。他提出要结合育人特色和专业气质来思考田野课堂的定位和设计，以及本硕博贯通培养的需要。唐主任还建议在城镇化水平逐渐提高的将来，城市社区的田野也是未来的重要方向，就此他分享了北工大在“接诉即办”领域开展教学研究协同育人的经验和做法。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李丁副教授结合自身在北大的求学经历和人大的任职经历，以及近年带教人民大学田野课堂的体会，介绍了人大和北大相关的田野课堂体制机制和历史传承，并期待各高校社会学专业共同做大做强社会学的田野课堂。李丁老师指出，人大的田野课堂理念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田野调研报告不是田野课堂最重要的产品，参与田野调查的同学们才是。许多学生们对社会学学习印象最深刻的往往就是读书期间的田野经历。李丁老师以人大近年田野课堂实践育人的具体做法为例，强调社会学界要共同支持、赋能、使用、信赖、规划和引导学生，让学生学会做人，做社会人，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李老师还探讨了田野课堂相关组织传承和持续发展的可行之道。谈到，以往的田野课堂更多是学生在田野里的“野蛮生长”，但这已经不适合今天社会学发展的需要，如今的社会学人才培养更需要成建制的训练。此外，人才培养也不只是收集分析资料写报告，关注认知能力，而是要让学生更多面临真实的社会情境，全面发展，提升非认知能力，学会如何去做人，学会做社会人，能够以自身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进入田野。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院长李国武教授分享了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专业

在实践教学方面的探索和经验，如品味基本知识的常规课堂，寻味研究魅力的学术课堂（讲座/读书会等），体味社会世界的田野课堂“三味课堂”体系设计。李老师对社科大社会学专业的田野活动给予充分肯定，同时探讨了作为制度化的田野课堂如何可持续规划化组织的问题，并针对如何让学生更好在田野课堂中成长，提出了诸多中肯切实的建议。比如在田野课堂中要尽快明确调查主题，进行聚焦的调查和纵深式的信息收集，深入挖掘田野内涵等。李老师同样劝勉同学们不用心急，成长需要过程，在田野中不要光见物，也要见人见事，慢慢进步。

会议最后，赵一红院长作会议总结。她认为，此次田野课堂建设经验交流会是一次真切有效的大会，各领导和专家畅所欲言，交流了经验，启发了思路。下一步学院将根据本次会议上领导专家和师生们提到的意见建议，总结经验，改进不足，完善后续田野课堂的设计，提升实践育人成效，为培养卓越研究型人才提供支撑。

研创计划 |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学术论坛“首届民族地区现代化 与乡村振兴研究生论坛”成功举办

研创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术论坛“首届民族地区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研究生论坛于 2023 年 9 月 16 日在腾讯视频会议顺利举办。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主办，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科研处支持，民族地区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研究生论坛组委会承办。

论坛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民族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丁赛研究员致辞。丁赛研究员对此次论坛的成功召开表示祝贺，并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给大家提供交流平台。丁赛研究员提到对于年轻学子而言，参与学术论坛是难得的

机会，在求学阶段，不仅要学好知识，提升研究能力，在学术界参加各类会议进行多项沟通交流、亲自参与组织学术论坛也是需要培养的重要能力，这次学术论坛的成功举办对于参会学子和会务组成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论坛旨在为青年学者和在读学子搭建深入交流沟通平台，进一步提高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此次研究生论坛召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内蒙古大学、云南大学等多所高校的15位研究生参与，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丰晓旭老师、刘诗谣老师以及石河子大学的叶小琴老师进行学者总结。论坛议题涉及新时代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路径及特色研究、社会治理与民族地区现代化、民族文化赋能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每组发言人与评议人都准备充分，认真发言并提出问题，学者总结从投稿角度出发，提出修改建议，参加论坛的研究生获益匪浅，多位研究生在论坛结束后与总结学者就具体问题进行深入交流探讨，使本次研究生论坛的交流沟通效能最大化。

研创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术论坛首届“民族地区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研究生论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科研处等部门相关负责老师的指导与帮助下，以及全体参会学者、研究生、会务组同学的共同努力下取得圆满成功。此次论坛的成功举办，为广大学子开阔学术视野与启发科研灵感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迎新 | 开学季社会与民族学院喜迎新生

2023年开学季，社会与民族学院喜迎30名本科新生和111名硕博新生。新的学期，也是新的起点，满“新”欢喜，如约而至。

8月26日是社会学本科新生报到的日子。早在新生报到的前一天，来自三个年级的本科同学们就已经开始准备迎新所需的各种物料。每个新同学都有一张学姐学长手写寄语的明信片，不同尺码的院衫也已经分类摆好，方便领取。

迎新志愿者们起了个大早，早上七点多就陆续来到图书馆前广场的摊位，迎接新同学到来。



上午迎新活动结束后，学院邀请全体新生家长召开了一次家长见面会。学院老师欢迎新生家长的到来，感谢家长对学校的信任，并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向家长介绍了学院的情况。之后，学院领导、班主任、辅导员走访了所有新生宿舍，并与新生亲切交谈。



9月5日社会与民族学院迎来了社会学、民族学、社会工作、人类学、民俗学、社会治理、社会政策、马克思主义民

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史共计 111 位 2023 级硕博新同学，其中社工硕士 52 名，学术型硕士 26 名，博士 33 名。他们即将开启在小院的社科新生活。

新生报到期间，副校长、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王新清，副校长张树辉来到迎新现场，与 2023 级新生亲切交谈，并对迎新工作人员的付出表示肯定。



随着时间推进，新生陆续抵达，在志愿者的引导下，有条不紊地完成报到程序，交材料、领取学生卡以及学院文化衫、纪念品等。大家都洋溢着幸福和喜悦，在签字墙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并期待即将到来的小院时光。



在这个新的起点上，脚下路还漫长，希望新同学们努力向前，与学院一道成长，一起走过今后充满无限可能的生活！

我院学子在高校社会学专业赛事中初试锋芒

2023 年 6 月 10 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建院 20 周年系列活动之“强东杯”第十三届高校社会学知识竞赛全国邀请赛顺利举办。全国 28 所高校代表队齐聚在中国人民大学，共同参

与这次全国社会学学子的盛会。

我校代表队首次参与该项赛事，由社会与民族学院赵亮员老师带队，三位队员分别是社会学 20 级本科生林欣然、21 级本科生黄蕊和 21 级本科生柯思羽。学生代表 21 级本科生刘媛珊和参赛队伍一同前往参赛。

初赛在 6 月 10 日上午举行，经过紧张的答题，我校代表队成功入围复赛。在复赛中，我校代表队惜败于东南大学，未能进入决赛。经过多轮激烈比拼，我校代表队最终获得优秀奖。



参与本次比赛，队员们收获满满，不仅感受到了知识碰撞的喜悦，也丰富了自己的经历和见闻。

2023 年 11 月 5 日下午 13:30，由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中央财经大学教务处主办，上海萌泰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赞助的“萌泰·锐研杯”第四届京津冀高校社会调查微视频大赛决赛于中央财经大学学院南路校区学术会堂 202 如期举行。

由我院李原老师指导，21 级社会学本科生田左图、罗佳琦、谢禾逸组成的调研小组“东尉小分队”带着他们的微视频作品《乡村振兴的邹平经验——基于山东省邹平市东尉村的实地调研》参与该项赛事。

大赛的主题是“识国情，练新功”，鼓励青年学生运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和数字技术，以视频形式记录和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成就，在实践中涨知识、增才干，提高服务国家和社会的本领。

在决赛环节，各队伍按照抽签顺序进行比赛，先播放视频短片，随后由学生代表结合调查主题进行3分钟演讲。评委会对每个微视频作品从思想政治导向、选题与内容、社会调查方法运用、视频制作技术、PPT宣讲五个方面进行评分（百分制）。

在播放视频和演讲环节，我院学子组成的“东厨小分队”充分展现了调研的成果与收获。作品关注乡村现代化事业的发展，用社会学的调研方法和朴实的镜头让我们看到了沧桑巨变的东厨村，领略到了新时代的农村风采。



经过紧张的计分和督分，东厨小分队最终获得优秀奖，为他们的努力和积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也为我院学生参与社会学专业微视频类赛事写下了新的起点。



精彩讲座：

景天魁老师 | 论群学品格

2023年4月14日下午3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景天魁教授做客社会与民

族学院笃学讲堂，为同学们带来了题为“论群学品格”的经典研究讲座。本次讲座由社会与民族学院赵一红老师主持，于线上进行。



景教授在讲座开头提出了一个问题：社会学作为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学科，它能在社会中发挥什么作用？该如何建设这个学科，才能对社会起到更积极的作用？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这一次讲座的题目中有一个“品格”，这一种表述一般是用于形容一个人的，但在这里用于形容发源于中国本土的社会学脉络——群学。它起源于战国时荀子的学说，是一门为了人民的学问，它的品格就是人民性。今天景老师将从唐宋时期群学的发展，呈现出群学的品格。为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带来启发。

唐宋时期，礼制下移，群学也随之民间化、大众化，相比于先秦时期的精英文化是一场深刻的变革。群学民间化是其发展的历史高峰，是其归于本位、铸就本性、彰显本色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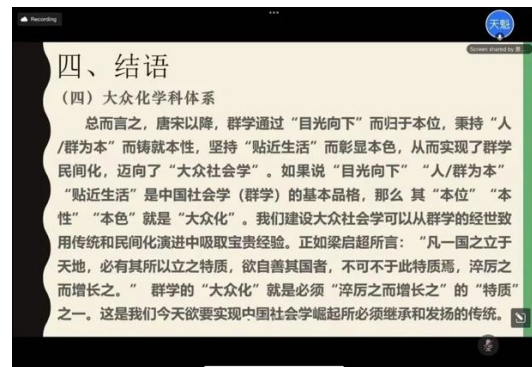
唐宋群学民间化的第一个特征是目光向下。这段时间朝廷开始向民间推广礼制，士人开始“教民”，“礼下于庶人”。同时，为了减少礼仪带来的负担，朱熹等人还将礼制简化，减少开支，让礼制变为民间性的习俗，融入日常生活。第三，随着科举发达，知识、教育也下沉到基层，形成了士人社会，也形成了有担当、有抱负的士人群体。在新士人产生的背景下，群学自然回到了它本应回到位置，即衷情于人民群众。唐宋时期民间产生的诸多家训、

族规、乡约等等，以及小说话本等民间艺术，都是群学民间化的生动写照。

目光向下，自然让群学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时的群学不再以君为本，以神为本，而是以民为本，以人、群为本。这里的人与神的关系和西方宗教有很大区别，只是着眼于人的地位、群的地位，这是在天、地、人的关系中决定的。因此，中国存在着承担各种职能的诸多神明，同时人在宗教信仰中的选择也更自由，人的地位更高。天和人的关系也同样，君主的权威遭到质疑，同时民间话本也鲜明地出现了主张反对礼教道学的故事情节。在物与人的关系上，群学首先将目光放在了人本身，而不是直接冷冰冰地将物作为对象，让观察的视角带上了人化的色彩，而不是将人的关系当作物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人与群的关系：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人始终带有“附有宗教意味的关怀大群的热忱”，个人始终是“大群”中的个人，群已由此达到统一，这就是中华民族繁衍壮大的原因。即使西方社会学传入后群学不再在学术上占据主导，但它合群、能群、乐群、善群的精义已经在中国民间社会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在具体的层面上，唐宋的群学贴近生活。士人重视农桑，重视家庭，主张济贫均富；他们自己也来自贫民社会，而不是贵族社会、门阀社会。最后景教授总结：大众化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关键问题，而群学的发展历程就能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我们要建立大众社会学，这并非与“小众社会学”相排斥，二者要相互学习，相互补充，最后的目的仍然在于让社会学变成大众化的知识，这是学术发展的基本规律。社会学人应该深入基层，深入民众生活，开展调查，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建设社会学学科。同时还要让社会学的知识采取更为大众化的表达形式，在多个领域融会贯通，让其成为大众接受的知识。想要实现中国社会

学的崛起，就必须重拾这些群学的大众化特质。



王思斌老师 | 中国式现代化新进程中社会工作的新本土化——一个基于现实的理性思考

2023年4月17日下午2点，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思斌应邀做客于我院社会工作学术讲堂，开展了题为“中国式现代化新进程中社会工作的新本土化——一个基于现实的理性思考”的专题讲座。讲座由我院执行院长赵一红教授主持，22级全体社会工作硕士参加。

王老师以当初筹建社会工作学科的自身经历为切入点，将我国社会工作教育的一路发展徐徐道来，引出今天讲座主题的提出背景：即今天我们是基于什么样的时代背景和发展阶段来谈“社会工作的新本土化”这一问题，重点在“新”字。他从社会工作教育“内卷化”及其发展、社会工作教育同专业机构实践之间的关系、社会工作新领域的扩展、农村和城市基层对发展社会工作的现实需求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等方面生动详实地回答了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强调“社会工作新本土化”的问题。



王老师说，社会工作的发展要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中国社会工作重建的特殊道路是在党的领导、政府主导及专业引领下，从各地实践中走出来的。我们的国情和发展路径与西方国家不同，社会工作重建和发展背后所反映的是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社关系，教育界和政府赋予社会工作发展的期望和要求也是不同的。因此，在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中，平衡“专业理性”和“稳妥理性”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关键的。

王老师用社会工作的“次结构性”和“建构性”这一对概念生动说明了我国社会工作在制度结构和政府系统中所处的位置特性，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力量”是受到制约的，在组织化、资金获得、实践场域等方面都受到行政力量的重大影响，但是社会工作的专业特征、专业优势又使其具有建构性，让其可以在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王老师以北京大学社会工作学科发展的实际案例为大家进一步讲解了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重要性。社会工作作为引进的学科，如果不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是很难发挥其专业作用的，但是在本土化的过程中，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同样重要，在实际开展服务的过程中，是社会工作本土化和专业化的双重承载。王老师指出，学科专业的本土化，应当是基于社会场域和学者生活（具身性）的专业选择。

随后，王老师讲述了创新性概念“新本土化”的概念释义和诞生的时代背景，以及社会工作新本土化的时代要求。新本土化不只是教育系统，也包括专业实

务系统、知识和服务模式、在社会工作与经济社会人文环境关系意义等方面的本土化。要在更宽的领域、更深的层次、更全面地来了解现实，用综融的社会工作方法来解决问题。

王老师总结到，新本土化是比初步本土化更加复杂的问题，它要处理专业与非专业，专业与外部结构的关系；它是社会工作的进阶发展，是新时期社会工作发展的重点。新本土化的核心是发展——在核心问题上的知识扩展、服务系统的了解与合规参与、服务能力发展、合作（嵌合）能力发展、资源动员（及链接-管理-服务-运作）能力发展。而现在中国式现代化呼唤社会工作的新本土化。

最后，王老师表示在当今时代，社会工作未来的发展大有可为，许多老师、同仁也都对社会工作的发展做出了许多努力，各高校在未来的社工教育中也要更多地接触实践，不是“水泼地皮湿”，而是要真正了解一个地方的真实情况，做国家真正需要的事情；也希望同学们丰富社会阅历，将社会阅历与课堂知识相结合，这对于开展社会工作是极有益处的。

刘亚秋老师 | 口述史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法

2023年4月21日下午2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社区发展研究室副主任刘亚秋老师做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笃学讲堂第33讲，为同学们带来了题为“口述史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法”的专题研究方法讲座。本次讲座由社会与民族学院刘月老师主持。

讲座开始，刘老师指出，广义上的口述史在人类社会中有着漫长的历史，人类最初的口述传说也可以说是“口述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些重要历史作品的书写都使用了大量的口述史意义上的资料，但随着近代科学史观的兴起，口述史料在历史学领域越来越被边缘化。但刘老师认为，口述史有文献史料所很难

达到的深度，这便是通过个人的讲述以及个体生命体验来透视整个历史。



到 20 世纪中叶，口述史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1948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阿兰·内文斯(Allan Nevins)建立了口述历史研究室，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现代口述史作为独立学科领域的建立，在很大意义上并不是为了让口述史料仅仅作为文献史料的补充，而是着重记录个人和群体对某个历史时刻的回忆及其生命史。在研究方面，凸显个人生命史并兼具记忆主观性的口述史，与强调历史客观性的现代史学存在某种意义上的抵牾。以现代科学史观的标准来看，口述史料的可靠性仍然无法得到保障。如何处理“情感真实”而“史实有纰漏”的材料，对于口述史来说还是一个难题。针对口述史料面临的困境，刘老师认为，在伦理角度，要尊重被访谈者的情感，做到不伤害被访谈者的尊严和隐私；在研究层面，尊重我们获得的资料，做到最大限度的求真。

对口述史料的分析可以有三个框架：“治疗的框架”，主要用于临床；“法律的框架”，主要用于司法；社会科学研究的框架则是“社会调查范式”，它注重主体之间的互动，强调口述史料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

刘老师还从记忆和叙事两个角度对涉及口述史料的理论做了进一步阐发。叙述分析是社会科学常用的方法，在口述史料的分析中也被广泛采用；而记忆研究视角下的口述史料分析关注记忆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如何塑造人们对过

去的理解。对口述史料的记忆分析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广义上的叙事学。

刘老师指出，归根结底，口述史是一种方法，是认识社会事物和历史事实的工具，可以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各种议题中。口述史研究以抢救历史记忆、发现新的证据为追求和理想，通过不断追问，通过进入“主体的深层”去接近“历史的深层”，这是口述史研究最值得珍视的价值和意义。

在讲座的最后，刘老师就同学们提出的“口述史调查中的提问方式”、“如何通过口述史以小见大”等问题做了解答。刘老师强调，与口述史料分析紧密相关的记忆研究和叙事研究，都是建立在对历史学以及社会科学等理论和方法论的丰厚积累上。因此，以口述史为方法开展研究，需要通过广泛深入的跨学科阅读，建立深厚的理论功底，具有深入挖掘口述史料深度的能力，同时还要遵守社会调查研究的基本伦理。本次讲座最终圆满结束。

编后语

刊物发到第三期，离不开各方力量的帮助，尤其是老师们的指导和提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杨典、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学院执行院长赵一红，赵梦瑶、向静林等各位编委老师在征稿和办刊各方面工作中给我们以许多点拨与推荐，赵亮员、温莹莹两位老师不吝谆谆教诲与鼓励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级学生科研“新苗计划”项目则再一次地立项支持《社研社语》刊物。这是学校、学院、系所和老师们对刊物的认可，更是老师们对我们办好刊物的殷切希望。

于是凭着老师们的信任、学院学校的认可、作者们的关注支持，以及审稿人们诚实的劳动，我们这些年轻人得以继续在安静的书桌上探索和研究我们为之好奇的事物，得以继续做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事情，第三期刊物得以顺利面世。这些信任、认可、关注、支持和付出，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然而，仅仅做到不辜负这些信任和认可，仍然是不够的。《社研社语》第三期刊物立项启动于新冠肺炎疫情结束的时间点，刊物排版定稿时巴以冲突双方刚刚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见证了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的惊艳亮相，见证了人类向星空的更多探索，也遭遇了极端自然灾害的侵袭，见到了内外压力下争取和平、稳定、合作与发展的不易。我们遥远地见证了侵略与种族灭绝行为滥施于平民、妇女儿童、伤病员和医护人员身上所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我们也有幸见证了国际主义精神、各民族团结一致的曙光，和人类永不屈服的勇气。短短一年中，时间仿佛加速，时间又仿佛停滞。

不能不说我们是幸运的。不能不说我们所获取的各种机会是无比可贵的。但危机和挑战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所处的世界和时代不断激励着、要求着、迫切地推动着我们必须迅速成长，做自己头脑和意志的主人，我们有义务看清自己所处身其中的世界和时代，并将自己的时间、精力、劳动和思考投入到为后来者造福的事业当中去。我们相信，把小事做好，大学问就在其中。

在此，我们向老师们表示最诚挚的感激，向积极投稿支持刊物的作者们表达最衷心的感谢，也向为院刊工作付出时间与精力的同学们致以最真挚的谢意。正是你们的关注、鼓励和鼎力支持，使得我们的刊物能迈着稚拙的脚步不断前行。

最后，希望院刊会越办越好！

——《社研社语》编辑部

投稿指南

一、投稿要求

- 1.本刊唯一投稿渠道为 ucassociety@163.com
- 2.本刊刊登社会学各分支学科的学术论文、调查报告和研究述评等。学术论文以 5000-10000 字为宜。其他类型作品限定 500-3000 字。
- 3.稿件一律使用中文。
- 4.稿件第一页应包括以下信息：(1)文章标题；(2)作者姓名、身份证号码、单位、联系电话、通讯地址、Email 等。
- 5.稿件第二页应包括以下信息：(1)文章标题；(2)中文摘要(不超过 200 字)；(3)3-5 个中文关键词；(4)文章的英文标题、作者姓名的汉语拼音(或英文)；(5)英文摘要(不超过 150 个单词)。
- 6.投寄本刊的文章文责一律自负，凡采用他人成说务必加注说明。在引文后加括号注明作者、出版年份及页码，详细文献出处作为参考文献列于文后，以作者、出版年份、书名（或文章名）、出版地点、出版单位（或期刊名）排序。文献按作者姓氏的第一个字母依 A-Z 顺序分中、外文两部分排列，中文文献在前，外文文献在后；外文文献中的书名及期刊名用斜体，论文题目写入“”内。作者本人的注释均采用当页脚注。
- 7.文章正文的标题、表格、图、公式以及脚注应分别连续编号。一级标题用编号一、二、三……二级标题用(一)、(二)、(三)……三级标题用 1.、2.、3……四级标题用(1)、(2)、(3)……一级标题居中，二级左对齐，三级标题左缩进两格。
- 8.每张表格、图均应达到出版质量，并在行文中标明其位置。

二、投稿类型

- ①本硕博优秀论文
- ②新苗计划、大创项目等优秀获奖文章
- ③学生科研实践优秀报告
- ④学术会议/论坛感想
- ⑤人物访谈
- ⑥小院花絮

注：论文必须原创，已正式公开发表的文章不予接收。

社研社语

SOCIOLOGY ECHO

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社会学社

编辑出版：《社研社语》编辑部

订 阅 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社会学社

地 址：北京市房山区拱辰街道长于大街11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邮政编码：102488

电子邮件：ucassociety@163.com



扫码关注《社研社语》编辑部